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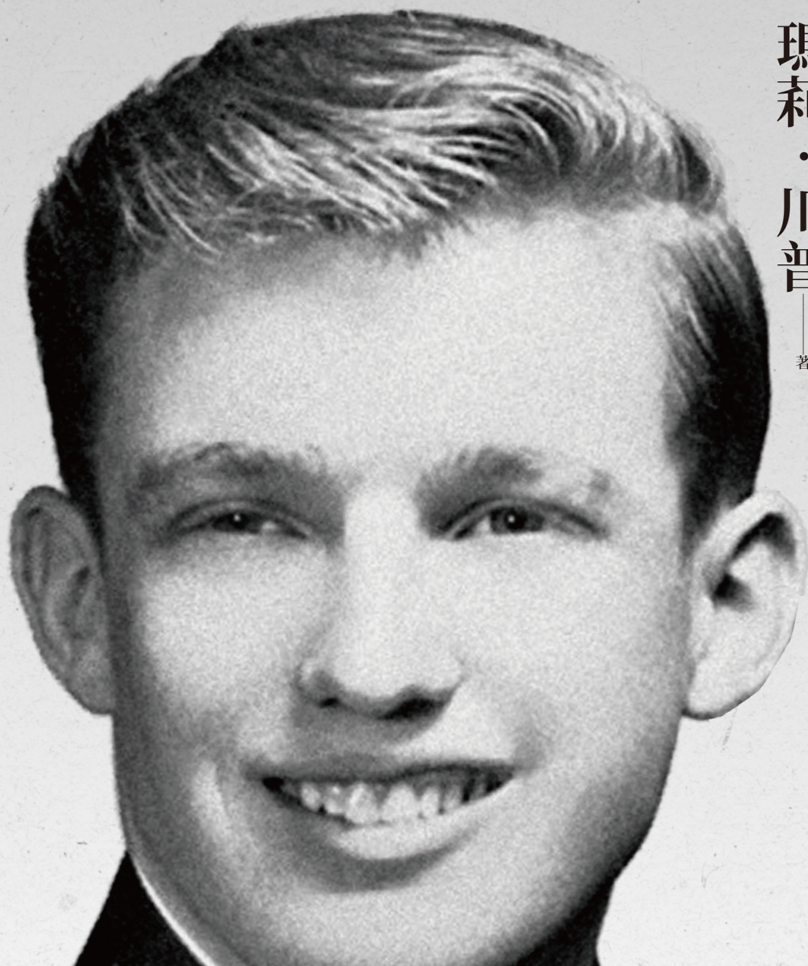
永不滿足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納．川普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瑪莉．川普 Mary L. Trump——著

周辰陽、季晶晶、郭宣含、陳韻涵——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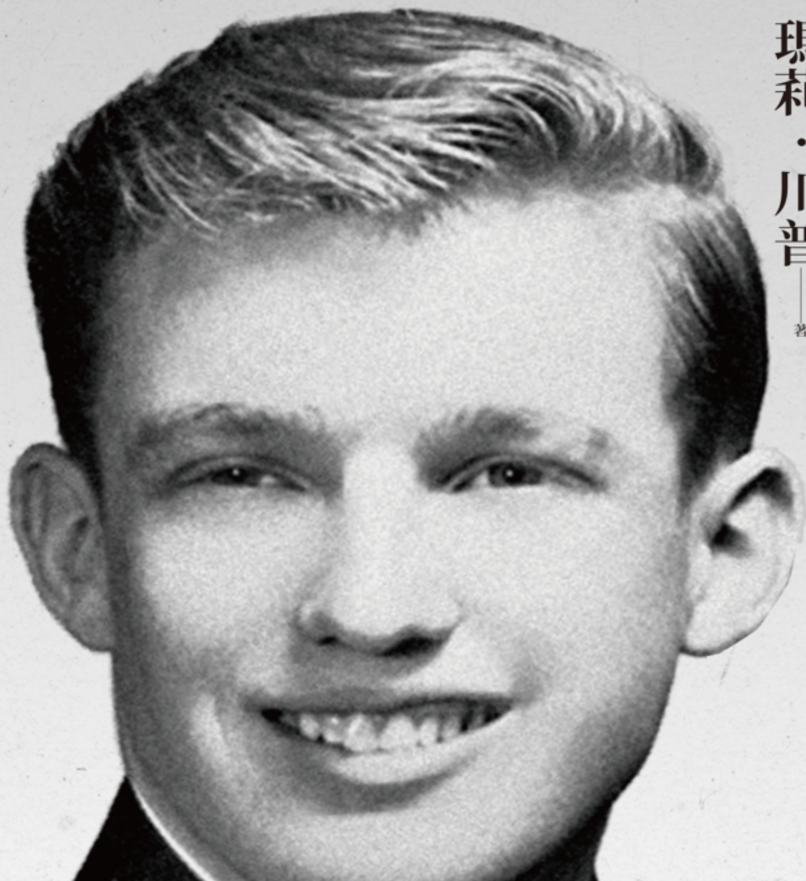
永不滿足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納・川普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瑪莉・川普 Mary L. Trump——著

周辰陽、季晶晶、郭宣含、陳韻涵——譯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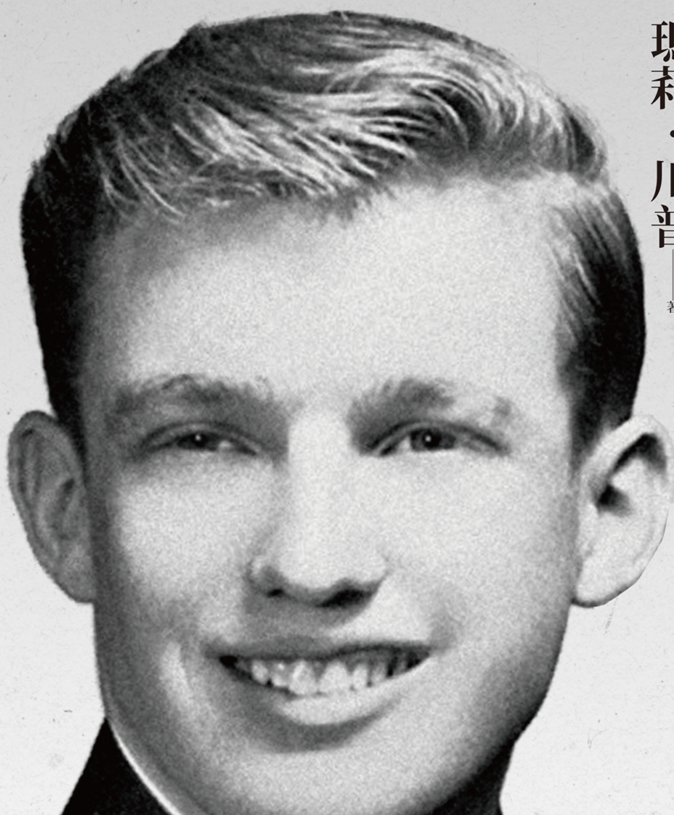
永不滿足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納・川普**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瑪莉・川普 Mary L. Trump——著

周辰陽、季晶晶、郭宣含、陳韻涵——譯





© Avary L. Trump

作者

瑪莉．川普 Mary L. Trump

美國德納高等心理學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博士，曾教授創傷、精神病理學和發展心理學課程。目前與女兒定居於紐約。

譯者

周辰陽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美國研究組碩士。投入職場後即從事國際新聞相關工作，現職聯合報新聞部採訪中心國際組編譯。

季晶晶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曾任加拿大 RBC 銀行西溫分行營運襄理，返臺後轉任編譯，譯有《價值主張年代》、《從 0 到 1》、《顧客大反擊》等書。

郭宣含

臺中人臺南魂。成功大學外文系、彰化師範大學翻譯所畢業，現為國際新聞編譯。熱愛翻譯、運動與美食。合譯有《跑過荒野：奔跑如何讓我們成為人》。

聯絡方式：fish0221@livemail.tw

陳韻涵

不進辦公室的國際新聞編譯，享受遠距游牧生活，譯作散見報章雜誌及數位媒體。

聯絡方式：refined.yhchen@gmail.com

Design by｜兒日｜minfeng9@gmail.com｜www.flickr.com/minfeng9　　封面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 提供授權

Mary L. Trump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永不滿足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納．川普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瑪莉．川普——著

周辰陽、季晶晶、郭宣含、陳韻涵——譯

献给

我的女儿艾佛瑞（Avary）

和

我的父亲

若灵魂被留於黑暗，罪将孳生。

有罪者不是那个犯下罪愆之人，而是制造黑暗之人。

——雨果，《悲惨世界》

目次

作者注记

前言

第一部　残酷是关键

第一章　家族

第二章　长子

第三章　伟大的我

第四章　期待飞翔

第二部　云泥相望悬

第五章　受困

第六章　零和游戏

第七章　平行线

第八章　脱离速度

第三部　烟雾与镜花

第九章　纾困的艺术

第十章　日暮并非转瞬而至

第十一章　唯一货币

第十二章　决裂

第四部　最糟的投资

第十三章　政治攸关个人

第十四章　公宅里的公仆

後记　第十层地狱

谢词

作者注记

这本书大多数的内容来自我自己的记忆。对於我不在场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则依据访谈我的家族、家族朋友、邻居和同事，其中许多事都是有纪录的。我根据个人的回忆与他人的回溯告知，重建部分对话。比起提供逐字引述，我让书中出现对话的目的，是希望重新创造谈话的本质。我也参考法律文件、银行对帐单、纳税申报表、私人日记、家族文献、通信、电邮、简讯、电报与其他纪录。

在大致的背景上，我仰赖《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特别是大卫．巴尔斯托（David Barstow）、苏珊娜．克雷格（Susanne Craig）与罗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於二○一八年十月二日刊出的调查报导；《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浮华世界》（Vanity Fair）、《政客》杂志（Politico）、环球航空博物馆（TWA Museum）网站，还有诺曼．文森．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正面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在「越野障碍赛马乐园」（Steeplechase Park）的背景方面，我感谢康尼岛历史计画（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网站、《布鲁克林报》（Brooklyn Paper）和舒兹（Dana Schulz）於二○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刊登於6sqft.com的文章。谢谢麦亚当（Dan P. McAdams）在「情节人物」（The Episodic Man）的洞察力。在家族历史、川普家族企业相关讯息和被控的罪名上，我感谢已故的巴瑞特（Wayne Barrett）、科恩（David Corn）、德安东尼奥（Michael D'Antonio）、约翰斯顿（David Cay Johnston）、欧布莱恩（Tim O'Brien）、皮尔斯（Charles P. Pierce）与瑟维尔（Adam Serwer）等记者的报导。也感谢布莱尔（Gwenda Blair）、克拉尼许（Michael Kranish）和费雪（Marc Fisher）——但我父亲过世时，是四十二岁，不是四十三岁。

前言

我一向喜欢我的姓氏。身为一个在一九七○年代起就参加帆船营的孩子，每个人都叫我「川普」。这是自豪的根源，但不是因为川普与权力及房地产连在一起的关系（当时，我的家族在布鲁克林与皇后区外没没无闻），而是因为发音本身有几分适合年仅六岁、坚韧又无所畏惧的我。一九八○年代，当我进入大学就读，我的唐纳叔叔开始将他在曼哈顿所有的大楼进行品牌化时，我对自己姓氏的感觉变得更复杂了。

三十年後的二○一七年四月四日，我身处美铁（Amtrak，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开往华府列车的安静车厢中，要去白宫参加家族晚宴。我在十天前收到电子邮件，邀请我去参加玛丽安姑姑（Maryanne Trump Barry）的八十大寿，和伊莉莎白姑姑（Elizabeth Trump Grau）七十五岁的生日庆祝会。她们的弟弟唐纳，自当年一月即入主白宫里的椭圆办公室。

走出有着拱型天花板与黑白相间大理石地板的联合车站，我经过一位摊商，他的货架上放着待售的胸章别针，我的姓氏镶在红圈中，被一条红色斜线划过，还有「驱逐川普」（DEPORT TRUMP）、「扔掉川普」（DUMP TRUMP）和「川普是巫妖」（TRUMP IS A WITCH）等字样。我戴上太阳眼镜，加快步伐。

我拦下一辆计程车，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川普国际饭店，我们被招待留宿一晚。登记入住後，我走过中庭，抬头看着玻璃天花板与上方的蓝天。大拱梁在空中悬起，三层水晶吊灯则挂在中央小梁上，投射出柔和的灯光。一侧是排成一组组、有着皇室蓝、知更鸟蛋蓝和象牙色的扶手椅、中沙发和长沙发，另一侧的桌椅则围绕着大酒吧，我跟我哥哥约好稍後在此碰面。我曾以为饭店会充满镶金而显得庸俗，并非看来如此。

我的房间同样风格雅致，但我的名字被贴得到处都是、无所不在：川普洗发乳、川普护发乳、川普拖鞋、川普浴帽、川普鞋油、川普针线包、川普浴袍。我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川普白酒，全灌进我的川普喉咙，好在我的川普血管迅速流动，直击我川普大脑里的快乐中枢。

一小时後，我见到我哥哥佛瑞德里克．克里斯特．川普三世（Frederick Crist Trump, III）与他的妻子丽莎（Lisa）。我俩还是孩子时，我就叫他佛瑞兹（Fritz）。其他受邀者很快现身：我的玛丽安姑姑，她是佛瑞德与玛丽．川普（Fred and Mary Trump）五名子女的老大，也是受尊敬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排行老么的罗伯特叔叔（Robert Trump）跟女友一起出席，他曾是唐纳在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

员工之一，但为时甚短，一九九○年代早期就不欢而散；排行老三的伊莉莎白姑姑与她的先生詹姆斯．格劳（James Grau）；我的堂弟、玛丽安姑姑的独子、也是川普家族的长孙大卫．戴斯蒙（David William Desmond）与太太，还有几位姑姑的密友。唯一一位不会现身庆祝会的川普手足就是我父亲，小佛瑞德里克．克里斯特．川普（Frederick Crist Trump, Jr）。他是长子，每个人都叫他佛瑞迪（Freddy），已经去世超过三十五年了。

等我们终於集合完毕，和门外的白宫维安特工登记後，就像一支二军曲棍球队一样，随便地挤进两辆派来的白宫厢型车。有些年长的宾客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缩进长型座椅後让大家很不舒服。我琢磨着，为什麼白宫没想过，至少派一辆加长型豪华轿车来接我的姑姑们。

十分钟後，我们乘坐的车开上白宫南草坪的车道，两名警卫走出维安岗哨，检查厢型车底後，才放我们穿越大门。又开过一小段路，车子在一栋和白宫东翼相邻的小型维安建筑前停下，把我们都放了下来，点完名後，我们才一个接一个进去，交出手机与包包，然後走过金属感应门。

一踏入白宫，我们三三两两穿越长廊，经过可看到花园与草坪的窗户，越过前第一夫人们的等身大肖像画。我在希拉蕊．柯林顿的画像前驻足，沉默地等上一分钟。我再次思忖，这种事怎麼可能发生。

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有理由造访白宫，而且肯定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感觉就是荒诞离奇。我环顾四周，白宫优雅、庄严、宏伟，而我就要见到住在这里的叔叔，这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见面。

我们离开走廊的遮荫处，进到环绕玫瑰园（Rose Garden）的柱廊，最後停在椭圆办公室外。我的目光越过落地玻璃门，看到一场还在进行的会议。副总统潘斯（Mike Pence）站在一旁，但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参议员舒默（Chuck Schumer）及十来位国会议员与幕僚则环绕在坐在坚毅桌（Resolute Desk，译注：一张制作於十九世纪的书桌，被多位美国总统作为办公桌使用）後的唐纳周围。

眼前的场面让我想起祖父的一招战术：总让哀求者来找他，不是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就是在皇后区的住家中，他一直坐着，让他们站着。一九八五年秋季下旬，从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休学一年後，我就是这样站在祖父面前，请他允许我复学。他看着我说道：「愚蠢，你复学是要做什麼？就去念职校当个接待小姐吧。」

「因为我想拿到我的文凭。」我把话说出口时，必然带着一丝恼火，因为祖父眯眼看着我一秒钟，好像重新打量我似的。他的嘴角讥嘲地扬起，接着大笑出声：「真恶心。」

几分钟後，会议解散了。

椭圆办公室比我想像的还要小，也没那麽舒适。我堂弟艾瑞克（Eric Trump）与（我从没见过的）妻子赖拉（Lara Trump）就站在门旁，所以我去打招呼：「嗨，艾瑞克。我是你堂姐玛莉。」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好吧，有一阵子没见了。」我说：「我想我们上次见面，你还在读高中。」

他耸耸肩说：「可能真是如此。」没有自我介绍，他跟赖拉就这样走了。我环顾四周。梅兰妮亚（Melania Trump）、伊凡卡（Ivanka Trump）、杰瑞德（即伊凡卡的丈夫库许纳，Jared Kushnar）与唐尼（即小川普，Donny Trump Jr.）都到了，站到依然坐着不动的唐纳身旁。潘斯持续隐身在椭圆办公室的另一侧，脸上挂着半死不活的笑容，就像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监护人。

我盯着他，希望来个眼神交会，但他从没朝我看来。

「各位，不好意思。」白宫摄影师是一位身穿深色裤装的娇小年轻女子，她将声音拉高：「大家就聚在一块儿，我好在上楼前拍些照片。」她指挥着我们围绕唐纳，他依然没有起身。

摄影师举起相机说：「一、二、三，微笑。」

等到照片拍好，唐纳才起身，指着坚毅桌後方的另一张桌上，那里摆了一帧祖父的黑白相片。「玛丽安，那不是爸爸最棒的照片吗？」我祖父母宅邸图书室边桌上，也放着同一张相片。相片里的祖父仍是名黑发、蓄胡、发线正在向後退的年轻男子，在失智症发作前，我从未见过那一副热衷於发号施令的模样有任何动摇的时候。那张照片，我们已见过不计其数。

玛丽安提议：「或许你也该放张妈妈的相片。」

「这主意棒透了。」唐纳说得好像他从没想到一样。「谁来找张妈妈的相片给我。」

我们在椭圆办公室又多逗留了几分钟，轮流坐到坚毅桌後。我哥哥帮我拍照，当我之後细看时，注意到祖父在我身後，像鬼魂一般盘旋。

我们和白宫历史学家就在椭圆办公室外会合，接着到二楼的行政官邸（Executive Residence）参观，随後才是共进晚餐。上楼後，我们进入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我快速浏览房内，意外看到床头桌上留了一颗只吃一半的苹果。当历史学家跟我们说着林肯卧室历年曾发生过的故事时，唐纳时不时暗示和宣称：「这地方自乔治．华盛顿住过

後，就从没这麽好过。」历史学家太有教养了，没有当场更正白宫是直到华盛顿去世後才落成。我们一行人回到一楼走廊，朝条约厅（Treaty Room）与行政宴会厅（Executive Dining Room）走去。

唐纳站在门口，迎接入内的宾客。我是最後一个抵达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哈罗，但他看到我，就一脸惊讶地指着我说：「我特别要求你要到场。」他常说这一类的话来迷住他人，也很有看场合修改说法的本领，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也就格外印象深刻。他张开双臂，接着是我人生首度被他拥抱。

我首先注意到行政宴会厅的美观，像抛光到完美的深色木材、精致餐具以及座位名牌和菜单的手写字体。菜单写着卷心萵苣沙拉、川普家族主菜的马铃薯泥和腓力牛排。我坐下後，接着又注意到座位安排。在我的家族中，你总能从席次的安排上判断出自己的价值，但我不介意。像我的哥哥、嫂嫂、玛丽安姑姑的继女和她丈夫，坐在我附近的人都让我感到自在。

每一位侍者都带着一瓶红酒和一瓶白酒。真正的酒，不是川普牌的酒，这倒是出乎意料。在我的整个人生中，家族聚会从来不上任何酒类饮料。我祖父母的宅邸就只有可乐和苹果汁。

饭吃到一半，库许纳踏入宴会厅。「喔，看哪，」伊凡卡拍手说道：「杰瑞德从中东之旅归来了！」好像我们刚刚没在椭圆办公室看到他似的。他走向他的妻子，在她的脸颊飞快地吻一下，随後朝着坐在隔壁的唐纳俯身，两人悄声说上几分钟的话，接着杰瑞德就离开了，完全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甚至连我的姑姑们也没有。就在他跨过门槛时，唐尼从座位弹起，蹦蹦跳跳地追上去，就像一只兴奋的小狗。

当甜点上桌时，罗伯特拿着高脚酒杯起身。「非常荣幸能与美国总统共处一室，」他说：「总统先生，谢谢你容许我们来此庆祝我们姐妹的生日。」

我回想起家族最後一次在布鲁克林的彼德鲁格牛排馆（Peter Luger Steak House）庆祝父亲节。当时，就像现在，唐纳与罗伯特比邻而坐，我就在他们的正对面。没有任何解释，唐纳就转向罗伯特说道：「你看。」他露出牙齿，指着嘴巴。

「什麽？」罗伯特问道。

唐纳只是把嘴唇更往下拉，更用力地指着。

罗伯特开始显得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什麽事，但我啜饮着可乐，饶富兴趣地看着。

「你看！」唐纳咬牙切齿地说着：「你觉得怎麽样？」

「你是什麼意思？」罗伯特的尴尬显而易见。他环顾四周，确保没有人盯着他看，然後小小声地说：「我的牙齿上有什麼东西吗？」桌上四处都是装着奶油菠菜的碗，渲染出那明显的可能性。

唐纳放松嘴唇，手也收回去。他脸上的轻蔑总结着他们的整段关系史。「我把牙齿漂白了。你觉得怎麼样？」他乾巴巴地问着。

罗伯特致词完毕後，唐纳还是一脸倨傲地看着他。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彼德鲁格牛排馆看过同样的场景。

接着，唐纳手握玻璃瓶装的健怡可乐，向我的姑姑们致上一些马马虎虎的生日贺词，随後又朝他的媳妇比手势。「那边的赖拉。」他说：「说实话啦，我几乎连她是他妈的谁都不知道。但在乔治亚州造势时，她发表一篇超棒的演说支持我。」赖拉和艾瑞克那时已在一起快八年了，唐纳至少在他们的婚礼上见过她吧。但这话听起来，倒像他仍不知道她是谁，直到她在选举造势大会上说些他的好话。唐纳还是老样子，故事比真相更要紧。特别是谎言如果能让故事更好听时，真相可以轻易抛到脑後。

换玛丽安讲话时，她说：「我要谢谢你跑一趟来庆祝我们的生日。自从唐纳还是同样一个调皮鬼，让佛瑞迪把一碗马铃薯泥往他头上倒的那一晚後，我们已经改变很多。」每一个熟悉马铃薯泥传奇故事的人都笑了，每一个人，就唐纳没有。一脸阴沉的他一边听、一边双手紧紧抱胸。无论玛丽安何时提起，他的表现都如出一辙。这让他不开心，好似他还是那个七岁男孩。很久以前的那份羞辱，显然仍让他耿耿於怀。

之前追着杰瑞德而去的唐尼堂弟回来，主动起身讲话。他不是向姑姑们敬酒，而是发表某种造势演说。「去年十一月时，美国人民看到一些特别的情事，将票投给一位了解他们的总统。他们看到这个家族多麼伟大，他们连结上我们的价值观。」我瞥向我哥，翻了翻白眼。

我向一位侍者招手。「能多给我一些酒吗？」我问道。

他很快带着两瓶酒回来，问我想要红酒或白酒。

「是的，麻烦了。」

甜点一吃完，大家都起身。从我们进到椭圆办公室後，只过了两个钟头，但饭吃完了，也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从头到尾，我们在白宫度过约两倍於我们曾在祖父母宅邸过感恩节或耶诞节的时间，但和唐纳在一起的时间，仍少於两星期後、他与摇滚小子（Kid Rock）、莎拉．裴琳（Sarah Palin）与泰德．纳金特（Ted Nugent）的会面。

有人建议我们都去跟唐纳个别拍照（而不是跟贵宾）。轮到我的时候，唐纳朝着镜头微笑，竖起大拇指，但我能看到微笑背後的精疲力

竭。就像保持兴高采烈的假象让他气馁。

趁着我哥跟他合影时，我告诉他：「别因为他们而沮丧。」没过多久，他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被扫地出门，总统大位已开始显现裂痕。

唐纳伸出下巴、咬紧牙关，有一刹那看起来像是我祖母的鬼魂。「他们抓不到我的。」

唐纳在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宣布竞选总统时，我丝毫不以为意，我不觉得唐纳是认真的，他只不过是要让他的品牌免费曝光，以前他就做过类似的事。当他的民调数字开始升高时，可能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丁心照不宣的保证，俄国会尽一切所能，将选战扭转成对他有利的情势，胜选的吸引力增加了。

「他是个小丑。」当时，玛丽安姑姑在我们一场例行的午餐会上说道：「这永远不可能发生。」

我点头。

我们谈到过气的实境秀明星和失败商人等名声会怎麽摧毁他的竞选。我问：「有哪个人真信他白手起家的狗屁？他真靠自己成就什麽？」

「这个嘛，」玛丽安的声音跟撒哈拉沙漠一样乾，「他已经破产五次了。」

当唐纳开始讲到鸦片类药物的泛滥危机，用我父亲的酗酒史擦亮他反药物成瘾的诚意，使自己看似更富同情心时，我们两人都火大了。

「他为了政治目的利用你父亲的记忆。」玛丽安说：「那是罪啊，特别是佛瑞迪才应该成为家族的明星。」

我们觉得唐纳在参选演说上公然展现种族歧视会导致选战破局，但佛威尔（Jerry Falwell Jr.）与其他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支持他竞选时，我们醒悟了。自五十年前皈依天主教後，玛丽安就是虔诚的信徒，这个消息让她暴跳如雷。「他们是他妈的有什麽毛病？」她说：「唐纳只在摄影机摆出来时上教堂，真是匪夷所思。他毫无原则，完全没有！」

从诋毁可说是美国史上最够格的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蕊为「恶心女人」开始，到嘲笑《纽约时报》的身障记者柯瓦勒斯基（Serge Kovaleski），唐纳在选战期间的言词都没有偏离我对他的预期。其实，我记得我曾参加过的每一场家族聚餐，唐纳常在席间谈到所有他觉得丑、肥、懒的女人，不然就是贬 损比他有造诣或更有权力的男人是输

家，这时祖父、玛丽安、伊莉莎白和罗伯特都会大笑着并加入其中。那种将人们不经意地非人化，是川普家晚餐桌上常见的风景。「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一直成功脱身，甚至让他获得提名。我曾觉得会让他失去竞选总统资格的因素，似乎只强化他对基本盘的吸引力。我还是不担心，我相信他绝不会当选。

然而，光是他有机会的想法就够让人不安了。

迟至二○一六年夏季，我才考虑说出我知道唐纳完全没资格选总统的想法。此时的他，已相对安然无恙地摆脱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他号召「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护者」阻止希拉蕊等风波的阴影。哪怕他攻击战死於伊拉克的胡马雍．汗陆军上尉（Humayun Khan）的父母、「金星双亲」吉泽尔与加札拉．汗（Khizr and Ghazala Khan），似乎也不成问题。《前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影片曝光後，多数接受民调的共和党员仍然支持他时，我知道我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开始觉得，我彷佛正看着以唐纳为主角的家族史盛大揭幕。一如我父亲过去所经历的，唐纳在竞赛中被要求的标准更高，但他却持续以粗鲁、不负责任与卑鄙的举动摆脱惩罚，甚至因此获得奖励。「这不可能再有机会发生。」我想，但事与愿违。

媒体未能注意到，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除去他的孩子、他的女婿、他的现任妻子外，没有一位唐纳的家族成员发言支持他。玛丽安告诉我，她运气好，因为身为联邦法官，她必须保持客观。考虑到她是他的姐姐，又有着专业声誉，要是她开口说唐纳完全不适合当总统，或许就成为美国唯一一个可能带来改变的人。但她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当她选後告诉我说，她基於「家族忠诚」，还是把票投给自己的弟弟时，我也没有太过意外。

在川普家族成长，特别是身为佛瑞迪的孩子，是有一定的挑战的。某种程度来说，我其实极端幸运。我在卓越的私立学校求学，人生大多数时间都有顶级医疗保险的照护。只不过，我们全家人也都有一种内在的匮乏感，但其中不包含唐纳。祖父於一九九九年过世後，我才知道遗嘱已抹除我父亲这一门，彷佛佛瑞德．川普的长子从未存在过，随後我们便对簿公堂。最後，我得出结论，如果我开口质疑我的叔叔，我就会被修理成想发大财却等不到财产、因而心怀不满想算旧帐的侄女。

要理解是什麼造就今日的唐纳和我们所有人，我们得从我祖父与他自己的认同需求说起，这个需求驱使他鼓励唐纳不顾後果地膨风，培养与其不相称的自信，好隐藏唐纳的病态脆弱和不安全感。

当唐纳长大，他被迫成为自己的啦啦队。首先，他需要父亲相信，

他是一个比佛瑞迪更好、更有自信的儿子。其次，正是因为佛瑞德要他变成这样。最後，是因为唐纳开始相信他自己的炒作，即使他内心矛盾，抱持无人能及的极度怀疑。选战期间，唐纳用愤怒回击自身优越感受到的任何挑战，他的恐惧和脆弱能够被如此有效地埋葬，以致他甚至不必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因为他永远不会知道。

在一九七○年代，我祖父偏爱和拉抬唐纳多年後，纽约媒体接棒，开始散播唐纳毫无根据的膨风。一九八○年代，银行也来参一脚，开始资助他的合资企业。他们有意愿（之後也需要）扶植他越来越没有根据的成功说法，紧紧抓着损失得以获得补偿的希望。

有十年的时间，唐纳在破产中挣扎，甚至沦落到挂名牛排到伏特加等一系列失败产品的处境，电视制作人马克．布奈特（Mark Burnett）又给他一个机会。我祖父五十年前创造出「唐纳是白手起家又桀骜不驯的商人」的形象，即使有一箩筐的反证，这个迷思竟惊人地近乎完全文风不动，直接照搬到新千禧年的真人实境秀节目《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上。当唐纳於二○一五年宣布他要角逐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初选，美国一大部分民众已经准备要相信这个迷思了。

直到今日，我那被共和党和福音派白人基督徒持续追捧的叔叔，本身就是谎言、不实陈述与虚构的总和。了解更深入的人，像是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契．麦康诺；真正的信徒，像是众议员麦卡锡（Kevin McCarthy，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还有其他太多人，族繁不及备载，都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变成沆瀣一气。

川普一家手足都没能安然无恙地摆脱我祖父的反社会人格和我祖母的生、心理疾病，尤其唐纳叔叔和我父亲佛瑞迪受害最深。要了解唐纳的全貌、他的精神病状和失常行为意义，我们必须通读川普家族史。

在过去三年间，我看到数不尽的专家、空谈心理学家和记者们老是没抓到重点，使用「致命的自恋」与「自恋人格失调」等词汇，试图理解唐纳经常性的怪奇表现与自我拆台行为。要我称唐纳是个自恋者，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完全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DSM-5）提出的九个基准，但分类标签能告诉我们的仅止於此。

我在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获颁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就在我为论文做研究时，我在纽约州立曼哈顿精神医学中心（Manhattan Psychiatric Center）住院病房工作一年，诊断、评估和治疗一些病况最重、最脆弱的患者。除了在研究所以兼任教授身分教授心理学，包括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课程多年外，我到专治成瘾的社区诊所，为患者提

供疗法和心理学测试。

这些经验一次次告诉我，诊断不会凭空蹦出来。唐纳有其他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症状吗？有其他可能等同或更有解释力的失常吗？或许吧。也可以解释成他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基准，最严重的型态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病态，但也常涉及长期犯罪的行为，或是傲慢和不顾他人权益的态度。有其他合并症吗？可能。唐纳或许也符合部分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基准，特点包含：无力做出决策或承担责任、独处会焦虑不安、过度努力争取他人的支持。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吗？当然。他可能有长期未被诊断的学习障碍，过去数十年都干扰着处理资讯的能力。还有，他据称一天喝下多达十二罐健怡可乐，同时睡得很少。他会苦於物质（这里是指咖啡因）引起的睡眠障碍吗？他的饮食习惯骇人听闻，也不运动，也许促成或加剧其他可能的失常状况。

实情是，唐纳的病状太复杂了，太常出现无法解释的行为，想进行准确且综合的诊断，需要一整套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测试，而他绝不会乖乖就范。此刻，我们无法评估他的日常活动。因为人在白宫西翼的他，基本上是被照顾得好好的。唐纳成年的大多数时候都缺乏自理能力，所以不可能知道他如何靠自己在真实世界中成长茁壮，甚至是独力生存下去。

我姑姑们在二○一七年的生日派对尾声时，大家一起排队拍照，我能看到唐纳已处於一种他之前从未经历过的紧张情绪之中。过去三年的过程中，他身上的压力持续累积，治国所需的能力和他的无能之间的层次差距扩大，揭露出他比过去更加明显的妄想。许多人（但绝不代表我们所有人）一直受到稳定经济和缺乏严重危机挑战的蒙蔽，直到现在才见识到他的病状所产生最恶劣的影响。随着失控的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增加，还有因唐纳爱好对立，导致社会分裂沿着政治分野而深化，以及我们国家未来的毁灭性不确定，已创造出完美的灾祸风暴，而没有人比我叔叔更缺乏准备去着手控管。面对危机需要勇气、品行、力量、尊重专家、承担责任的信心及认错後的方向修正。在我们当前面对的悲剧中，他用欺骗、虚构和混淆是非来控制不利情况的技能，已减弱到无力的程度。他那恶名昭彰和可说是蓄意不当处理现下灾祸的方法，已引来一定程度的反扑和他之前不曾体验过的详细检视，这些都增强了他的好斗跟小心眼复仇的行径，像是他会刻意扣住重要资金、个人防护装备与各州用人民缴的税金购买的呼吸器，只因该州州长不够用力拍他马屁。

一九九四年，一部根据玛丽．雪莱小说《科学怪人》改编的电影中，法兰肯斯坦的怪物说：「我确实知道，为了同情一个活物，我会与一切讲和。我的内在有着像你几乎无法想像的爱，有着像你不敢置信的怒。如果我无法满足一者，我会纵放另一者。」引述这句台词後，皮尔斯（Charles P. Pierce）在《君子》杂志（Esquire）写道：「（唐纳）

不会因怀疑他在自己周围创造出什麽，而拿来折磨他自己。他对他创造出来的怪物自豪。他对它的愤怒与破坏骄傲，当他无法想像它的爱，他全心相信它的怒。他是没有良心的科学怪人。」

这个说法可以更准确地用到唐纳的爸爸佛瑞德身上，关键的区别在於，佛瑞德的怪物、唯一一个对他至关紧要的孩子，会因佛瑞德偏好他的本性，让他最终被转变成没有「爱」的人。到最後，唐纳一点爱都不会有，虽然他极为痛苦地渴求着。「怒」则任其成长，让其他一切都相形见绌。

当唐纳的长期守门人格拉夫（Rhona Graff）将纽约市开票夜派对的邀请函送给我和女儿时，我婉拒了。当希拉蕊宣布胜选时，我将无法克制自己的亢奋，我不想在外人面前显得太无礼。隔天早上五点钟，相反的结果出炉後不过几个小时，我在我的房子四处游荡，就跟许多精神受创的人们一样，却有更私人的方面：感觉就像六千两百九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六名选民已做出选择，要把国家变成我那功能恶性失常家族的放大版。

大选後一个月，我发现自己强迫性地收看新闻，检查我的推特讯息，焦虑又无法集中於任何事情。尽管我对唐纳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意外，但他开始将他最糟的躁动强加於国家的速度和程度，仍让我难以承受，包括就职大典上人数规模的谎言和哀叹他受到多恶劣的对待，削弱环保议题，对准「平价医疗法」开铡以夺走数百万人的平价医保，乃至於制定了种族歧视的穆斯林旅游禁令。就说最小的事情：一整天下来，看到唐纳的脸庞，或听到我的姓氏不下数十次，同样把我带回父亲已油尽灯枯，死於祖父的残酷和藐视下的时刻。我失去他时，他年仅四十二岁，我才十六岁。事实是，唐纳的行动现在是美国官方国策，他的残忍之恐怖正被放大，影响扩及百万人。

我祖父在川普家族创造的对立氛围，是唐纳得以一直在其中悠游的水域，对立持续有利於他，代价却是其他每一个人要支付的。正当唐纳依然故我，国家就像我父亲一般精疲力竭，同时也改变我们，削弱我们亲善或信服宽恕的能力，这些概念对他则从未有过任何意义。他的政府与政党已变成他享权的基石及吸纳他不满的海绵。更糟的是，唐纳完全不懂历史、宪政原则、地缘政治、外交（或其他什麽的，真的），也从未被压着展示此类知识，只从金钱的角度评估美国所有盟邦及整体社福计画，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教他的。纯用财务关系考虑治国成本和效益，彷佛联邦财政部就是他的扑满。对他来说，花掉每一块钱就是他的损失，存下每一块钱就是他的收益。在这段下流的富裕关系中，一个人动用全部的权力杠杆，随他的意占尽了所有便宜，先让他自己获利，接着是有条件地让他的直系亲属、亲信和阿谀奉承他的人获利。至於其他人，永远不能满足所有需求，我祖父正好是这麽经营川普家族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纳过去五十年间获得的全部关注和报导，却只受到非常少的详细审查。就算他的人格缺陷与脱序表现已受到议论且沦为笑柄，还是很少有人努力去了解他为什麽成为他，而他显而易见的不适任，又为何能够不停地卷土重来。

某种意义上，唐纳总是被照顾得好好的，不用担心他的极限，或必须靠自己在世界取得成功。他从不需要诚实工作，无论失败得多惨，也能以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获得回报。他持续在白宫受到保护，不用面对自己一手引发的灾难，还有忠诚的鼓掌部队，为每一道掩盖可能的刑事过失的声明喝采，甚至将之常态化，让我们对他日积月累的违规行为近乎麻木。但现在风险远高於之前的程度，是名副其实的攸关生死存亡之际。不同於他之前人生的任何时段，唐纳的失败不能再被隐藏或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全体都会受到威胁。

尽管姑姑和叔叔们会有其他想法，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赚大钱或出於想要报仇。如果我的目的曾是前述两者之一，我几年前就会写出一本关於我家族的书——当时无从预料唐纳会利用连环破产的生意人与实境秀主持人等无足轻重的名声去问鼎白宫。

当时更安全，因为我叔叔不在高位，不会威胁或危及爆料吹哨者和批评者。不过，就是过去三年的事件迫使我动笔，我无法继续保持沉默。这本书出版时，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将成为唐纳目空一切和肆意无知等行为下的牺牲品。如果他当选连任，就是美国民主的终结。

没有人会比唐纳自己的家族更知道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不幸的是，出於忠诚或恐惧，他们几乎都保持沉默。我不会受到两者之一的妨碍。我能以父亲女儿和叔叔唯一侄女的身分给出第一手见闻，还会提供训练有素的临床心理学家的观点。《永不满足》是一部世上能见度最高、权势正如日中天的家族的故事。我是唯一愿意和盘托出实情的川普家族族人。

如果唐纳还有根据任何组织原则行事的话，我希望这本书将结束他所谓的「战略」或「议程」的实践。但他没有。唐纳的自我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易碎品，不足以分隔他与真实的世界，这还要感谢他父亲的金钱与权势，让他永远不须靠自己交涉协商。唐纳需要一直永远保持我祖父一开始的谎言，就是他强大、聪慧又格外不凡，但他完全不具备那些特质，面对真相对他而言太过恐怖，超乎他的盘算。

唐纳追随我祖父的引导，以共谋、沉默和对手足的无动於衷，摧毁了我的父亲。这次，我不能让他再摧毁我的国家。

第一部

残酷是关键

第一章

家族

「爸爸，妈妈在流血！」

「大宅」（House），我祖父母为人所知的家。他们住进去还不到一年，也仍然感到不适应，特别是在午夜时分。

所以，当十二岁的玛丽安发现母亲不省人事地躺在楼上其中一间浴室里时（不是主浴室，而是她和妹妹在走廊那头共用的浴室），她已经陷入六神无主。整个浴室地板全都是血。玛丽安实在太惊恐了，也顾不得自己通常不情愿到父亲卧室去打扰他，马上就飞奔到宅邸另外一侧去叫醒他。

佛瑞德下床，快步走到走廊那头，发现妻子没有反应。他冲回自己的卧室，用房内分机打电话，玛丽安则一路紧跟在後。

佛瑞德已是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在牙买加医院（Jamaica Hospital）有人脉，他立刻联系上某人，能派救护车到「大宅」，并确保他们一抵达急诊室就有最好的医师在等候。佛瑞德尽他所能，向电话另一头的人解释情况。玛丽安听到他说「月经」（menstruation），这是一个她不熟悉的单字，从她父亲口中吐出，听来更不寻常。

玛丽被送达医院後不久，医师就发现她在九个月前生下罗伯特後，其实患有严重的分娩後并发症，却没有得到确诊，因此紧急安排子宫切除手术。手术造成腹部感染，随後又进一步发生并发症。

在图书室里的电话桌旁，佛瑞德坐在之後将成为他习惯位置的座位上，跟玛丽其中一位医师短暂交谈後，他挂上电话，把玛丽安叫到面前。

他告诉女儿：「他们告诉我，你妈妈撑不过今晚。」

过一会儿，当他要出发去医院陪伴妻子时，又告诉玛丽安：「明天去上学。要是有任何变化，我会告诉你。」

她了解言下之意：如果你母亲死了，我会告诉你。玛丽安在自己的房间独自哭上一整晚，弟弟妹妹仍在床上安睡，没注意到大祸临头。她隔天带着满满的恐惧上学。佛瑞德加入邱林学院（The Kew-Forest

School）的校董会後，玛丽安开始上这所私立学校。校长詹姆斯．狄克森博士（Dr. James Dixon）过来把她带出自习室。

「我的办公室有一通找你的电话。」

玛丽安确信她母亲死了，走向校长室就像步向断头台。十二岁的她满脑子能想到的，就是她要成为四名小孩的代理母亲了。

当她拿起电话时，父亲就只说道：「她会撑过去的。」

玛丽在下星期又多接受两场手术，但她确实撑过去了。佛瑞德在医院的门路确保他的妻子得到最棒的医师与照护，挽救了她的性命，但复元之路很漫长。

玛丽接下来六个月在医院进进出出，对她的健康造成严重的长期影响。医师将卵巢连同子宫摘除，这种医学手术在当时很常见，却往往是没必要的，这让她突然失去雌激素，最终导致严重的骨质疏松。结果，她的骨头不断变薄，经常陷入自发性骨折带来的剧烈疼痛。

如果我们运气好，在婴幼儿时期，双亲至少有一人可以投入感情，持续满足我们的需求和回应想要被关注的渴望。被拥抱着、被安慰着，让我们的情绪得以获得理解、不满有所舒缓，这对幼童的健全成长极为重要。这种关注创造出安全和保障感，最终允许我们探索周围的世界，却不会萌生过度恐惧或难以控制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看护者会牢牢地替自己支撑局面。

镜像（mirroring）是一种上代将婴儿的感受、反应加以处理後再返还的历程，幼童透过对上代反应的理解，成为引导他们成长的重要关键。没有镜像，幼童会同时被剥夺心智如何运作及如何了解世界等两种关键讯息。一如安全依附主要看护者，能使幼儿通往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商，镜像是同理心的根源。

玛丽与佛瑞德从开始就是问题多多的双亲。我祖母很少跟我说她的父母或童年，所以我只能用猜的，她是十个孩子的老么，比老大小二十一岁，排行倒数第二的手足比她年长四岁。在一九一○年代早期，她在荒凉的环境成长。由於她自己年轻时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又或是一些其他原因，她成了那种用自己的小孩来安慰自己、而非安慰他们的母亲。她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不是他们需要她的时候。经常性的不稳定、需要关爱、自怨自艾、逃避牺牲等倾向，让她常优先考虑自己。特别是事关儿子时，她表现得就像是她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手术中和手术後，玛丽本人与母爱的缺席，在她小孩的人生创造出空白。对玛丽安、佛瑞迪和伊莉莎白来说，这必然是同样的艰难，但他们已经够大，能了解发生什麽事情，某种程度上，也能照顾自己。然而

对两岁的唐纳与九个月大的罗伯特，冲击就可怕了。特别在於他们是最脆弱的幼儿，却没有人能填补空白。同住的管家无疑被庞大的家务淹没，他们的祖母就住在附近，会帮他们准备餐点，但她就跟她儿子一样生硬，根本没感情。玛丽安不用上学时，照顾年幼孩子的责任大多数落到她身上（身为男孩的佛瑞迪不被期望能帮得上忙）。她帮他们洗澡，安顿他们上床睡觉，但十二岁的她就只能做到这麼多。五个孩子基本上没有母亲了。

不像玛丽需要关爱，佛瑞德似乎一点感情需求都没有。实际上，他是高功能社会病态。社会病态者不算罕见，多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常受此折磨，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确诊者是男性。社会病态者的症状包括缺乏同情心、撒谎成性、不重视是非、有虐待行为、对他人的权利不感兴趣。上一代若有社会病态性格，特别是周遭又没有其他人能调解，都只是在在保证自己将如何严重破坏孩子对自己的了解、调整情绪和接合世界的能力。我祖母在面对她丈夫的麻木不仁、冷漠和控制行为，进而引发婚姻问题，显然准备不足。佛瑞德缺乏真正的人类情绪，身为父亲与丈夫的僵化，加上认为女人先天次等的性别歧视信念，似乎让她感觉不到支持。

自玛丽因伤势导致缺席後，佛瑞德成为默认唯一有空的上代，但把他称作看护者却是个错误。他断然相信照顾孩子不是他的工作，持续每星期六天、每天十二小时待在川普管理公司（Trump Management），好像他的孩子们能照顾自己一样。佛瑞德关注对「他」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蒸蒸日上的生意。他当时在布鲁克林开发「海岸港」（Shore Haven）和「海滩港」（Beach Haven）两个大规模住宅建案，是他人生最显赫的成就。

重申：相对於佛瑞德的兴趣缺缺，唐纳与罗伯特则处於最不稳定的状态。婴儿与幼童展示的所有行为是依附行为的一种形式，会寻求看护者的正面安慰回应，如微笑能引出微笑，眼泪则引来拥抱。即使是在正常环境下，佛瑞德会认为任何那一类的表露都让他恼火，因而忽视唐纳和罗伯特可能更需关爱的事实，因为他们想念母亲，她的缺席让他们更陷入焦虑。但他们越焦虑，佛瑞德越冷落他们。他不喜欢自己被依赖的情况，孩子想被关爱的愿望只会激起川普一家的紧张关系。小男孩在最为脆弱的时候，产生生物学上被设计为触发双亲安抚的行为时，反而挑起父亲的怒火或漠不关心。对唐纳和罗伯特而言，「关爱」等同於羞辱、绝望和无望感。因为佛瑞德在家不想被打扰，如果孩子能学到「独立自主」，对他就算好事。

佛瑞德的养育方式其实恶化玛丽缺席的负面影响。结果，他的孩子们不仅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也与彼此隔绝。从那时起，兄弟姐妹变得越来越难寻求与其他人团结，这就是佛瑞迪的手足们最终辜负他的原因之一：为他挺身而出，甚至伸出援手，都得冒着他们父亲暴怒的风险。

当玛丽生病时，唐纳的主要慰藉来源和人际联系突然被夺走，不只

没有人帮助他理解，佛瑞德更是他仅存唯一可依靠的对象。唐纳的需求，在母亲生病前就没有得到一致满足，他父亲则几乎完全满足不了。那个佛瑞德经默认後，将成为唐纳寻求抚慰的主要来源，然而当他更加像是恐惧的来源时，反而将唐纳置於更不堪的处境：完全仰赖制造惊恐来源的父亲。

某种意义上，虐待儿童来自「过多」或「不够」的体验。在关键成长阶段失去和母亲的联系，唐纳直接经历的「不足」让他受创极深。在不被警告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恐惧和渴望没有得到抚慰。被母亲抛弃至少一年，父亲不只未能满足他的需求，也未能让他感觉到安全或被爱、被重视、被反映，唐纳遭受的剥夺将留下终身伤疤。因此导致的人格特质，以自恋、霸凌和浮夸呈现，最终引来我祖父的注意，但方式不是改善任何已降临的恐惧。随着年岁增长，唐纳目睹发生在佛瑞迪身上的事情，见到「他」承受太多关注、太多期待和最突出的羞辱後，就间接服从於我祖父「已经太多」的讯息。

从一开始，佛瑞德的利己就扭曲他的优先顺序。他对孩子的关怀，尽管不怎麽样，仍反映出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的需要。爱对他毫无意义，他对他们的困境无法感同身受，这是社会病态最明确的特徵之一。他期待服从，这就是全部。孩童分不出如此区别，他的孩子相信父亲爱他们，或可用某种方式争取他的爱。但他们也知道，父亲的「爱」是必须附带条件的。

因为佛瑞德对孩子完全没兴趣，玛丽安、伊莉莎白和罗伯特或多或少经历过跟唐纳同样的对待。与他同名的长子获得佛瑞德注意，纯粹是为了培养他当接班人。

为求竞争，唐纳开始培养出强力却原始的防御，特点是增加对他人的敌意，状似不在乎母亲的缺席与父亲的忽视。後者随着时间变成一种惯性的无助感，因为尽管他藉此绝缘於痛苦的恶性影响，却也让他的情绪需求极难（从长远来看，我会主张是不可能）获得全然满足，因为他变得太过熟练於无动於衷。代替那些需求而发展出一种怨恨以及包含霸凌、不敬、攻击性等内在行为，有助於实现当下的目的，但随时间过去问题反而恶化。若有适当的照顾与注意，还有可能被克服，但对唐纳和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不幸的是，那些行为变成了固化人格的特质。因为一旦佛瑞德开始注意到嗓门大又难对付的次子时，他开始进行评价。换句话说，佛瑞德开始批准、鼓励和倡导关於唐纳的事情，将他从根本上变成爱的绝缘体，而部分也是佛瑞德虐待的直接结果。

玛丽从未完全康复。一开始出现焦躁，後来成为失眠症患者。年长的孩子发现她像无声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大宅四处徘徊。佛瑞迪有次发现她站在阶梯最上层的走廊涂鸦，时间正是午夜时分。孩子们有时早上会发现她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不省人事，不只一次进了医院。那种行为

变成大宅的部分日常。玛丽忍受的病痛有人帮助，但任何让她置於高风险状况的潜在心理疾病，就没有人可以帮忙了。

除了他妻子偶然的病痛外，佛瑞德对此毫无所悉。即使他承认，也不会理解，他特别的教养风格对孩子的当下与未来已造成的影响。就他而言，在修补妻子濒临鬼门关的健康危机时，他曾经短暂地面对财富和权力有其局限的事实。但最终，玛丽的医疗挑战只是大浪中的小水花。当她从病後逐渐康复，同样惊人成功的海岸港与海滩港房地产开发案也接近完工，每一件事似乎再次顺着佛瑞德的意进行。

八岁的佛瑞迪询问，为什麽大腹便便的母亲变得那麽胖时，餐桌周围的谈话声戛然而止。这是一九四八年，川普一家已有四个孩子，十岁的玛丽安、八岁的佛瑞迪、五岁的伊莉莎白和一岁半的唐纳，几周後就要搬到佛瑞德正在兴建、共计二十三房的大宅。玛丽低头看着餐盘，几乎每日都会来访的佛瑞德母亲（名字也是伊莉莎白）停止用餐。

我祖父母家有着严谨的餐桌礼仪，有些事情是佛瑞德不能容忍的。「又不是马在吃饲料，把你的手肘从桌面上移开」是经常一再重复的老调，手上有刀的佛瑞德还会用刀柄轻拍违规者的前臂（佛瑞兹、大卫和我成长过程，罗伯特与唐纳接手这份职责，只是有点太过热情）。还有些事情则是孩子不应该谈的，特别是在父亲或祖母面前。当佛瑞迪想知道婴儿是怎麽来到世上时，佛瑞德和他母亲如同一体般地起身，不发一语就离开餐桌走人。佛瑞德并非大惊小怪，但伊莉莎白是一位严苛、庄重、继承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妇人，就很有可能是大惊小怪。

尽管她自己对性别角色的观点死板，却在许多年前为儿子破过例。佛瑞德父亲猝逝的几年後，伊莉莎白成为十五岁儿子的生意夥伴。

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她的丈夫佛瑞德里克．川普（Friedrich Trump）还算是一位企业家，身後留下钱财和如今价值约三十万美元的房地产。

出生於德国西部小村庄卡尔施塔特（Kallstadt）的佛瑞德里克，为躲避强制的兵役，於一八八五年、也就是他年满十八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他最终透过英属哥伦比亚境内的餐厅与妓院所有权发迹。在淘金热时匆匆离开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ies），赶在世纪交替之际、产业泡沫化之前变现。

一九○一年回德国探亲时，佛瑞德里克迎娶身材娇小、比他年轻近十二岁的金发女郎伊莉莎白．克里斯特（Elizabeth Christ）。他带着新娘前往纽约，但在第一个孩子（夫妇俩命名为伊莉莎白的女孩）出生一个月後，又带着永久定居的打算回到德国。因为佛瑞德里克最初出国是要逃兵，他被当局告知不得停留。佛瑞德里克、怀上第二胎已四个月的妻子与两岁长女於一九○五年七月返回美国。他们的两个儿子佛瑞德与

约翰（John G. Trump）分别出生於一九○五年和一九○七年。他们最终在皇后区的木港（Woodhaven）落脚，三名小孩都是说德语长大的。

当佛瑞德里克死於西班牙流感时，十二岁的佛瑞德成为一家之主。尽管丈夫遗产规模不小，伊莉莎白发现难以收支相抵。流感疫情夺走全球将近五千万条的人命，让本来可能蓬勃发展的战时经济为之动荡。佛瑞德还在读高中时，就接下一连串的零工，好在家计上帮助母亲，同时开始研究建筑行业。他有记忆以来，成为建商就一直是他的梦想。他对这行的各方面都感兴趣，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下，他从二年级就开始在他住的社区里建造、销售车库。他知道他在行，从那时起就别无其他兴趣，完全没有。佛瑞德高中毕业两年後，伊莉莎白创立「E．川普与儿子公司」。她承认儿子的天赋，这个企业让她能替未成年长子处理财务转帐，这是她支持儿子的方式（在二十世纪早期，人们直到二十一岁才成为法定成年人）。生意与家族都繁荣兴旺。

佛瑞德二十五岁时参加一场舞会，遇到来自苏格兰的玛丽．安妮．马克劳德（Mary Anne MacLeod）。根据家族传说，他回家後就告诉母亲，他已找到准备迎娶的女孩了。

玛丽在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路易斯岛（Isle of Lewis）的汤村（Tong），当地距离苏格兰西北海岸四十英里。她是十个孩子的老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两桩全球悲剧覆盖了她的童年，後者更深深影响到她未来的丈夫。路易斯岛在战争期间已失去大量的男性人口，停战协定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签署的两个月後，当地迎来命运的残酷转折。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凌晨，载着子弟兵从欧陆返乡的船，撞上距离岸边仅几码的礁石。这艘船载着约两百八十名士兵，超过两百人死於距离史托诺韦港（Stornoway Harbor）安全区不到一英里的酷寒海水中。岛上大多数年轻的成年男性就此消逝，年轻女子希望找到丈夫的话，要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玛丽是六个女儿之一，被鼓励远行到机会比较大、男人比较多的美国。

一九三○年五月上旬，玛丽成为「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的经典案例。她搭上英国皇家邮轮「川夕法尼亚号」（RMS Transylvania），好到美国投靠已经安顿下来的两位姐姐。尽管她的身分是家务女仆，但身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哪怕是按照她儿子近九十年後颁布的新移民法严苛规定，玛丽照样获准入境。她在抵达纽约前一天满十八岁，不久後遇到佛瑞德。

佛瑞德与玛丽於一九三六年一月的某个周六结婚。在曼哈顿的卡莱尔酒店（Carlyle Hotel）办过婚宴後，夫妻俩到大西洋城度了一晚蜜月。星期一一早，佛瑞德就出现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

这对夫妇搬入的第一个家位於韦勒姆路（Wareham Road），街道

的另外一头就是佛瑞德和母亲住处所在的德文郡路（Devonshire Road）。最初那几年，玛丽对自己的财务和社交际遇出现剧烈变化而心存敬畏。相对於「当」同住帮佣，她如今「有」同住帮佣；相对於争夺有限资源，她现在是房子的女主人。有空档去担任志工，有闲钱去购物，她永远不回首过往，这或许得以解释她为什麼会妄下评断其他类似出身的人。她与佛瑞德合组全然传统的生活，严格划分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他经营他的公司，每天在布鲁克林待上十个钟头，有时是十二个钟头，一个星期只有一天例外。她管理房子，但他统治房子，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母亲也是。伊莉莎白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婆婆，在儿子成家的头几年，她确保玛丽知道谁才是当家之人：她上门会戴上白手套，让玛丽注意到她对媳妇操持家务的期望，毫不隐晦地嘲笑玛丽最近的职业。

尽管伊莉莎白带来阴霾，对佛瑞德与玛丽来说，那段早年岁月充满了活力与可能性。佛瑞德一路吹着口哨下楼上班，晚上回家後则一路吹着口哨上楼回房，换好乾净的衬衫吃晚饭。

玛丽与佛瑞德没有讨论过婴儿的名字，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夫妇俩结合玛丽的名字与中间名，将女儿取名为玛丽安。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在一年半後、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生，名字来自他的父亲，再做一点小改变：老佛瑞德的中间名来自母亲的婚前姓「Christ」，他儿子的则是「Crist」：佛瑞德里克．克里斯特。除了他的父亲，每个人都叫他佛瑞迪。

看起来，甚至早在他出生之前，佛瑞德就已替他规划好前程。尽管他年岁渐长，开始感受到期望加诸身上的负担，但佛瑞迪早期受惠於他的地位，玛丽安跟其他孩子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毕竟，他在父亲的计画中占有特殊地位：将成为川普帝国壮大与繁荣永续的工具。三年半後，玛丽诞下另一个孩子。伊莉莎白出生前不久，佛瑞德到维吉尼亚滩（Virginia Beach）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军人返国引发的住房短缺，为他创造兴建海军军人和军眷公寓的机会。佛瑞德有的是时间强化技术和增加让他取得工作的声望，因为当四肢健全的年轻人徵召入伍时，他跟随他父亲的脚步，也选择不从军。

透过兴建许多房屋累积的经验，加上与生俱来就会利用媒体达到目的的技能，佛瑞德被介绍给背景显赫的政治人物，在他们身上学到如何在正确时间点求助，还有最重要的：争取政府的钱。维吉尼亚滩的诱惑是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简称FHA）释出的优渥资金，让佛瑞德学到用政府救济款打造房地产帝国的好处。小罗斯福总统於一九三四年成立FHA，但到佛瑞德开始利用他们的慷慨时，该机构似乎已远远偏离原始宗旨。FHA主要目的曾是确保兴建足够的平价住宅，以因应美国持续成长的人口。但二战後的FHA似乎同样考虑到，让佛瑞德．川普这类地产开发商发财。

维吉尼亚州的建案也是一个机会，让他磨练在布鲁克林学到的专

长：尽可能快速、有效率和低成本地完成大规模建案，同时仍设法让房子对租屋族具有吸引力。由於往返皇后区通勤变得太不方便，佛瑞德把全家人、包括仍在襁褓中的伊莉莎白在内，都迁到维吉尼亚滩。

从玛丽的观点来看，除了发现自己身处不熟悉的环境外，维吉尼亚州的生活与牙买加地产社区相去无几。佛瑞德长时间工作，留下她独自照顾三名不满六岁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生活围绕在佛瑞德的同僚，或他所需要服务的人们。一九四四年时，FHA资助佛瑞德建案的资金耗尽，一家人又搬回纽约。

一回到牙买加地产社区，玛丽遭遇流产，严重到她花了好几个月才完全康复。医师告诫玛丽提防再次怀孕，但她一年後发现自己又有喜了。这次的流产使年长和年幼的孩子间产生巨大的年龄差，排行中间的伊莉莎白与前後两位手足各相差约四岁。玛丽安与佛瑞迪比年纪最小的孩子年长甚多，几乎分属两个不同的世代。

排行第四的次子唐纳出生於一九四六年，正逢佛瑞德开始规划全新的家宅。他买下韦勒姆路住处正後方的半英亩地皮，就坐落於俯瞰贯穿整个社区的宽广林荫大道——米德兰大道（Midland Parkway）的山丘上。当孩子们得知即将搬家，他们开玩笑说，不用找搬家卡车，把行李滚下山丘就好。

比起占据社区北部山丘的许多豪宅，面积超过四千平方英尺的大宅算小，也没那麼富丽堂皇，却仍是该街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居所。坐落於丘顶，午後的大宅阴影投射在人行道通往前门的宽石板台阶上。这一道前门，只能在特殊场合使用。唤起《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年代种族歧视记忆的草坪骑师（Lawn jockey）雕像一开始漆成粉红色，後来则换成花卉。位於前门上方三角楣的仿造纹章仍然留着。

尽管皇后区後来成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但在一九四○年代，当我祖父买下地皮，盖出宏伟、有着二十英尺高柱子的红砖造乔治亚时代建筑时，该区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白人。上中产阶级的牙买加地产社区就更白了。第一个义大利裔美国人家庭於一九五○年代搬来时，佛瑞德还感到愤慨。

一九四七年，佛瑞德正着手推动他事业发展以来最重大的建案：海岸港。准备在布鲁克林的班森贺（Bensonhurst）打造一个占地超过三十英亩，拥有三十二栋六层楼建物和一座购物商场的建筑群。正如後来的唐纳同时利用纽约市和纽约州笼络他的减税措施，这次的愿景将让佛瑞德直接从FHA的资金中回收九百万美元。佛瑞德之前批评租用两千两百零一间公寓的人们是「有害身心」的族群，暗指正直的人只会住独院住宅，也就是他早期专攻的建案类型。但九百万美元说服了他。大约那个时候，当佛瑞德的财富明显只会持续增加时，他与母亲为孩子们设立信托基金，让财富免於被课税。

尽管於公於私都是残忍的独裁者，佛瑞德已变成结识与奉承更有权力、人脉更广的人士的专家。我不知道他是怎麽学到这个技巧的，但他之後会传授给唐纳。他和民主党布鲁克林党部、纽约州政治机构和联邦政府的领导人逐渐发展出关系，其中许多人是房地产业的重要玩家。如果取得资金代表巴结掌握了FHA钱袋拉链的地方政客，那就做吧。他加入长岛（Long Island）南岸的专属俱乐部，接着是北山乡村俱乐部（North Hills Country Club），两处都被他视为极佳场所，可招待、说动和结交最能按他心意输送政府资金的人士，很像唐纳在一九七○年代於纽约市「俱乐部」（Le Club）及各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做的事情。

据说佛瑞德小心翼翼地和黑帮合作，以确保平安无事，如同唐纳後来被指出在川普大楼与大西洋城赌场的做法。佛瑞德在康尼岛的另一个开发案海滩港获准时，这个面积四十英亩的二十三栋建物群，让他从FHA的拨款中净赚一千六百万美元，用纳税钱盖房的策略明显是极其成功的。

虽然佛瑞德的事业建立在政府财政的力挺，但他痛恨缴税，会尽一切所能避税。在帝国扩张的高峰期，他绝不替没必要做的事情掏出一毛钱，他「从未」负债，这个规矩倒是没有延伸到儿子们身上。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塑造出的匮乏心态约束，佛瑞德的财产不存在债务或法律请求权（free and clear）。租金为公司带来庞大利润，就他的资产净值而言，佛瑞德过着相对朴素的生活，被孩子们嘲弄为「把钱守得比鸭子的屁眼还紧」。尽管让孩子学钢琴和参加私人夏令营（符合佛瑞德对男人在生活中影显身分地位的期望），他的长子长女却是带着「穷白佬」的感觉成长。玛丽安与佛瑞迪要步行十五分钟到一三一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 131），当他们想要进到市区，也就是纽约外行政区的曼哈顿时，他们要从一六九街搭地铁。当然，他们不穷。除了父亲之死为早年带来些许困顿外，佛瑞德也从未穷过。

佛瑞德的财富提供他入住任何地方的机会，但他将大多数的时光花在距离儿时老家不到二十分钟路程的地方。除了结婚初期跟玛丽到古巴度过几个周末，佛瑞德从未离开美国。完成维吉尼亚州的建案後，他甚至很少离开纽约市。

他的商业帝国规模大、很赚钱，却同样是地方性的。佛瑞德持有的建物总数超过四十八栋，但建物本身的楼数相对较少，也一律走效益主义。他拥有的财产几乎只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就他的看法，曼哈顿的炫目、诱惑与多元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新大陆，在那时候似乎就是遥不可及。

就在一家人搬进大宅时，社区的每个人都知道佛瑞德．川普是何许人物，玛丽则接受她身为有影响力的富商妻子的角色。她开始频繁涉入慈善工作，包括牙买加医院妇女辅助团（Women’s Auxiliary）和牙买加日间托儿所、主持午宴和出席正式募款晚宴。

无论夫妇俩的成功有多麽巨大，佛瑞德与玛丽两人在抱负和天性之间都持续紧绷。就玛丽的情况来说，她的童年即使称不上被全盘剥夺，但也是匮乏得让她印象深刻。至於佛瑞德，则是源自巨大生命损失後的谨慎，包括他的父亲、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一家人在父亲死亡後体验过的经济不确定感。虽然川普管理公司每年赚进数百万美元，佛瑞德还是忍不住捡起派不上用场的钉子，或是仿制廉价农药。尽管玛丽轻松获得新地位与随之而来的好处（包含一位同住管家），她仍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大宅内的琐事，缝衣、烹饪与洗衣。彷佛两人都无法彻底弄懂，如何调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和他们实际允许自己拥有的事物。

尽管节俭，佛瑞德既不谦虚，也不低调。他在事业早期就曾经谎报年龄，以显得更为早熟。他早有作秀的倾向，经常用夸饰法做生意，每一项东西都是「超棒」、「了不起」与「完美」。他用新完工房屋的新闻稿淹没当地报纸，接受许多访谈以赞扬自己房地产的优点。他把广告贴满南布鲁克林，还雇用驳船，挂满看板，就停在岸边浮动。但他比不上後来的唐纳。他能进行一对一人际互动，和拍政治关系良好人士的马屁，然而在大型团体面前演说或掌控电视访谈就显得力有未逮。他曾参加卡内基（Dale Carnegie）公开演说课程，但表现太差，甚至连平常顺从他的孩子们都因此取笑他。就像有些人不适合露脸，佛瑞德有着一些密室活动和平面媒体造就的社交自信。在他往後牺牲长子来支持次子时，这个事实会更加显着地呈现。

佛瑞德在一九五○年代听闻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牧师，那套浅显的自给自足启示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身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 Manhattan）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 Church）的牧师，皮尔很受成功商人的喜爱。「成为商贾不在赚钱，」他写道：「成为商贾是要服务人民。」皮尔是江湖郎中，但他是个坐拥有钱有势教堂的江湖郎中，他有个讯息要推销。佛瑞德不是读书人，但不可能不知道皮尔广受欢迎的畅销书《正面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对佛瑞德来说，光书名就够了，他决定加入大理石学院教堂，尽管他跟家人很少出席。

佛瑞德对自己有积极的态度和无限的信心，尽管他严肃而拘谨，或瞧不起孩子朋友这类对他没利益的人们，但他能轻易展露微笑，就算他正告诉某人他或她恶心时也一样，而且心情通常不错。他有理由如此，因为他掌控他天地里的大小事物。除了父亲过世之外，他的人生之路一直相当平顺，总能获得家庭和同事的鼎力相助。从他早期兴建车库起，他的成功一直蒸蒸日上。他努力工作，但不像大多数凭靠自己努力工作的人们，他获得政府补助金的奖励、身边亲信几乎无限的协助，以及巨大的财富。佛瑞德不需要阅读《正面思考的力量》，就能以自己的目的吸收皮尔讯息中最肤浅和自利的层面。

预诵繁荣的福音，皮尔的教义宣称，为了依上帝希望的方式成功，你需要的只是自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障碍摧毁你的快乐与幸福。只有你愿意被打败，你才会被打败。」皮尔写道。那个观点俐落地确认佛瑞德早有的想法：他有钱，因为他应得的。「相信你自己！对你的能力有信心！……自卑和不足感妨碍你的希望实现，但自信能导向自我实现和成功的成就。」自我质疑不是佛瑞德人生组成的部分，他从未考虑过自己失败的可能性。如皮尔也写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认识到，被泛称为自卑情结的弊病，让多少可怜人受到妨碍、感到痛苦。」

皮尔原始的繁荣福音实际补足了佛瑞德始终挥之不去的匮乏心理。对他来说，不是「拥有越多，就能施予越多」，而是「拥有越多，就能拥有越多」。财务价值等同自我价值，金钱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佛瑞德．川普拥有越多，他就更好。如果他将某物给其他某人，只会使那个人的价值更多，而他的价值更少。他会把这个信念全都传授给唐纳。

第二章

长子

佛瑞迪家族长子的地位，已从保护他远离佛瑞德身为父亲的最恶劣冲动，变成巨大而紧张的负担。当他年纪越长，越在父亲置於他身上的责任，以及天生倾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之间左右为难。

佛瑞德一点都不觉得两难，他儿子应该把时间花在Z大道（Avenue Z）的川普管理公司办公室，而不是呼朋引伴到皮科尼克湾（Peconic Bay），佛瑞迪在那里学会并爱上划船、钓鱼和滑水。等到佛瑞迪成为青少年时，他知道他的未来是怎样，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是怎样，也知道他还不符合期望。他的朋友们注意到，总是一派悠闲、爱好嬉闹的佛瑞迪，待在他们称之为「老人」的佛瑞德身边时，就会变得焦虑与局促不安。

体格健壮、身高六尺一寸（约一百八十五公分），头发从退後的发际线开始往後梳成油头，几乎只穿剪裁讲究的三件式西装，佛瑞德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在孩子身边显得僵化又拘谨，从不跟他们玩球或任何一种游戏，彷佛就像他不曾年轻过一样。

当男孩们正在地下室传接球时，听到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就足以令佛瑞迪当场冻结。

「快停！我爸回来了。」

见到佛瑞德走进房间，男孩们有股起身向他敬礼的冲动。他和每个男孩握手时问道：「所以，这是什麼？」

「父亲，没什麼。」佛瑞迪会说：「大家正准备好尽快离开。」

只要「老人」在家，佛瑞迪就会保持安静和高度警戒。

青少年时代的佛瑞迪开始对父亲说谎，隐瞒他在大宅外的生活，以避免招来意料中的嘲笑或责难。他隐瞒和朋友们从事的课外活动、抽菸（这是玛丽安十三岁时，介绍给小一岁弟弟的嗜好），甚至跟父亲说他要到附近帮至交好友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溜一只不存在的狗。

打个比方，佛瑞德不会发现，佛瑞迪跟圣保罗中学（St. Paul’s School）的好友荷马（Homer）偷开灵车兜风。把车还给殡仪馆前，佛

瑞迪还先开到加油站，好把油加满。当他下车走向加油机时，原本躺在後面以体验死亡是什麼感觉的荷马突然坐了起来，在加油机另一侧的男子以为他看到了亡者复活而放声尖叫，让佛瑞迪与荷马笑到飙泪。佛瑞迪靠那类恶作剧而活，但只有父亲不在家时，才会用这些把戏逗兄弟姐妹开心。

就一些川普家的孩子而言，说谎是生活方式。对佛瑞德的长子来说，说谎是防御。不纯粹是逃避父亲的反对或避免惩罚，也像其他人一样，是幸存的方式。例如，也许是害怕禁足或禁闭等寻常的惩罚，玛丽安从未违抗父亲。唐纳说谎首先是自我膨胀，本意是说服其他人，相信他比实际上要好。对佛瑞迪来说，违背父亲的结果不同，不只在程度，也是在性质。面对父亲试图压制他的天生幽默感、冒险精神与感性，说谎成为他仅有的防御。

皮尔关於自卑情结的看法，协助塑造佛瑞德对佛瑞迪的严苛评价，同时也容许他回避为任何一个孩子扛起责任的必要。

软弱或许是所有罪名中的最大罪，佛瑞德担心佛瑞迪会像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的弟弟约翰：温和，算不上没有野心，但兴趣都在他认为深奥又不重要的工程和物理一类「不对」的事情上。这种温和出现在与他同姓氏的人身上是不可想像的，等到一家人搬进大宅，且佛瑞迪十岁时，佛瑞德就下定决心，要他强硬起来。只不过，像大多数没注意拿捏分寸的人，他矫枉过正了。

「愚蠢，」每当佛瑞迪表达想养宠物或恶作剧时，佛瑞德都会说：「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麼？」

佛瑞德的语气是如此轻蔑，使得佛瑞迪畏畏缩缩，这反而让他更加恼火。

佛瑞德痛恨长子把事情搞砸，或无法靠直觉知道他被要求做什麼，但更加厌恶佛瑞迪被责备後的道歉。说了「爸爸，对不起」，佛瑞德会嘲笑他。

佛瑞德要长子成为他口中的「杀手」（一九五○年代在康尼岛收租金其实并不是什麼高风险的事情，原因不得而知），但佛瑞迪的气质就是与之相反。

实际上，成为杀手是变得无坚不摧的代号。尽管佛瑞德对父亲过世看似没有任何感受，此事之突然仍令他措手不及、失去平衡。多年後谈及此事时，他说：「然後他死了，就那样，似乎不是真的。我没那麼难过，你知道孩子是怎样。但看到母亲在哭，变得如此悲伤，让我难过。不是我自己对发生的事情有感觉，而是看着她那样让我感觉不愉快。」

也就是说，这股失落让他感到脆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母亲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是被强加到他身上的，特别是他没

有同样的感觉。那股强加感一定非常痛苦。在那个当下，他不是宇宙的中心，那是不可接受的，让他今後拒绝认知或感到失落（我从未听过他或家族里的其他任何人说起曾祖父）。

就佛瑞德而言，他能放下，是因为没有比「已」失去什麼更重要了。

佛瑞德赞同皮尔对人类失败的想法，也就没有领悟到，他嘲笑与质疑佛瑞迪，正创造出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自尊。佛瑞德同时告诉儿子，他绝对必须成功，而他永远做不到。所以，佛瑞迪存在於一个有罚无赏的体制。其他的孩子，特别是唐纳，已不得不注意到。

唐纳的状况有点不同。

得益於七岁半的年龄差距，他有足够的时间，旁观佛瑞德羞辱哥哥的行为，与哥哥得到的羞愧感中学习。他学到的最简单教训，就是不能变得像佛瑞迪一样；佛瑞德不尊重他的长子，所以唐纳也不会尊重。佛瑞德觉得佛瑞迪脆弱，因此唐纳也同感。两兄弟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接受这个现实状况。

理解任何家庭内的家务事是困难的，对该家庭成员来说也许更是难中之难。无论长辈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几乎不可能相信长辈对他们蓄意造成任何伤害。佛瑞迪更容易认为，父亲把儿子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中，自己才是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保护他对父亲的爱，更优先於保护自己免受父亲虐待。唐纳从父亲对待哥哥的表象开始相信，「爸爸没有伤害佛瑞迪，他只是试图教我们如何当个真男人，而佛瑞迪失败了」。

虐待可以是安静与潜伏的，就跟咆哮与暴力一样，甚至更常发生。就我所知，祖父不是一个肢体暴力者，甚至不是特别容易愤怒的人。他不需要如此，就能得到他想要的，几乎总是如此。

他不是无力修正激怒他的长子，实情是佛瑞迪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那种人。佛瑞德将长子的人格与天生能力的每一个层面降值降等，把他大卸八块到面目全非，只剩下自我伤害，还有拚命取悦一个用不着他的男人。

唐纳逃脱相同命运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人格对父亲的目的有用。这就是社会病态者的作法：拉拢其他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冷酷、有效率，不容忍异议或反抗。佛瑞德也摧毁唐纳，但不是对待佛瑞迪那般扼杀他。反之，他让唐纳发展和体验整个人类情感光谱的能力发生短路。限制唐纳接触自己的感觉，将其中许多感受渲染成不能接受，佛瑞德扭曲自己儿子的世界观，损害他的存活能力。相对於父亲野心的延伸，他自己作主的能力被严重限缩。当唐纳上学後，限缩的影响变明显了。他的双亲都没有以帮助他理解世界的方式跟他有过交流，促成他无力跟他人和睦相处。对他来说，阅读社会线索也极端困难，这个问题更延续至今。

理想上，家规反映社会规则。当孩子们去到外面的世界时，通常知道如何表现。孩子们上学理当知道不应拿其他小孩的玩具，不该欺侮或取笑其他小孩。唐纳对此则一无所知，因为大宅的家规，至少是男孩适用的家规，就是不计代价地强硬，说谎是行得通的，承认错误或道歉就是软弱，和他遇到的校规相冲突。佛瑞德对世界如何运作的根本信仰清楚明白，一生只能有一名赢家，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是输家（基本上排除共享的能力），亲切就等同脆弱。

唐纳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在佛瑞迪身上看过，无法服从父亲的规则会受到惩罚，不但严厉，且常是公开羞辱。所以，就算是在父亲视线范围之外，他也持续坚守规定。不意外的，他对「正确」与「错误」的理解，和大多数小学教导的课程也相抵触。

唐纳越发自大，部分是一种针对遗弃感的防卫及缺乏自尊的解方，充当不安全感加深的防护罩。结果是，唐纳疏远大多数人，对他来说，那样比较容易。不管是表达，或是面对，大宅内的生活让所有孩子对情感无论怎样都感到不自在。男孩们的情况可能更糟糕，他们对人类情感的范围极端狭窄（我从未在家族内看过任何男人哭，或看过他们在与人偶遇与道别时，用握手以外的方式表达相互感情）。接近其他孩子或权威人士，感觉就像冒险背叛父亲。尽管如此，唐纳展现自信、觉得自己不适用社会规则，和过分地表现自我价值，还是吸引到一些人。极少数人仍未看穿他对力量的自负、为成就虚妄逞能、为彰显魅力而对他们表达肤浅的关注。

唐纳早就发现，将苍白的罗伯特惹毛到崩溃有多容易，这也是他永远玩不腻的游戏。没有人会去打扰罗伯特，他太瘦、太安静，捉弄他没有乐趣，但唐纳喜欢展现他的权力，就算对象只是年纪较轻、瘦小、脸皮还极薄的弟弟。有一次，出於挫折和无助感，罗伯特将他们的浴室门踹出一个洞，让他陷入麻烦，尽管事实上是唐纳驱使他这麽做的。当母亲叫唐纳停手时，他没理会；当玛丽安与佛瑞迪要他停手时，他也不听。

某一年的耶诞节，男孩们收到三辆汤卡（Tonka）玩具卡车，很快就成为罗伯特喜爱的玩具。唐纳一发现这件事，就开始把玩具卡车藏到弟弟找不着的地方，并假装他也不知情。最後，罗伯特的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唐纳则要胁他再哭的话，就要当着他的面拆毁玩具卡车。拚命想救卡车的罗伯特跑去找母亲，玛丽的解决方式却是把玩具卡车收到阁楼，实际上惩罚到无辜的罗伯特，让唐纳觉得他无敌了。他没有因自私、顽固或残忍获得奖励，但他也没有为那些缺点受到惩罚。

玛丽仍是局外人，当下没有介入，没有安慰儿子，表现得像她没有立场去做这种事情。甚至到一九五○年代时，整个家沿着性别界线形成深度分裂。虽然佛瑞德的母亲曾是他的生意夥伴，名副其实地创办他的公司，但佛瑞德和妻子明显从未成为夥伴过。女儿归她管，儿子是他的。玛丽每年回路易斯岛老家探亲时，只有玛丽安与伊莉莎白随行。玛

丽为男孩们煮饭、为他们洗衣服，但她不觉得自己有立场去引导他们。她很少与男孩的朋友们交流，已因早年相处经验而受损的亲子关系越发疏离。

十四岁的佛瑞迪将一碗马铃薯泥倒到七岁的唐纳头上，让他弟弟的自尊深深受伤，当玛丽安藉二○一七年白宫生日晚宴敬酒的场合重提旧事时，他仍旧对此心怀芥蒂。这不是什麼大事，或者它不应该是大事。唐纳又一次捉弄罗伯特，没人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才七岁，他已觉得没必要听从母亲。她在生病後就未能修补亲子裂痕，让他对母亲抱持轻视。最後，罗伯特的哭泣与唐纳的数落都太过头了，一个即兴的权宜之计变成家族传奇：佛瑞迪拿起手边一个不会造成任何真正伤害的东西——一碗马铃薯泥。

每个人都笑了，笑到停不下来。他们「朝着」唐纳大笑。这是唐纳首度被人羞辱，而且还是他之後相信比自己次等的人。他之前不知道，在战斗之中，羞辱是只有一人能挥舞的武器。在所有人之中，是那个佛瑞迪把他拖进一个羞辱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世界，让感觉更加糟糕。从此之後，他绝不容忍自己再次感受到那个感觉。从此之後，是他挥舞武器，绝不被锋刃所指。

第三章

伟大的我

当玛丽安就读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两年後轮到佛瑞迪去读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时，唐纳看着哥哥苦於满足父亲的期望，大半还是以失败收场後，他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当然，那些期望本身就模糊不清。佛瑞德有着独裁者的习性，预设手底下的喽罗不需他开口也知道自己该做什麽。一般来说，得知自己做了正确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没有为此挨骂。

但对唐纳而言，不要成为父亲瞄准的目标是一回事，赢得他的宠爱则是另外一回事。为达到目的，唐纳几近杜绝任何可能和哥哥共通的特性。除了偶尔跟佛瑞迪与他的朋友去钓鱼旅行外，唐纳成为一个乡村俱乐部和办公室的生物，和父亲唯一的不同之处只有高尔夫球。他也在目前为止没被惩罚的行为上变本加厉，包括霸凌、用手指指着人、拒绝负责和无视权威。他说他「反抗」父亲，佛瑞德则「尊重」他。真相是，他能反抗父亲，是因为佛瑞德让他这麽做。当他年纪非常轻时，佛瑞德的注意力没放在他身上，整个焦点都放在其他方面，也就是生意和长子，就这样。当唐纳十三岁离家去就读纽约军事学院（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时，佛瑞德开始欣赏他的无视权威。佛瑞德通常是位严格的父亲，但他开始注意到唐纳的自大与霸道後，将之视为冲动并予以接受。

受到父亲鼓励，唐纳最终开始相信自己的炒作。当他十二岁时，右嘴角经常上扬冷笑，展现出过盛的自我优越感，还被佛瑞迪取了一个「伟大的我」（the Great I-Am）的绰号，以呼应他在主日学的《出埃及记》课程中所学到上帝首度向摩西揭露身分的情节。

因为在灾难般的环境被养育长大，唐纳根据丰富的经验直觉掌握到，他绝不会被安抚或得到慰藉，特别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麽，假装关爱就没有意义。无论唐纳在任何层面是否知情，他的双亲都不曾去正视他究竟是什麽人，或可能成为什麽人。玛丽太过衰弱，佛瑞德只对哪一个儿子最有用途感兴趣，好让他变成对自己最有利的人。结果，唐纳发展出一副名为刚性人格的铠甲，经常保护他免於痛苦和失落，却也阻止他理解如何信任并接纳他人。

佛瑞迪害怕到不敢跟佛瑞德要求任何事情，让唐纳看到那种含蓄的结果。每当佛瑞迪偏离佛瑞德常不说出口的期望，甚至只是一点点，下

场就是受辱或羞愧。唐纳会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他转而选择设法讨好父亲，用的是冲破每一道哥哥从没胆子尝试的障碍，也完全知道要怎麼演：佛瑞迪退缩时，唐纳就耸耸肩。没有徵得许可就拿走想要的东西，但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害怕。不管唐纳是否了解潜在讯息，但佛瑞德知道：一如人生，在家只会有一名赢家，其他每个人必须输。佛瑞迪持续试着做「对的」事情，但是无法做到，让唐纳开始了解，他什麼「错的」都不能做，所以他停止试图做任何「对的」事情。他变得更大胆，更具侵略性，因为他很少受到挑战，或被世上唯一一个要紧的人、也就是他父亲追究责任。就算是明显的坏行为，佛瑞德就是喜欢他的杀手态度。

唐纳的每一个违规行为都成为博得父亲好感的尝试，就像他在说：「看，父亲，我是强硬的那一个，我是杀手。」因为没有任何阻力，他变本加厉，直到阻力出现为止，但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佛瑞德长时间待在办公室，不常见到家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因而他不会被唐纳的行为打扰，但唐纳的母亲却会因此心烦意乱。玛丽完全无法控制他，唐纳处处不服她，试图管教但都被置之不理。他顶嘴，甚至不承认自己错了。即便母亲是对的，他也会反驳她，拒绝让步。他捉弄弟弟，偷走玩具，拒绝做分内家事或任何被吩咐去做的事情。也许最糟糕的一点就是玛丽有洁癖，而他是一个懒鬼。无论她怎麼威胁，他就是拒绝自己收拾善後。对佛瑞迪曾经有效的「等你父亲回家吧」的恐吓，被唐纳当成笑话，因为父亲根本不会介入。

一九五九年时，唐纳的好斗、霸凌、跟教师争辩等不当行为变得太过分了，邱林学院已经达到容忍极限。佛瑞德在校董会占有一席之地有好有坏，一方面，校方对唐纳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的时间已比原本要长；另一方面，这造成佛瑞德一些不便。佛瑞德不介意唐纳发泄，但他对年纪小得还不知如何回嘴的孩子人身攻击，已升级成肢体冲突，这将会占用佛瑞德的时间。佛瑞德同意另一位邱林学院校董的推荐，把唐纳送到纽约军事学院看管。把他扔给军训教官和不会忍受他狗屁的高年级生，可能会使佛瑞德的这名新兴门徒更加坚强。比起处理唐纳，佛瑞德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玛丽是否在最终决定上有任何发言权，但她也没有挽留儿子留在家中，这是一个唐纳不得不注意到的失败，肯定在他心中重播了母亲曾经遗弃他的记忆。

反对无效的唐纳被纽约军事学院录取。这是一间男子寄宿学校，位於纽约市北方近六十英里，可不像佛瑞迪上的圣保罗中学是所名校，家里其他孩子称纽约军事学院为一所「感化院」，没有人会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而把儿子送进去。唐纳正确地了解到，这是惩罚。

当佛瑞迪发现时，有点困惑地告诉朋友：「对，他们无法控制他。」这真没有任何道理，他的父亲似乎总是支配着「每一个人」。佛

瑞迪不知道的是，父亲对唐纳的兴趣不同於对他的兴趣。如果佛瑞德试图管教唐纳，他就会被管教，但他被送走之前，佛瑞德没有足够的兴趣为唐纳或其他三个孩子操心。

不论家庭的情况如何，双亲对孩子总是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对川普家的小孩来说，佛瑞德与玛丽的特殊病状对後代有着极端的影响。当五名孩子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准备走到外面的世界时，他们都已有着明显的缺点：

第一个出生的玛丽安，身任在厌女症家庭中成为一个聪明有野心的女孩，虽然年纪最长，但因为她是女孩，转由身为长子的佛瑞迪得到父亲的全部关注，她只能和在家中无权的母亲结盟。结果是，申请达特茅斯学院家政部（Dartmouth home economics program）落榜时让她心碎，只能接受她称为「实质修道院」的曼荷莲学院。最终，因为她觉得父亲在乎，做出她相信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佛瑞迪的问题在於他无法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伊莉莎白的问题是家人对她漠不关心，她不只是排行老三（还是女孩），更因三到四岁的年龄差，和哥哥与弟弟产生隔阂。身为腼腆胆怯的少女，又学到双亲都把孩子的话当耳边风的教训後，她的话就不多了。然而，她直到步入中年仍对他们忠心耿耿，每周末回到大宅时，仍希望获得「爸比」（Poppy）的注意。

唐纳的问题在於，他为防备早年的遗弃恐惧感，发展出好斗刚性的人格，还有他目击父亲虐待佛瑞迪的过程，让他无法接受真实人类的情感。

事後想起来，罗伯特的问题在於他是老么。

玛丽安、伊莉莎白或罗伯特做的事情都无法取得佛瑞德的认可，他们对他没有利益。如同行星环绕特大恒星运行，就算他们沿着他铺好的道路前进，五人仍被他的意志力量隔开。

佛瑞迪对未来的计画，仍是必须成为父亲在川普管理公司的得力助手，但一九六一年第一次驾驶塞斯纳一七○型小飞机（Cessna 170），从史莱廷顿飞行俱乐部（Slatington Flying Club）的简易跑道起飞时，他的前途改变了。

只要他满足主修的商科课程要求，保持成绩水平，就能飞行、宣誓入兄弟会与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军官训练团（US Air Force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出於好玩，佛瑞迪选择历史上是犹太人兄弟会的西格玛．阿尔法．穆（Sigma Alpha Mu）。无论此举是不是故意违抗常用「跟我讨价还价」（Jew me down）等反犹用词的父亲，佛瑞迪的兄弟会部分成员最终成为他的挚友。加入预官训练团则完全满足另一

个目的：佛瑞迪渴望合情合理的纪律。预官训练团公开透明的成就和奖励制度让他成长茁壮。如果你听命行事，服从会获得认可；如果你达成或超过预期，就会获得奖励；如果你犯错或未能遵守命令，则会收到和违纪行为相称的惩戒。他热爱军阶制度，他热爱军服，他热爱清楚象徵成就的勳章。当你穿着军服，别人能轻易辨认出你的身分和成就，还会得到相应的认可。跟着佛瑞德一起生活则是相反，被预期做得好却从未获得认可，只有犯错会被叫出来惩罚。

取得机师执照和加入预官训练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登录一定时数，获得特定仪器认证，然後取得执照。飞行课程最终成为他的第一优先要务。就像划船，他对待飞行非常认真，开始缺席兄弟会的牌聚，好去飞行学校研究或登录时数。但，这不只是找到他擅长事物的快乐，也是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彻底自由之喜悦。

佛瑞迪在夏季一如往常地为佛瑞德工作，但周末时会呼朋引伴向东走，搭乘他在高中时期就买下的船去钓鱼或滑水。玛丽有时会要佛瑞迪带唐纳一起出门。「大夥们抱歉啦，」他告诉朋友们：「但我必须一起带上我那讨厌鬼弟弟。」唐纳的热衷程度可能跟不情愿的佛瑞迪一样。不管父亲怎麼想他的哥哥，佛瑞迪的朋友明显喜欢他，总是玩得很开心。这个事实，和唐纳被灌输的信念相左。

一九五八年八月，就在他展开大学生涯第三年之前，佛瑞迪与挚友比利．德雷克飞到巴哈马（Bahamas）的拿骚（Nassau），在开学前来趟短期度假。两人租下一艘船，花几天时间钓鱼和探索小岛。某一晚他们回到饭店，坐在泳池酒吧时，佛瑞迪遇到一位娇小漂亮的金发女郎琳达．克雷普（Linda Clapp）。两年後，他迎娶了她。

当年九月，唐纳进入纽约军事学院。他从一个能随心所欲的世界，换到一个没整理好床铺就会被罚、没特别理由就会被高年级生撞到墙上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十二岁时丧父，佛瑞德了解到儿子的孤立。从唐纳以八年级生开始就读，直到一九六四年毕业为止，佛瑞德几乎每周末都会来恳亲，这稍微缓解了唐纳的被遗弃感和怨气，也是他首度在自己和父亲间存有少许哥哥没有的连结。唐纳的母亲偶尔会来，但她大多数时候对他的消失感到如释重负。

尽管他不曾想要进入纽约军事学院，但一如预官训练团之於佛瑞迪的影响，那里的稳定环境对唐纳来说具备意义。那里有组织，行为会有後果，有合乎逻辑的奖惩系统。不过，在此同时，纽约军事学院的生活也强化佛瑞德给他的一个教训：不管权力是多麼任意地被授予或获得，有权力的人就必须决定什麼是对与错。就算不总是公平，只要有助於保住权力，在定义上就是对的。

纽约军事学院同样强化唐纳对脆弱的厌恶，因为脆弱也能使我们招

致羞愧感，虽然对开发爱与创造性不可或缺，但他不能容忍羞愧感。出於必要，他必须改善他对冲动的控制，不只避免惩罚，当他犯下需要稍微多一点技巧的违纪行为时，也有助於不容易被发觉。

佛瑞迪大学第四年是整个人生中最棒且收获最多的年分之一，商学位则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他获选为西格玛．阿尔法．穆兄弟会主席，完成预官训练，将在毕业後成为空中国民兵少尉。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一位正式的商业机师，但他无意使用执照。他要去布鲁克林跟父亲一起工作，打算有朝日一日接班。

佛瑞迪在一九六○年夏季进入川普管理公司时，佛瑞德的公司在布鲁克林与皇后区各处持有超过四十栋建筑和建物群，还有数千个单位。佛瑞德带着长子到建筑工地已有好几年；包含布鲁克林的海岸港与海滩港在内的最大开发案，以及靠近他们家所在的牙买加地产社区的较小建案，都在佛瑞迪成长期间的一九四○和一九五○年代盖成。在过去视察时，削减成本（如果比较便宜就自己动手，反之就外包）和节省成本（红砖比白砖便宜一美分）的重要性深植他脑中。佛瑞德还拖着他参加民主党布鲁克林党部的会议和政治募款活动，确保他认识纽约市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政客。

现在，身为全职员工，佛瑞迪开始陪伴父亲到处巡视建筑，和建物管理员联系与监督修缮。我祖父的公司坐落於南布鲁克林Z大道，前身是一间牙医诊所，房间狭窄又光线昏暗，待在工地现场还比较好。佛瑞德的公司一年大赚数百万美元，但只要他相信情况有其必要的话，仍会亲自应付租户。例如，要是一位租户抱怨得有点太大声或太频繁，知道自己名声在外的佛瑞德就会登门拜访。他偶尔一起带上佛瑞迪，以展示如何处理类似情况。

一位租户一再打电话来办公室，通报暖气不够时，佛瑞德登门拜访。敲过门後，他脱下西装外套。这个举动，他通常只在上床睡觉前做。一进到确实寒冷的公寓内，他卷起衬衫袖子（一样，他很少做这样的事），告诉租户，他不知道他们是在抱怨什麼，「这里就像热带啊」。

佛瑞迪开始履行他的国民兵义务。一个月有一个周末，他必须到曼哈顿的军械库（The Armory，可能是华盛顿堡大道军械库〔Fort Washington Avenue Armory〕）报到。佛瑞德对於长子在那些周末的缺席未置一词，让他恼火的是佛瑞迪一年必须休假两星期，前往纽约上州的德拉姆堡（Fort Drum）报到。对不喜欢兵役的佛瑞德来说，这是在浪费他员工的时间。

在布鲁克林度过漫长一天後的某个晚上，佛瑞迪接到琳达的电话，他们超过一年时间没讲过话了。她告诉他，自己已成为美国国家航空（National Airlines）空服员，正派驻爱德怀德机场（Idlewild Airport，现为甘乃迪国际机场）。她记得佛瑞迪曾提过，他父亲在皇后区拥有几间公寓建筑，想知道他能否帮忙找一个距离机场不会太远的住处。佛瑞德在牙买加地产社区有几间建物，搭十五分钟巴士就可到爱德怀德机场。他们在高地大道（Highland Avenue）的萨克森广场公寓（Saxony Hall）找到一间工作室，隔壁就是中央有着大池塘的九英亩森林公园。她马上搬了进去。她和佛瑞迪很快就开始交往。

一年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佛瑞迪带琳达到他们在曼哈顿最爱的餐厅共进晚餐。上鸡尾酒时，他把订婚戒指偷放到琳达的玻璃杯，接着求婚。吃完晚餐後，他们开车到牙买加地产社区，将此事告诉他的双亲。佛瑞德与玛丽得知此事後态度冷淡。

从琳达朴实的出身（父亲是卡车司机，双亲之後到佛州经营一间靠近海滩的蛤蜊小馆），给人不够高尚又缺乏教育的感觉来看，他们推测她肯定是一名拜金女。这是一个基本、蓄意又未能承认现实的误解，因为琳达大概不知道未来的公公到底多富有。如果琳达是拜金女，大概是特别逊色的一个。

鉴於她自己在苏格兰非常朴实的出身，我祖母本来能成为我母亲的盟友，但玛丽．马克劳德爬到顶端後，就把梯子抽走了。至於佛瑞德，他单纯不喜欢她，因为她是佛瑞迪的选择，所以表示她不可靠。

同时，当时的空服员规矩非常严苛，头发太长或体重增加就可能停飞，结婚就可能无法继续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结婚前几个星期最後一次执勤後，琳达就没有独立的收入了。

因为琳达的母亲罹患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必须坐轮椅，他们决定在佛州举办婚礼。在教堂举行结婚典礼後，他们在劳德岱堡（Fort Lauderdale）内陆水道（Inland Waterway）的六十六码头酒店及水上设施（Pier Sixty-Six Hotel & Marina）举办简单的鸡尾酒会。佛瑞德与玛丽不高兴，但他们既然没有提出帮忙出钱的要求，也就没有什麽说话的余地。伊莉莎白正在维吉尼亚州念大学，唐纳也还在纽约军事学院，两人都没出席。新人度完蜜月回来後，川普家勉强同意在纽约举办一场酒会。

川普管理公司至今最大的开发案——康尼岛的川普度假村（Trump Village），预定在一九六三年动土，佛瑞迪将协助筹备工作。佛瑞德预期他会选布鲁克林一栋建筑里的公寓入住，这样他可以就近处理任何突发状况；但佛瑞迪与琳达却搬到东五十六街（East 56th Street），位於第一大道（First Avenue）和萨顿广场酒店（Sutton Place）之间的一个市内一房公寓。他们买下一只贵宾犬，这是佛瑞迪曾有过的第一只宠物，琳达则在几个月後怀孕。当年十一月，佛瑞德里克．克里斯特．川

普三世出生。一个月後，佛瑞迪买下他的第一架飞机——派珀卡曼契一八○型小飞机（Piper Comanche 180）。

耶诞节刚过，他与琳达就飞到劳德岱堡，将飞机和新生儿炫耀给岳父岳母看。琳达的父亲麦克（Mike）常把车停在劳德岱堡机场跑道附近以观看飞机起降，对佛瑞迪与琳达驾机带外孙过来的印象是再深刻不过了。

佛瑞迪与琳达和玛丽安及她丈夫大卫．戴斯蒙（David Desmond，两人於一九六○年成婚）在某次共进每周晚餐时，佛瑞迪把飞机的事情告诉姐姐和姐夫，还补上一句：「别告诉爸爸，他不会懂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他们搬到海兰德广场公寓（Highlander Hall），这是佛瑞德在牙买加地产社区持有的建物之一，就坐落於琳达三年前首度搬到纽约住处的相邻街区，也是迁往长岛房宅的跳板。海兰德是佛瑞德名下典型的建筑，用大型入口掩盖出租单位不合格的事实。大厅有着一个大型的下沉空间，正式会客区和特大号的热带植物展示区，被红龙分隔在两侧。在两者之间，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扇落地窗向外看，就是分朝左右两侧，成曲线通往人行道的宽广铺石路和砖头台阶。台阶的一侧是更夸张的枝叶、高耸橡树及长着深绿巨叶的外来植物，仍是佛瑞德．川普的风格。

这栋建筑位於海兰德大道（Highland Avenue）一处丘陵顶部。这条大道基本上是贯穿牙买加地产社区的分隔线，北侧更有郊区感、绝大多数是白人，南侧是城市、绝大多数是非裔，前门与後门面向两个不同的世界。佛瑞迪与琳达选择一间九楼顶层东南角的两房公寓，一侧可俯瞰公园和远处的牙买加高中（Jamaica High School），另一侧则能看到南牙买加。

佛瑞迪一开始还担心，身为地主的儿子，又是持有建物的公司员工，等於给予居民一封公开邀请函，让他们全天候来打扰他。但建筑物屋龄不到十五年，管理员也能确保其他租户不会来吵他。

搬家後没多久，佛瑞迪就告诉琳达，他想成为职业机师。在川普管理公司工作三年後，他觉得难以忍受。几乎是从一开始，父亲就把他从川普度假村开发案的日常运作中逐出，下放他去处理租户的客诉与监管维护专案。

成为机师让他有机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能过着优渥的生活。在一九六○年代早期、也就是喷射机时代的黎明前，商业机师有过一段为期七年的求职冷冻期。不过，随着航空公司将波音七○七与道格拉斯DC-8引进机队，空中旅行呈现爆炸性的发展。泛美航空（Pan Am）一九五八年推出海外航班，并将喷射机借给美国国家航空的国内线。隔年，环球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与联合航空，都使用比螺旋桨飞机

更大、更强、更安全、搭载更多乘客和飞得更远的喷射机。

飞航勤务扩张带来大量合格机师的需求，因为他们已拥有基本技术，能快速完成训练驾驶新喷射机。环球航空是最後一家拥抱波音七○七的航空公司，有着必须迎头赶上的沉重压力。在爱德怀德机场与佛瑞迪停泊卡曼契小飞机的麦克阿瑟机场（MacArthur Airport），墙上贴满商用飞机驾驶舱需要新血的徵人启事。

琳达说不行，曾当过空服员的她知道机师到外站留宿时会搞什麼花样。佛瑞迪同意暂时把这想法束之高阁，过好在川普管理公司的每一天。

但他和父亲相处的状况恶化。当佛瑞迪带着创新想法找上他时，佛瑞德毫不留情地否决。当他要求承担更多权责时，佛瑞德置之不理。

佛瑞迪试图证明他能做行政主管的决定，为其中一栋较老旧的建物下一份窗户订单。佛瑞德发现时，他暴怒了。「你应该要刷一层天杀的油漆，不是浪费我的钱！」员工看着他大吼：「唐纳比你好十倍。他绝不会做出任何那麼笨的事情。」唐纳当时还在读高中。

父亲在手足面前羞辱他是一回事，但那间办公室内的人不是佛瑞迪的同辈。总有一天，佛瑞迪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老板。刚萌芽的权威被如此公开削弱，感觉就像挨了一记重击。

当晚回家，他告诉琳达自己觉得陷入了困境，坦承他为父亲工作从未快乐过。这完全不是他曾预期的，也是第一次发现川普管理公司可能是他的一条死路。「琳达，我向环球航空投履历了。我必须这麼做。」他不再要求什麼了。佛瑞德可能和他断绝往来，但佛瑞迪愿意冒着失去遗产的风险。机师，特别是为环球航空工作的机师，享有优厚津贴与就业保障。他将能靠自己养活小家庭，他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佛瑞迪告诉父亲，他要离开川普管理公司去当商用机师时，佛瑞德目瞪口呆。这是背叛，他无意让自己的儿子忘记这一点。

第四章

期待飞翔

只有最好的机师会被指派飞行众人垂涎的波士顿到洛杉矶航线。一九六四年五月，佛瑞迪以职业机师身分，首度正式执飞波士顿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到洛杉矶国际机场（LAX）的航班，距离他申请当年度第一个培训班还不到六个月。

佛瑞迪在飞机驾驶舱的成就让他在川普家独一无二，佛瑞德的其他孩子都无法完全靠自己与其并驾齐驱。玛丽安算是最接近的，一九七○年代早期，她靠自己读完法律学院，用九年时间交出一份扎实的检察官履历，但她最终获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仍可能是因为唐纳动用关系帮的忙。

伊莉莎白数十年来一直在佛瑞德为她安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工作。唐纳从一开始就得到扶持，他的每个计画都有佛瑞德的资助与支持，然後又得到无数其他人的资助和支持，一直到现在都是。

除了大学毕业後短暂任职於纽约的一家证券公司外，罗伯特先为唐纳、接着为他父亲工作。就算是佛瑞德，也不全然是白手起家，毕竟是他母亲开办後来成为川普管理公司的企业。

佛瑞迪在大学就靠自己读完飞行学校，违抗父亲（为此，他用剩下的人生付出代价），没有家里的支持，还受到鄙视。先不谈障碍，他已决心尽可能多次向环球航空求职，但第一次就获得录取。

在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绝大多数新任机师会在军中受训。一个典型的培训班有二十名学员，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平民各占四人。二十五岁的佛瑞迪是航空公司於一九六四年第一个机师培训班录取的十二人之一。其中十人曾在军中受训。要考虑到，当时没有飞行模拟器，所有训练都在空中完成，这般成就便更加惊人。当他的兄弟会朋友都在狂欢时，佛瑞迪却在机场登录飞行时数，现在终於全部开花结果。

那时候，空中旅行的诱惑正值高峰，霍华．休斯（Howard Hughes）的环球航空正是潮流的前锋，特别受好莱坞名流喜爱。环球航空为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与卢艾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提供加长型礼车，载着她们往返机场，产生的广告

效应让每一个人都想搭环球航空。作为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环球航空同时飞行国内外的航班。机长就是神，获得相应的对待。同时感谢休斯爱好美女，空服员外貌都像电影明星。

机师们走过航厦时，乘客投以钦佩目光和要求签名等反应，对佛瑞迪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与待在川普管理公司时的挣扎与未受尊重相较，这也是可喜的变化。机场闪闪发亮，和佛瑞迪在纽约那昏暗冷淡的办公室及肮脏建筑工地形成鲜明对比。停机坪上的成排波音七○七与DC-8发出微光，则取代堆土机和两栖铲土机（backhoes）。佛瑞迪掌控驾驶舱，所有的决定不再需要揣摩上意，也不会再受到父亲的批评。

佛瑞迪将他的小家庭搬到位於波士顿洛根机场东北，开车要四十分钟的麻州海岸小港镇马布黑德（Marblehead）。他将他的「游艇」——一艘破旧的波士顿捕鲸船公司（Boston Whaler）小艇停在宽广的港口内，并在不远处的公用绿地周边的各色风格房屋中，租下一栋摇摇欲坠的小屋。

五月的马布黑德诗情画意。佛瑞迪热爱飞行，当地有许多社交活动，像是烤肉、深海钓鱼和远足。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朋友从纽约来拜访他们。只是，一个月过去後，佛瑞迪开始为日程表苦苦挣扎。当他不在飞机驾驶舱时，经常无事可做。琳达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来没出现的问题：他开始喝酒，喝得比其他所有人要多。

可能是想保护她，她的丈夫不再向她吐露任何心事，所以她对父子俩在前一年十二月有过的对话细节并不知情。琳达并不知道，佛瑞迪持续不断受到父亲来自纽约的电话和信件攻击，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佛瑞迪用带着一丝怀疑的声音告诉他们，「老人」为有个「空中公车司机」的儿子感到难堪。父亲不用太费劲就说服他，选择离开川普管理公司代表选择失败。琳达没有完全抓住最关键之处（公允地说，佛瑞迪也可能没掌握到），就是佛瑞德．川普的意见对他儿子有多重的分量。

那一晚，结束最近一次轮班返家的佛瑞迪看似特别紧张。吃完晚饭後，他说：「我们必须离婚。」

琳达震惊了。丈夫正承受比平常更多的压力，但她觉得可能是他每次执飞时要为超过两百条人命负责的结果。

「佛瑞迪，你在说什麽？」

「琳达，这样没有结果的，我看不出我们能怎麽继续下去。」

「你甚至经常不在家。」她对於他的爆发困惑不解。「我们有宝宝了，你怎麽能说那些话？」

佛瑞迪起身，灌下一杯酒。「忘了吧。」他说完话後，离开房间。

他们从未重新展开那段对话，几天後，就像什麽不寻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过日子。

六月，当时十八岁、刚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的唐纳，还有十六岁、仍就读於佛瑞迪母校圣保罗中学的罗伯特，一起开车到马布黑德探访哥哥。他们开着双亲送给唐纳当高中毕业礼物的新跑车，比佛瑞迪大学毕业所收到的皮箱要高上一个等级。

看到他们，让佛瑞迪感到焦虑。兄弟姐妹没有一人曾经跟他一起搭过飞机，或对他的新职涯表达任何兴趣。他希望，如果他能带着兄弟进入他的世界，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位盟友；甚至家里有一人相信他的话，或许能提高他已衰退的力量，以忍受父亲的不赞同。

来探亲的唐纳正处於人生的十字路口。佛瑞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宣布他要离开川普管理公司时，唐纳被搞得措手不及。哥哥的决定发生在他高中最後学年的上学期末，尽管他确实计画以某种身分进入川普管理公司工作，但既然他的名字不是佛瑞德，也就不知道他未来在公司可能扮演什麽角色。因为不确定，他没有为高中毕业後的未来做好充分准备。当他在那一年春季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时，还没有被大学录取。他回家後，就请玛丽安帮他在一间当地学校找个位置。

佛瑞迪与琳达用烤肉招待午餐时，唐纳告诉他们，他正要跟父亲去芝加哥，「帮忙」一个他正在考虑的开发案。佛瑞迪有着明显的解脱感，也许佛瑞德正开始接受新现实，已决定让唐纳当他的法定继承人。

下午过後，佛瑞迪带弟弟们出门，搭他的「游艇」去钓点鱼。

虽然佛瑞迪尽了最大努力，把钓鱼的基础传授给唐纳，但唐纳始终抓不到窍门。他们最後一次一起待在一艘小艇时，唐纳还是纽约军事学院的学生，同行者则有比利及佛瑞迪的几位兄弟会兄弟。当其中一人试图向唐纳示范，要如何恰当握住钓竿时，他却避开，同时说道：「我知道我在做什麽。」

「是啊，老弟，你现在做得真差。」其他男孩们大笑，唐纳则把钓竿扔到甲板上，怒气冲冲地走向船头。他太气愤了，没有注意到他正走在什麽地方，让佛瑞迪担心他可能直接走下船。从那之後到现在，唐纳的钓鱼技巧一直没有改善。

当三兄弟从港口回来时，琳达正在准备晚餐。他们一进到屋内，她就感觉到紧张的气氛，有什麽事情不太对劲，佛瑞迪的好情绪已被勉强控制住的怒气取代。佛瑞迪的脾气不会经常失控，但现下已是，她视之为坏兆头。他给自己灌下一杯酒。另一个坏兆头。

甚至在他们坐下来吃晚饭前，唐纳就批评起哥哥，就像突然记起自

己来此的目的般宣告：「你知道，爸真的受够你一直在浪费生命。」

佛瑞迪对自己父亲的意见早就再清楚不过。「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爸在想什麽。」

「他说你让他丢脸。」

「我不懂你为什麽关心。」佛瑞迪回敬：「你想跟爸工作就去啊，我没兴趣。」

「佛瑞迪，」他说：「爸对你的看法是正确的，你只不过是美化过的公车司机。」唐纳也许不知道父亲蔑视佛瑞迪，以及哥哥决定成为职业机师的开端，但他有着恃强凌弱、百发百中的本能，可以找到伤害对手最有效的方式。

佛瑞迪了解弟弟们被派来亲自传达父亲讯息的目的，或至少唐纳是如此。但听到弟弟口吐佛瑞德的轻视言论，仍让他的灵魂为之碎裂。

无意间听到争吵的琳达从厨房走进客厅，发现佛瑞迪面无血色。她把手上的盘子砸向桌子，朝着小叔尖叫：「唐纳，你应该把嘴闭上！你知道他必须多努力工作吗？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麽！」

在当晚剩下的时间里，佛瑞迪没有再跟任何一位弟弟说话。他们隔天早上返回纽约，比原定计画提早一天。

佛瑞迪喝酒喝得更凶了。

环球航空七月提供他一个升迁机会，公司要送他到堪萨斯城，训练他驾驶正引入机队中的波音七二七喷射机。尽管琳达提醒他，他绝不能无视他在国民兵部队其中一位上司的指示，佛瑞迪还是拒绝了这个机会。他告诉管理部门，他在两个月前才签下马布黑德一栋附家具的房屋租约，为期一年，他找不出正当理由再次迁移他的小家庭。

实际上，佛瑞迪开始怀疑他的梦想正走向尽头。他对父亲能否接纳他成为职业机师是越来越不抱希望，没有那份认可，他可能无法继续下去。

直到离开川普管理公司前，佛瑞迪用上全部的人生，竭尽所能变成父亲要他成为的人。当那些尝试一再以失败收场，他就希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父亲会逐渐接受真正的他。佛瑞迪已用童年通过「父亲有条件接纳」的地雷区，太清楚只有一种获得接纳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永远成为不了的人。父亲的认可仍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佛瑞德过去是、也永远都是孩子价值的终极裁决者（这就是为什麽，即使到七十好几了，我的玛丽安姑姑仍持续向往她那逝世已久的父亲区区一句的赞

扬）。

当环球航空之後提供佛瑞迪派驻爱德怀德机场的机会时，他欣然接受，认为这可能是个挽回情况的方式。这让他必须每三到四天往返马布黑德和纽约通勤，从现实状况来看没有道理可言。更糟的是，这让他更加接近佛瑞德。但对佛瑞迪来说，那或许才是重点。就算无法得到认可，但只要佛瑞德能就近观察，或许他就比较容易说服父亲，飞行才是他应该去做的事情。趁着执飞之间的空档，佛瑞迪带着机师同僚回到大宅，跟自己的家人见面，希望能打动佛瑞德。

这是绝望之举，但佛瑞迪确实是绝望了。

最後，与以前没有差别，佛瑞德绝不会饶恕背叛。

尽管佛瑞迪曾加入的预官训练团、兄弟会与飞行俱乐部，都是他父亲不了解也不屑一顾的团体组织，但从事这些活动并没有改变他为父亲工作的计画，确保父亲的事业帝国会永续长存。但从佛瑞德的观点来看，佛瑞迪离开川普管理公司就是一种大胆的不敬行为。讽刺的是，这正是佛瑞德想要逐步灌输给儿子的胆识，只是被儿子挥霍成错误的雄心。现在，佛瑞德只感觉到佛瑞迪的空前举动正在削弱他的权威，减少他对儿子人生的掌控权。

佛瑞迪的弟弟们来访的几个星期後，一场夏季风暴的雷声笼罩马布黑德港。电话响起时，琳达正站在客厅内，烫着佛瑞迪的白色制服衬衫。一听到丈夫的声音，她就知道事情出差错了。他告诉她，他已从环球航空离职，一家三口需要尽快搬回纽约。琳达震惊不已。只不过四个月的时间，佛瑞迪就要放弃他所做的一切，这完全不合常理。

实际上，是环球航空对他下达最後通牒：如果他辞职，还能保住执照；否则，就要以严重酗酒问题为由，将他开除。如果佛瑞迪被开除，可能永远无法再度飞行。他选择第一个选项，将他们在马布黑德的生活画下句点。劳动节刚过，一家三口就搬回牙买加地产社区海兰德广场公寓九楼的角落公寓。

但佛瑞迪没有彻底放弃飞行生涯，他觉得，如果他从较小的航空公司、较小的飞机、较短且压力较低的航程起步，也许就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在琳达与佛瑞兹安顿下来的同时，佛瑞迪前往纽约上州的小城市尤蒂卡（Utica），为飞行美国东北地区通勤航线的皮埃蒙特航空（Piedmont Airlines）工作。

这份工作持续不到一个月，他搬到奥克拉荷马州，为另一家当地航空公司飞行。佛瑞兹庆祝两岁生日时，他还在那里。十二月时，他回到皇后区。他喝酒喝到失控，知道自己不再能应付机师的工作了。身为家中唯一白手起家的人，佛瑞迪被慢慢地、冷酷地大卸八块。

佛瑞迪的飞行生涯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发现自己站在父亲的面前。佛瑞德坐在他图书室内的座位上，听着长子要求一份本人根本不想要、佛瑞德也不觉得他能做的差事。

佛瑞德勉强同意，表明他是帮儿子一把。

之後，又一线希望浮现。

一九六五年二月，佛瑞德购得越野障碍赛马乐园（Steeplechase Park）地皮。这是康尼岛三个代表性休闲乐园之一，约从二十世纪之交就开业至今。越野障碍赛马乐园比其他两个对手还要多存活数十年；梦土（Dreamland）於一九一一年毁於火灾，也遭遇祝融光顾的月神公园（Luna Park）则在一九四四年歇业。佛瑞德拥有一栋综合大楼，还有一个月神公园商圈，不远处就是同名乐园的原址。越野障碍赛马乐园持续营业至一九六四年。蒂尔尤家族（The Tilyou family）从最初就拥有乐园，但高犯罪率与娱乐事业越趋竞争等诸多因素，促使他们将资产变现。佛瑞德得知越野障碍赛马乐园可能适合用於开发，决心进行收购。他的计画是另一个川普度假村风格的住宅区开发案，但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修订当前的土地使用分区法，从公共使用转成私人建设。就在佛瑞德等候呈案的机会时，他开始游说老亲信支持，并开始起草方案。

他斟酌着让佛瑞迪参与此一雄心勃勃计画的可能性，疯狂地想改善自身立场和抛下环球航空过往的长子，欣然接受了机会。佛瑞迪心想，这可能是他向老人证明自己的最後机会。

那时，琳达已有六个月的身孕，怀的就是我。

第二部

云泥相望悬

第五章

受困

一九六四年九月之後，唐纳一直住在家里，通勤三十分钟到布朗克斯（Bronx）的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上课。他後来避而不谈这间学校。从纽约军事学院一板一眼的作息进入大学相对松散的生活，对唐纳来说难以驾驭，他常觉得闲闲没事，在家附近晃来晃去找女生搭讪。一天下午，他碰到比利．德雷克的女友安娜玛丽亚（Annamaria）站在自家车道，看她父亲洗车。唐纳认得她是谁，但两人没讲过话。安娜玛丽亚则从佛瑞迪那里得知唐纳的一切。两人闲聊起来，她提起自己曾上过纽约军事学院附近的一所住宿学校。

他问：「哪一所？」

她说了，唐纳看了她一会儿，然後开口：「你上那所学校令我非常失望。」

比唐纳年长三岁的安娜玛丽亚不屑：「你以为你是谁，竟对我失望？」这就聊不下去了。唐纳以为搭讪是要侮辱人，并装作不可一世。安娜玛丽亚却联想到没长大的小二生，抓女生辫子表达爱慕之意。

由於佛瑞迪失宠，唐纳看到取而代之、能在川普管理公司成为他父亲左右手的机会。唐纳学到教训，要成为最优秀的人——即使以非他父亲本意的方式进行——决意取得能与其新野心相称的学位，就算这只确保了他吹牛的权利。佛瑞德完全不晓得一所大学相对於另一所具有的优势——他和我祖母都没上过大学——所以川普家孩子申请学校全都要自己想办法。唐纳知道华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名气，他把目光放在宾州大学（Universiyt of Pennsylvania）。不幸的是，即使玛丽安一直帮他写作业，也不能到校帮他考试，唐纳担心他与第一名相差甚远的学业平均分数，会破坏入学的机会。为保万无一失，他找了很会考试的乔．夏皮罗（Joe Shapiro），代考申请大学必备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那时候没有附照片的身分证和电脑纪录，想混过去易如反掌。不缺钱的唐纳没亏待他的枪手。唐纳也要求佛瑞迪去跟来自圣保罗市、恰好在宾州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作的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打招呼，也许诺兰肯为佛瑞迪的弟弟说两句好话。

佛瑞迪乐於相助，但他有秘而不宣的动机：虽然他从不把唐纳视为

竞争对手，或觉得他能取代自己，但他不喜欢身边有这个越来越讨人厌的手足。唐纳不在会是一种解脱。

最终，唐纳的精心策画也许根本没必要。那个时代，宾州大学不像现在这麽挑学生，半数以上的申请者都能录取入学。无论如何，唐纳得偿所愿。一九六六年秋天，他大二那年，自福德汉姆转学至宾大。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出生後两个月，祖父以两百五十万美元买下越野障碍赛马乐园；一年後，川普管理公司仍在大费周章设法取得所需的许可，和都市更新区段划分。他们也还在与公开反对该案的人士角力。

佛瑞迪跟朋友说，情况与他先前在川普管理公司任职期间没两样。佛瑞德巨细靡遗什麽都要管，对儿子缺乏尊重，让原本可以是令人兴奋的挑战，变成无趣的工作。不用说也知道，功败垂成会是一场灾难。但佛瑞迪相信，如果他能参与成功地推动开发，在父亲面前的地位会比较稳固。

那年夏天，我父母在蒙托克（Montauk）租了栋小木屋，从五月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直至九月的劳动节，让父亲能稍微躲开布鲁克林的压力锅。妈妈计画全职陪伴我和佛瑞兹，父亲则在周末往返飞行。新近重新命名的甘乃迪国际机场距离川普管理公司办公室仅十五分钟车程，而蒙托克机场其实只是一大片空地开辟出来的一小块飞机跑道，就在小木屋对面，所以通勤很方便。佛瑞迪最喜欢的，仍然是带朋友飞到蒙托克，载他们一起去玩水。

夏天还没过完，祖父的越野障碍赛马乐园开发案就陷入危机，他心知肚明。佛瑞德长期仰赖他在布鲁克林民主党的人脉关系，过去有许多开发案因此步入坦途。然而，到一九六○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密友失势，他很快得知拿不到想要的都更区划。尽管如此，他还是交付了佛瑞迪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让赛马乐园一案起死回生。

时间所剩无几。我父亲才二十八岁，突然之间，就必须站出去面对大众，办记者会并安排合照。父亲有张穿着风衣的照片，他身形瘦削，站在一间又大又深的空荡仓库前，凝望一片空旷，显得渺小又失落。

为防当地居民推动越野障碍赛马乐园登录为地标建筑，此举会叫停开发案并破坏他的计画，佛瑞德决定进行最後一搏，在一九○七年落成的嬉游馆（Pavilion of Fun）办一场活动。活动目的是庆祝拆除游乐园——赶在地标地位确立之前，先下手毁了社区想挽救的建筑。他让我父亲开记者会，宣布这项计画，让他成为争议的代表人物。这场盛会以泳衣模特儿为号召。来宾受邀投掷砖块（现场买得到），砸向具代表意义的大窗，上面绘有游乐园吉祥物、露齿大笑的提利（Tilly）。有张照片

是我祖父手握大锤，对一名比基尼女郎咧嘴大笑的画面。

那场面就是一场灾难。多愁善感、怀旧情绪和社区意识，不是我祖父能理解的概念，但当那面大窗被砸破，连他也必须承认，自己做得太过火。由於在地人抗争，他无法取得都更许可，被迫退出开发案。

此事暴露出他已式微。佛瑞德的影响力大都来自他的人脉。一九六○年代早期到中期，纽约市的政治风貌有重大变化，佛瑞德的人脉和友人失势後，没人理睬他。他再也没能推动原始建案。一九六四年完成的川普度假村，是川普管理公司最後建成的大楼。

跟後来的唐纳一样，佛瑞德没肩膀承担责任，把赛马乐园一案的失败怪罪到佛瑞迪头上。最终，连佛瑞迪也自责不已。

唐纳几乎每周末都从费城开车回大宅。後来才知道，他在宾大混得没比在福德汉姆好。课业对他没吸引力，他也可能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大池塘里的小鱼。一九六○年代，纽约军事学院最盛时期，八年级到十二年级也才五百多名学生，但宾大在唐纳入学时已有数万人。唐纳用在大宅成长学得的技巧，熬过军事学院最初两年的低年级生岁月：假装不在意失望和痛苦，忍耐来自体型较魁梧、年纪较长的男孩欺负。他不是很厉害的学生，但有某种魅力能让别人顺他的意，而那时并非完全出自於残酷。高中时期，唐纳是相当不错的运动员，有人觉得他金发蓝眼、昂首阔步的模样挺吸睛。他有恶霸的自信，知道不必争就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等升上高年级，他在同学之间累积足够的威望，他们选他在纽约市哥伦布纪念日大游行（New York City Columbus Day Parade）中担任纽约军事学院代表团的领队。但在宾大，他预知不会有这种风光场面，觉得除非必要，没道理在那里多花时间，反正显赫的学位才是重点。

在赛马乐园一案最紧要关头、计画曝光和收拾残局之际，唐纳做了相当多纸上谈兵的事。由於佛瑞迪一直没找到能抵抗他父亲冷嘲热讽的甲胄，因此对於当着自家兄弟的面被责难感到特别敏感。他俩小的时候，唐纳旁观会遭到连累。现在他长大了，发觉佛瑞德慢慢不再看重佛瑞迪，有利於己，所以经常隔岸观火或趁火打劫。

祖父和父亲在早餐室对赛马乐园一案进行事後检讨，佛瑞德尖酸刻薄地指控，佛瑞迪则极力辩解又懊悔不已。唐纳装作没顾虑到後果、漫不经心地对哥哥说：「如果你没有每周都往蒙托克跑，也许可以更专注於这件事。」

佛瑞迪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认同佛瑞迪的嗜好。大家很有默契地不在老人面前提起那些飞机或游艇。唐纳这句话引发的反应，证明他们是对的，佛瑞德厉声对长子说：「处理掉。」隔周，飞机就不见了。

佛瑞德让佛瑞迪的日子很难过，但在马布黑德之後，佛瑞迪似乎益

加渴求父亲的认可，赛马乐园一案一败涂地，情况更严重。不管他父亲交代什麽，他都照做。但不论他能否意识得到，他将永远无法如愿。

佛瑞迪和琳达刚搬进海兰德时，担心其他租客会找房东的儿子抱怨。他们如今发现，叫修时，自己老是排在等候名单的最尾巴。

我父母住的主卧室在九楼角间，那里的窗户能看到东边和南边的无敌美景，但风很大。此外，海兰德的每个房间都内建空调，安装却欠佳，所以只要一开空调，水珠就会凝结在石膏板墙和外面的砖墙之间。时日一久，渗入的湿气会软化石膏板墙。不到十二月，主卧室的墙面已经腐朽到让冷风不断吹进来。母亲试着拿塑胶板盖住空调附近的墙面，但北地的寒气持续灌入。即使开足暖气，他们的房间也冷到不行。海兰德的管理员不回覆叫修的要求，那堵墙自始至终都没修过。

纽约在一九六七年的除夕尤其严寒，但即使刮风下雨，我父母亲仍然开车出门，往东到蒙托克的葛尼客栈（Gurney's Inn）与朋友相聚迎新。元旦凌晨，等他们准备开车回牙买加社区，天气更冷，连绵细雨也变成滂沱大雨。佛瑞迪出去热车时，电瓶坏了。他只穿衬衫，全身湿透，仍试图发动车子。等他和琳达回到公寓和冷风飕飕的主卧室时，他已病倒。

前两年的压力，加上菸抽得多（每天平均两包）、酒喝得凶，让佛瑞迪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他的感冒快速恶化，几天後，躲不过寒风的他裹着毛毯簌簌发抖，病情丝毫未见好转。琳达不断打电话给管理员，都没人接。她最後只能打给她的公公，恳求说：「爸，拜托，一定有人修得好这个。也许牙买加或布鲁克林的另一栋楼有其他人会修？佛瑞迪病得很重。」祖父建议她再次联络海兰德的管理员；他无能为力。

因为在佛瑞德的箝制下生活得太久，他们两人竟然都没想到，另外雇一名不领佛瑞德薪水的工人。但那不是川普家族处事的方法；不管需要与否，均须经过佛瑞德应允。墙一直没修。

元旦过後一周，琳达的爸爸打电话来说她妈妈中风。她并不想离开丈夫，无奈她妈妈病情严重，她一安排好托儿，就南下劳德岱堡。

没几天，玛丽打电话来说，佛瑞迪因大叶性肺炎住进牙买加医院。琳达立刻上了飞机，一落地就搭计程车直奔医院。

我父亲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都没能出院。尽管他健康不佳，酗酒日益严重，我母亲还是偷偷带了瓶香槟和两只酒杯溜进病房。不管周遭的烦心事，他们要好好庆祝。

父亲出院回家几周，琳达接到她爸爸的电话。他说，琳达的妈妈现在情况好多了，但他很不愿意在采石场上全天班时，将她留给护士摆布。工作压力、照护费用，以及放心不下老婆，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说：「我精疲力竭，不晓得该如何撑下去。」

虽然琳达不懂她爸爸在暗示什麼，但他听起来心烦意乱，她害怕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夫妻不如死了算了，而且可能因为绝望而做出傻事。当她跟佛瑞迪说她爸妈情况不稳，佛瑞迪叫她不要担心，还打电话跟岳父说，他愿意伸出援手：「辞掉你的工作，麦克。照顾好妈妈。」钱不是问题，至少那时候不是，但佛瑞迪不确定他父亲对这件事有何反应。

佛瑞德说：「当然。那是你该为家人做的事。」

这件事与他相信应该送小孩上大学或参加乡村俱乐部乃异曲同工，我祖父认为：即使无利可图，或者不特别具有重要性，但那是「职责所在」。

赛马乐园开发案告吹之後，佛瑞迪在川普管理公司的工作量减少。打从我哥出生，他和琳达已准备买房，如今得空，便开始看房。他们没多久就在长岛的富裕区布鲁克维尔（Brookville）找到一栋理想的房屋，有四间卧室，半英亩大的地。搬家会让父亲的通勤时间增加至少半小时，但换个地方，离开他父亲的大楼所带来的自由，对他有好处。他向地产经纪人保证，他能出到卖方开价，申请房贷也不是问题。

几天後银行致电告知佛瑞迪，申贷遭拒，他目瞪口呆。除了在环球航空待过一年，他已经为他父亲工作将近六年。他当时仍挂名川普管理公司高阶主管，这家公司一年净赚数千万美元，一九六七年时约值一亿美元。佛瑞迪生活优渥，没有太多支出，另有一笔信托基金和股票投资组合（但规模快速缩减）。最合理的解释是，佛瑞德仍因认定儿子背叛和赛马乐园一案失利而耿耿於怀，插手让他的房贷过不了关。我祖父在大通银行（Chase）、汉华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和纽约市其他大银行，都有认识的人和大额存款，不仅能保证佛瑞迪拿到贷款，也能轻而易举地让他拿不到。我们全家就这样被困在牙买加的破败公寓里。

六月来临，父亲准备好要再到蒙托克避暑。他和母亲租下同一栋小木屋，还卖掉他的部分蓝筹股，筹钱买下一艘克里梭维奇型（Chrisovich 33）游艇，上面有十六英尺的观测舱，更适合他所爱的海钓。他也买了另一架飞机，这次是赛斯纳飞机（Cessna 206 Stationair），引擎比派珀卡曼契有力，可搭载人数也较多。

新玩具不是只有休闲用途，父亲还另有盘算。在赛马乐园开发案後，他渐渐被川普管理公司晾着，他想做包租游艇和飞机的生意，另创收入来源。如果一切顺利，他也许能完全退出川普管理公司。他雇了一名全职船长负责游艇出租业务，但到了周末，生意最赚钱的时候，他却让船长载着他和朋友到处玩。

琳达也在船上的时候，她注意到佛瑞迪喝的酒比别人都多，如同在马布黑德，两人因此越吵越凶。佛瑞迪酒後驾机的频率升高到令人忧心

的地步，那个夏天後，琳达开始不太愿意搭他的飞机。情况越发明朗。九月不到，父亲理解他的计画行不通。他先卖了船，等佛瑞德发现飞机，他也一并卖了。

父亲才二十九岁，已经快要没什麼可以失去了。

第六章

零和游戏

父亲的笑声惊醒了我。我并不知道到底多晚了，房里很黑，但从门缝下能看见透进来的走道灯大亮。我溜下床。那时我两岁半，五岁的哥哥睡在公寓遥远的另一头，所以我只能自己去看出了什麽事。

父母的主卧室就在隔壁，房门大敞，所有的灯都开着。我在门槛止步。父亲背靠斗柜，母亲坐在他对面的床上，一手高举，另一只手把她自己从床垫上撑起来，身体後倾想躲。我没马上明白眼前的景象。父亲正拿着手枪瞄准她，是那把放在船上用来射鲨鱼、点二二口径的手枪——而他笑个不停。

母亲央求他住手。他抬起枪直至对准她的脸。她把左手臂举得更高，并再次更大声地尖叫起来。父亲似乎觉得这样很好玩。我转身跑回床上。

母亲将我和哥哥赶上车，带我们到朋友家过夜。最终，父亲循迹找到我们。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麽，但他承诺母亲，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隔天，我们回公寓时，他在等我们，同意与母亲设法解决问题。

但他们照常过日子，不承认婚姻出了问题。事情非但未好转，甚至无法维持原状。

不到两英里外，在祖父的另一栋大楼里，玛丽安也遇上麻烦。她的先生大卫，两年前丢了捷豹（Jaguar）汽车经销商资格，至今没找到工作。稍稍注意都会明白事情不对劲，但玛丽安的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把大卫．戴斯蒙当作笑话——肥滋滋但无害。佛瑞迪从来不了解婚姻，也没把他姐夫当一回事。

玛丽安二十二岁时遇见大卫。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学生，本来计画再念博士，但不想被家里人（包括佛瑞迪在内）嘲笑是老处女，因此接受大卫求婚，并在拿到硕士後休学。

一开始的问题在於，信天主教的大卫坚持玛丽安改变信仰。她怕惹

父亲不高兴，或伤母亲的心，不敢要求他们给予祝福。

当她终於开口，佛瑞德说：「做你想做的事。」

她解释，她有多麽难过令他们失望。

「玛丽安，我压根儿不在乎。嫁给他的人是你。」

我奶奶什麽也没说，事情就那样定了。

大卫喜欢跟玛丽安吹嘘说，他会声名大噪，到川普家难以企及的程度。虽然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没有任何实务技能能支撑他的雄心抱负。即便如此，大卫始终坚信会找到超越梦想的成功之道，「给他们瞧」。如同肥滋滋的喜剧主角雷夫．克拉姆登（Ralph Kramden），但少了人家的魅力、体贴或带有福利的稳定工作，他的「下次大出击」就像以前的汽车经销业务，屡屡失败，从未实现。婚後没多久，大卫开始酗酒。

戴斯蒙夫妻住在川普家的一栋公寓，免付租，也透过川普管理公司享有与家里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医疗保险，但没有收入，房租和医保全免也不能让餐桌生出食物来。

最教人想不透的是，玛丽安为何在财务上这麽仰赖她无能的丈夫，其难解程度一如伊莉莎白住在紧临五十九街大桥、只有一间卧房的阴暗公寓里，以及佛瑞迪没法买房，而他的飞机、游艇、汽车一一消失。我的祖父母在一九四○年代就为四名子女设置了信托基金。不论玛丽安能否领出本金，信托基金铁定有孳息。但三名较年长的子女都被训练到不开口求救，如果我的祖父母是这些信托基金的受托管理人，他们三个人永远也走不出财务困境。求援意味着你软弱或贪心，或想占人便宜，唐纳例外。求援如此教人看不起，以至於玛丽安、佛瑞迪和伊莉莎白全都以不同的方式，忍受着完全可以避免的贫穷匮乏。

玛丽安在夫婿持续失业几年後，已无计可施。她用一种不致引发怀疑的方法接近她的母亲。每次回大宅，她会若无其事地说：「妈，我自助洗衣需要铜板。」她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境况有多惨。对佛瑞德来说，女儿一旦结婚，就不该由他操心。但奶奶火眼金睛，没开口问，是不想打探隐私，或想为玛丽安保留「自尊心」，她会递给女儿一个装满零钱的饼乾罐，那是她从我祖父大楼的自助洗衣机和烘乾机收回来的铜板。每隔几天，奶奶就披着狐狸毛披肩、开着粉红色敞篷凯迪拉克（Cadillac），到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绕一圈收铜板。我姑姑後来承认，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里，那些饼乾罐救了她一命；没有那些饼乾罐，她和她儿子连饭都吃不上。

玛丽安至少要能买得起食品杂货，不必拐弯抹角地去跟我祖母讨钱。但不论多惨，川普家的这三名子女都没法得到家里人的实质帮忙。过了一阵子，也就没有尝试的必要。伊莉莎白接受了她的命运。我父亲

最终相信自己活该。玛丽安说服自己，不求援或接受帮助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我祖父的畏惧深入骨髓，到了自己都认识不清的地步。

大卫．戴斯蒙後来无以为继。他找不到工作，酗酒的毛病恶化。玛丽安绝望无助，但谨慎小心地不表现出她像是在要求任何事，她向佛瑞德暗示，大卫会很开心能在川普管理公司任职。我祖父没多问出了什麽问题，他给女婿一份停车场管理员的工作，在牙买加社区他的一栋楼里。

一九六八年春天，唐纳自宾州大学毕业，直接进了川普管理公司工作。打从第一天上任起，我这位时年二十二岁的叔叔获得的尊重和津贴，以及他领的钱，都比我父亲多得多。

祖父几乎立刻指定唐纳成为川普管理公司旗下数家公司的副总裁，任命他担任不须真的去管理的一栋大楼的「管理人」，付他「谘询」费，并「聘」他处理银行业务。

这有两层意义：首先，这是个简单的方法，能让佛瑞迪留在位子上，同时示意其他员工有问题时去请示唐纳。其次，这有助於巩固唐纳实质接班人的地位。

唐纳获得他父亲的关注，别人都做不到这件事。佛瑞迪的朋友无法理解，为什麽唐纳在佛瑞德眼里是个「宝」。但在唐纳为他父亲工作，并视察建筑工地的许多个夏天和周末过後，佛瑞德将房地产业务的眉眉角角全都教给了唐纳。唐纳发现，他喜欢与包商打交道，周旋於支撑纽约地产世界的政治和金融圈游刃有余。父子俩可以没完没了地聊商业、地方政治和八卦，把其余的人都当门外汉。佛瑞德和唐纳的好恶很像，他们能平起平坐，佛瑞迪则不行。比起父亲和弟弟，佛瑞迪拥有较宽广的世界观。他与唐纳不同，在大学时期参与多个组织和团体，得知其他人的观点。在国民兵以及在环球航空担任机师时，他看到最聪明优秀的专业人士，这些人相信该为多数人谋福利，有些事重於金钱，例如专业、奉献和忠诚，他们理解人生并非零和游戏，但那反而成为我父亲的问题。唐纳与佛瑞德一样狭隘、粗野、自负，然而他有佛瑞德艳羡以及佛瑞迪欠缺的自信大胆，佛瑞德打算将唐纳的特质转变为他的优势。

唐纳企图在川普管理公司取代我父亲，有了好的开始，但家里关系仍旧一团糟。罗伯特在波士顿大学，因此逃过赴越南服役，唐纳和伊莉莎白彼此不往来。佛瑞迪尽最大的努力让弟弟加入他的朋友圈，但不太顺利。他的朋友是一群悠哉随和的人，喜欢和佛瑞迪飞到东边钓鱼、滑水。他们发现唐纳欠缺幽默感，且自以为是，很惹人厌。虽然他们看在佛瑞迪的面子上，欢迎他弟弟，但并不喜欢他。

唐纳进川普管理公司快一年时，他和佛瑞迪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可见。虽然佛瑞迪尝试把歧见留在办公室，唐纳却紧咬不放。即使如此，当比利．德雷克的女友安娜玛丽亚邀大家过去共进晚餐，佛瑞迪仍询问能否带他弟弟来。

那天晚上没比唐纳几年前试图搭讪安娜玛丽亚好多少。他们兄弟俩才到没多久，就开始大小声，把在厨房备餐的安娜玛丽亚都引了出来。她看到唐纳距离佛瑞迪不过几英寸，脸胀得通红、手指着他哥哥的鼻子，看起来像是要出拳揍他，安娜玛丽亚挤到两个长人中间。

佛瑞迪往後退一步，咬着牙说：「唐纳，滚出去。」

唐纳不敢置信，在愤怒转身、甩门离去时说：「好得很！你去给她舔阴！」

「白痴！」安娜玛丽亚在他後面吼。她转身看佛瑞迪问：「怎麽回事？」

气到发抖的佛瑞迪只说：「工作上的事。」他们不再提这事。

在海兰德，情况不见好转。虽然我母亲怕蛇，但父亲有天带了一条球蟒回家，并把牠的饲养箱放在小书斋，母亲每次去洗衣、到我哥房间或离开公寓，都必须经过那条蛇。这种无端的折磨让两人吵得更凶，不到一九七○年，母亲就受够了，她要求父亲搬出去。两个礼拜後，他没打招呼就自己开门进来，母亲打电话给祖父，坚持要换门锁。这次，佛瑞德没反对；他什麽也没问，没责备她。他只说会处理，他也做到了。

父亲再也没和我们住在一起。

母亲致电祖父的一名律师麦修．托斯堤（Matthew Tosti），说她想离婚。托斯堤和他的合夥人尔文．德班（Irwin Durben），自一九五○年代开始为我祖父效力。我父母分居之前，凡涉及到我和我哥，或者钱的事，托斯堤先生一直是主要联络人。他变成她的知己；在川普家族的一片冷漠当中，他如同给予温暖和支持的盟军，她把他当朋友。

托斯堤先生也许天性纯良，但他分得清谁能给他好处。虽然母亲有自己的代表律师，但离婚协议可能得按祖父的意思来。佛瑞德知道他的儿媳对我父亲的家族财富，或对佛瑞迪身为巨富之子的身价一无所知。

母亲後来拿到每周一百美元的赡养费，加上每周五十美元的子女抚养费。在那个时代，这笔钱并非微不足道，尤其是大笔支出，像是学费、夏令营报名费、医疗保险等等，都会另外打点好。我父亲也负担公

寓租金。因为祖父拥有我们居住那栋楼的所有权，所以月租金仅九十美元（多年後我才知道，我哥和我各拥有海兰德百分之十的股权，所以回顾往事，向我们收租根本是画蛇添足）。父亲的付租义务有两百五十美元上限，这限制了我们搬家的选择，很难搬去比较好的公寓或社区。佛瑞迪背後有那时价值逾一亿美元的家族，同意支付私立学校和大学学费。但我们出去度假必须经过托斯堤先生首肯。他们没有婚姻共同财产可供分割，所以我母亲的净值是她每月拿到的六百美元，这个金额在接下来的十年从没变过。扣掉开销，母亲几乎没有多余的钱留给一年一度的耶诞基金，更别提存钱买房。

母亲获得我和哥哥的完整监护权，那时都是这样，但访视权未明确规定：「有合理通知、在合理时段，川普先生应能自由探视（儿女）。」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探视意味着每隔两周可以接小孩过去，每周有一个晚上一起进餐。我父母的协议最终也变成那样的安排，但一开始并没有正式规定。

赛马乐园开发案在一九六九年正式被挡下，市府後来从我祖父手中买回那块地。他什麼也没盖，揣着一百三十万美元获利走人，却毁了大家锺爱的地标。我父亲一无所获，只背了黑锅。

第七章

平行线

当佛瑞迪（在一九六○年）以及唐纳（在一九六八年）加入川普管理公司，两人对未来有相近的期待：成为父亲佛瑞德的得力助手，然後继承他的位子。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被培养做接班人，买华服名车都不缺钱。但他们的相近处止步於此。

佛瑞迪很快发现，他父亲不愿意给他空间，除了最乏味的工作，不肯交付其他任务，这个问题在川普度假村的兴建进入紧张期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他觉得被困住、没人欣赏、处境艰难，因此到别处找出路。二十五岁时，他成为职业机师，在环球航空开波音七○七飞机，养活他的小家庭。那是佛瑞迪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巅峰。二十六岁回到川普管理公司，他重振名声的机会因赛马乐园开发案消失殆尽，前景就此告终。

一九七一年之前，除了当机师的十个月，父亲一直为祖父工作，长达十一年。然而，佛瑞德却拔擢了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唐纳，出任川普管理公司总裁一职。唐纳到职三年，经验乏善可陈，压根儿不够格，但佛瑞德似乎不以为意。

实情是，佛瑞德的川普管理公司并不需要两个儿子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把自己擢升为执行长，但工作内容丝毫没变：他就是个房东。佛瑞德自六年前赛马乐园一案後，没再做过开发案，所以唐纳的总裁一职很空泛。一九七○年代初期，纽约市的经济濒临崩溃，联邦政府删减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经费（主要是越战支出太高），所以佛瑞德拿不到那边的补助了。纽约州提供平价屋或廉租房的补助方案——米契尔—拉玛住房计画（Mitchell-Lama）——也戛然而止。

就商业运作而言，给唐纳升职毫无意义。他升职能做什麼？我祖父没有任何开发案，他仰赖数十年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分崩离析，而纽约市的财务也陷入困境。升职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惩罚和羞辱佛瑞迪。这是一长串惩戒的最新招数，几乎是最狠的作法，尤其是在那个时机点。

佛瑞德铁了心要给唐纳安排一个位子。他开始理解，虽然他的次子无法每日专注於细节、操持他的事业，但他的个性有更具价值之处：敢想、敢做。佛瑞德一直想拓展他的事业帝国，跨河到曼哈顿去，那是纽约市地产开发商梦寐以求的圣杯（Holy Grail）。他的早期职涯表现出他有推销自己、虚情假意和大言不惭的天分。但佛瑞德是德国移民的第

一代子嗣，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必须强化沟通技巧——他上戴尔．卡内基的课有他的用意，不是为了加强自信。但卡内基课程对他没用。另一个障碍或许更难克服：佛瑞德的母亲虽然有些具前瞻性的想法，总体而言却保守朴实。她的儿子可以成功致富，但不能显摆。

唐纳没有这样的掣肘。他跟佛瑞迪一样讨厌布鲁克林，只不过理由大不相同——他讨厌这里代表劳工阶级的无足轻重，欠缺「潜力」，迫不及待想离开。川普管理公司坐落在Z大道，就在南布鲁克林、我祖父众多大型公寓当中一栋叫作海滩港的建筑里。佛瑞德没怎麽翻新这里。狭窄办公室的外间塞进太多办公桌，小小的窗户采光不佳。如果唐纳以附近公寓大楼的单位数、地租的价值，以及每月注入川普管理公司的金额来考量，会认知其中的巨大机会。但他每次站在办公室外面，端详海滩港平淡无奇的外表，必然为这里配不上他的想法感到窒息。留在布鲁克林发展不是他的梦想，他打定主意尽快脱身。

除了由他父亲公司付钱请的司机、开着他父亲公司租赁而来的凯迪拉克，载着他在曼哈顿到处绕，以便「视察产业」外，唐纳的工作内容似乎包括谎称自己的「成就」，据称他还拒绝出租公寓给黑人（後来成为司法部提告的原因，指控我的祖父和唐纳有种族歧视）。

在他急欲加入的曼哈顿圈子，唐纳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打造形象。他是看电视长大的第一代，一次看好几个小时，很喜欢影集。那对於塑造他所代表和体现出来的华而不实形象，有一部分的影响。他能很自在地演绎那种形象，加上有他父亲的偏宠，出钱供应他的物质需求，给了唐纳莫名的自信，能成功扮演一开始纯属伪装的角色：他不仅把自己塑造成有钱的花花公子，而且还是绝顶聪明、白手起家的生意人。

早期，那些昂贵的表象由祖父私下热情赞助。佛瑞德没有立即了解唐纳的能耐有限，不知道他空口白话，而唐纳反正很开心能花他老爸的钱。对佛瑞德来说，他已决心投资儿子。一九六○年代晚期，佛瑞德在纽泽西州开发一栋高楼作为老人住宅，这个案子有一部分在於练习如何取得政府补助（佛瑞德收到七百八十万美元，实际上是无息贷款，用以支付该案百分之九十的营建费用），有一部分则凸显出他为了成就次子，愿意做到什麽程度。这栋楼盖起来，唐纳没出一毛钱，但他收到谘询费，还收钱管理这项产业，明明现场由全职员工负责。光是这个案子，就为唐纳带来一年数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事实上他一无贡献，不管开发、垫款或管理，都没冒半分风险。

佛瑞德用差不多的戏法，在拍卖时以五百六十万美元买下史威夫顿花园（Swifton Gardens），这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一项计画，原始造价高达一千万美元。此外，佛瑞德取得五百七十万美元贷款，用在整理修缮，基本上没为这栋楼出半毛钱。他稍後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出售这栋楼，唐纳揽下所有功劳，拿走大部分利润。

我父亲的飞行梦被夺，现在连与生俱来的权利都丧失了。他不再是丈夫；很少看到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麼，或接下来要做什麼。但他知道唯一能保留自尊的方法是离开川普管理公司，这次绝不回头。

父亲搬出海兰德後的第一间公寓，是在皇后区桑尼赛德（Sunnyside）一条安静的林荫路上、砖造排屋的地下室套房。他当时三十二岁，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

我们走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养了两只束带蛇的玻璃缸，以及有一条球蟒的观赏箱。

在那几条蛇左边的架子上，有个玻璃缸养了金鱼，另一个垫了稻草梗，几只小老鼠在里面乱爬。我知道那些老鼠是做什麼用的。

除了拉合式沙发、一张小餐桌、两把廉价椅，还有一台电视，再加两个观赏箱，装了鬣蜥蜴和陆龟。我们给牠们取名为番茄（Tomato）和伊兹（Izzy）。

父亲似乎很以他的新居为傲，不断添加更多动物进来。有次去探望他，他带我们到楼下的锅炉室看一只纸箱，里面有六只雏鸭。房东让他装了些保温灯，整理成临时养殖所。牠们好小，我们只能用点眼药的滴管喂食。

祖父对我父亲说，「好好想想吧」，似乎那样能够让他儿子停止酗酒，好像这是意志力的问题。他们俩在书房，破天荒面对面而坐——并非对等，他俩从来不平等，而是两个有问题待解决的人，即使可能永远无法商量出解决方案。虽然医学在过去数十年对酗酒和上瘾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但大众的认知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尽管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之类的治疗方案自一九三五年即已存在，但有酒瘾的人仍旧摆脱不了污名。

祖父会说：「痛下决心，佛瑞迪。」他讲的都是皮尔牧师会赞同却毫无作用的陈腔滥调。佛瑞德所拥有离哲学最近的东西便是丰盛福音（prosperity gospel），用来当作钝器以及逃生口，但从来没像这次深深刺伤他的孩子。

我父亲说：「他就像在告诉我，痛下决心摆脱癌症。」佛瑞迪说的没错，但我祖父全心全意相信当时盛行的「责备受害者」的观点，没法超越那种心态。

「爸，我必须战胜它，我不认为我能独力而为，我知道我不行。」

佛瑞德说的不是「我能为你做什麼」，而是问：「你想向我讨什麼？」

佛瑞迪不知道从何说起。

祖父这辈子都没生过病；从没错过一天的工作；从未因为沮丧、焦虑或心痛暂停脚步，连他的妻子快过世了都不曾。他像是完全没有弱点，因此无法理解或认同别人有弱点。

他对奶奶受伤或生病也都处理得不好。每次奶奶难受，祖父会说些「一切都很好，是吧，亲爱的？你只须正面思考」的话，然後快步离开房间，留她独自面对痛楚。

有时候，奶奶会强迫自己回答：「是的，佛瑞德。」但她通常一声不吭，咬紧牙关，努力不哭出声来。我祖父永无止境地坚持，每件事都「棒透了」，不留空间给其他感受。

我们被告知父亲生病了，会住院几周。我们也被告知，他必须放弃他的公寓——显然房东想租给别人。佛瑞兹和我去收拾我们留下的衣服、玩具和其他杂物，等到我们抵达，那地方几乎完全清空。玻璃缸没了，蛇不见了。我一直不晓得牠们的下落。

当父亲不知是从医院还是疗养院回来後，他搬进我祖父母家的阁楼。那是个暂时性的安排，没想费任何力气把它改造成一个合适的生活空间。所有的储物箱和旧玩具——包括我祖母这些年藏起来的旧玩具消防车、吊车和垃圾车——都给简单地堆放到阁楼的一头，另一头则架起一张帆布床。父亲把他的可提式六寸黑白电视机放在窗下一只老旧的国民军军用行李箱上。

佛瑞兹和我去探望他时，我们在他的帆布床旁边打地铺，三个人没完没了地看老电影，像是《偷袭珍珠港》（Tora! Tora! Tora!），还有《疯狂世界》（It's a Mad, Mad, Mad, Mad World）。如果身体状况好到可以下楼，父亲会在周日加入我们，观看在WPIX频道每周播出一次的喜剧电影《艾伯特和科斯特洛》（Abbott and Costello）。

一、两个月过後，祖父告诉父亲，他在一九六八年买下的桑尼赛德大楼（Sunnyside Towers）有间空房——顶楼的一房公寓。

父亲准备要搬到桑尼赛德时，玛丽安拿到六百美元贷款，正要开始就读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Hofstra Law School）。虽然那不是她的第一选择，但霍夫斯特拉离牙买加社区仅十分钟车程——近到她早上仍旧可以送我表哥上学，下午接他回家。重回学校是推迟许久的梦想。她也希望，成为律师能让自己有一天有本事离开她的丈夫，他们这些年来每下愈况。大卫的岳丈给他的停车场管理员工作，是他一直无法释怀的羞辱。这些年，大卫不时把气发泄在妻子身上，尤其是醉酒之後。他儿

子就睡在隔壁房间，他却不只一次拿枪指着她，拿刀威胁她。

玛丽安力求独立，让她的丈夫更加疯狂，她第一天上法学院下课回家，她丈夫一怒之下把十三岁的儿子赶出公寓。玛丽安带儿子到大宅过夜。大卫．戴斯蒙清空夫妻俩联名储蓄帐户里的一点点钱，离开了纽约。

当整个家族聚在一起，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书房，这是一间没有书的房间，直到唐纳雇写手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後才改观。书架改而展示婚纱照和艺术照。观景凸窗可以俯视後院，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五个兄弟姐妹长大後的照片，取代他们小时候的合照，照片中的佛瑞迪十四岁。在这里，非摄影工作室拍的照片仅有两张，一张是我祖母的黑白照，她看起尊贵不可一世，头戴帽子、身穿披肩，与那时还是小女孩的姑姑们走下飞机舷梯，那里是在她的出生地——苏格兰路易斯岛的史托诺韦；另一张是唐纳穿着他在纽约军事学院的正式制服，带领学校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纪念日大游行的照片。靠墙有两张两人座的深蓝和绿色人造皮沙发，电视前面还有一张大椅子，小孩都抢着坐在那里。祖父穿三件式西装、打领带，坐在最靠近门边电话桌的两人座沙发上，双脚平稳着地。

每周六，如果我们不在桑尼赛德陪父亲，佛瑞兹和我会骑脚踏车，沿海兰德大道往下，走牙买加社区後巷到大宅去，与表哥大卫——或者说，是佛瑞兹和大卫一起消磨时间，我在旁边当跟屁虫。

只要玛丽安和伊莉莎白过来，奶奶就会和她们围坐在一张天蓝色美耐板台面的小桌子，桌沿有不锈钢包边饰条，看起来就像出自一九五○年代的小酒馆。再过去，有个衣帽间大小、光线暗淡的食品储藏室，里面摆了张小桌，奶奶用来整理她的采购单、收据和帐单。可怜的女管家玛莉经常躲在里面听她的手提收音机，碰上下雨天或天气太冷，大卫、佛瑞兹和我只能待在大宅里时，她会被我们烦到抓狂。食品储藏室的另一边，有个推门通到餐厅。我们会从後门玄关跑到厨房，经过前厅，绕到餐厅，通过食品储藏室，再回到厨房，把这条路线当成我们的竞速跑道，互相追逐、推挤、尖叫、加速，其中一定会有人撞上家具。在冰箱和食品储藏室入口之间，奶奶通常随我们胡闹，但如果她在厨房，就会不耐烦地吼我们停下来。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她会拿出木头勺子威胁我们——拉开抽屉的声音已足以叫我们听话。但若有人犯蠢，继续绕着她跑、大声吵闹，离她最近的那个人会挨揍。伊莉莎白尽她的本分，在我们通过时扯住我们的头发，叫我们慢下来。

在那之後，佛瑞兹、大卫和我通常跑进地下室——大人只在去洗衣间或停车间时才会经过，所以我们可以放肆大声喧哗、踢足球、轮流（或抢着）坐奶奶的电动楼梯升降椅上上下下。我们大都在最深处的那一头玩，会打开所有的灯。除了祖父那些真人尺寸的印地安酋长木雕

像，像石棺一样排队靠墙摆放之外，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地下室：挂有日光灯的平钉天花板、黑与白间隔的油毡地板，以及一架严重走调到不值得一弹、乃至於没人理睬的老式直立钢琴。上面有唐纳参加纽约军事学院乐旗队时戴的大羽毛帽。虽然戴起来会滑到我的鼻梁，但我偶而会戴上，并把系带系好在下巴下面。

当我一个人待在下面，那个地下室成为一个奇特的异域空间——灯光半亮、木制印地安人在阴影里站岗。楼梯对面的角落建有一个深红色的大吧台，附设齐整的高脚椅、布满灰尘的玻璃杯，和一个工作水槽，但没有酒——在一个不饮酒的人盖的房子里有些反常。酒吧後面的墙挂了一幅大型油画，上面是一名有着美丽丰盈双唇和浑圆滚翘双臀的黑人歌手。她穿着曲线毕露、荷叶饰边的金黄色洋装，站在麦克风前，嘴微张，手向前伸。身後有个全是黑人男性组成的爵士乐团在演奏，他们穿白色的晚宴外套、系黑领结。喇叭闪闪发光，木管熠熠生辉。吹单簧管的乐师眼底星光灿烂，直视着我。我会站在吧台後面，肩上披条餐巾，为假想虚构的顾客调酒。或者，我会是唯一的顾客，坐在高脚椅上想像自己进入画中世界。

罗伯特叔叔没比我们大多少，更像手足而非长辈，他只要从市区回来，都会陪我们在後院踢足球。我们玩得很疯，天气热的时候，会一直跑进厨房拿可乐或葡萄汁。罗伯特经常抓一条费城牌奶油乳酪，靠着冰箱，撕开锡箔纸，把奶油乳酪当糖果棒吃，再把可乐灌下去。

罗伯特是非常厉害的足球员，我努力不要落後男孩，但有时候会觉得他拿我当踢球的靶子。

唐纳在大宅的时候，我们多半打篮球或传美式足球。他在纽约军事学院打过篮球，比罗伯特更不可能宽大为怀；完全不觉得只因为他的侄子侄女仅六岁、九岁或十一岁，就该手下留情。当我真的接到他丢给我的球，球碰到我皮手套的声音就像子弹击中砖砌挡土墙。就算和小孩在一起，唐纳说什麼也要赢。

仅有最努力的乐观派才能住在桑尼赛德大楼而不放弃希望。那里没有门房，压克力前门的两侧花坛里，塑胶花和植物永远裹了一层薄灰。我们的六楼走道散发出陈年菸味，潮掉的地毯是无精打采的灰色，头顶不够亮的灯却什麼也藏不住。

父亲过得最辉煌的日子是他和我母亲刚结婚时，住在靠近萨顿广场的一房公寓。那一年，他们晚上会和朋友上科巴卡巴那夜总会（Copacabana）玩，并飞到比米尼（Bimini）度周末。此後一路走下坡，反之，唐纳的生活型态随岁月流逝变得越发奢侈。唐纳娶伊凡娜（Ivana）时已经住在曼哈顿。婚礼之後，他们先住在第五大道上的两房公寓，然後搬到也在第五大道上的八房公寓。五年内，他们住进川普大

楼价值千万美元的顶楼挑高公寓，这些都是唐纳还是我祖父的支薪员工时的事。

祖父在一九六○年代成立米德兰公司（Midland Associates）以嘉惠子女，每个人都能拿到八栋建筑百分之十五的股权，其中之一是桑尼赛德大楼。这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财富移转——如果不算公然欺骗——明摆着是为了避免明面上转让须缴交的大笔赠与税。我不晓得父亲是否知道，他拥有他住的地方的部分股权，在一九七三年，他的持股约值三十八万美元，或依现在物价的计算，大约是两百二十万美元。他似乎无法取用这笔钱——他的船和飞机不见了；他的野马（Mustang）和捷豹也消失了。他留下飞行认证考试（FCT）不值钱的牌照框，但现在装在一辆破旧的福特大车上。我父亲曾经拥有的财富在那个时候纯属理论。如果不是他取用信托基金的途径被阻断，就是他不认为自己还有权利动用那笔钱。不管原因为何，他都要看他父亲的脸色。

对讲机响起来的时候，父亲和我正在看一场电视转播的纽约大都会队（Mets）棒球赛。他看起来很意外，跑去应门。我听不到谁在楼下大厅呼叫，但我听到父亲轻声骂「混帐」。下午本来过得很悠闲，但现在父亲似乎很紧绷。他告诉我：「唐纳要上来两分钟。」

「为什麽？」

「不知道。」他似乎很烦躁，这对他来说并不寻常。

父亲把衬衫塞好，门铃一响就开了门。他退後两步让他弟弟进门。唐纳穿着三件式西装和闪亮的皮鞋，手上拿着一封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袋，上面绕了好几条橡皮筋。他走进起居室。看到我时喊：「嗨，小可爱。」

我对他招手。

唐纳转回去，轻蔑地四处张望，跟我父亲说：「真要命啊，佛瑞迪。」我父亲没理会。唐纳把信封丢在咖啡桌上，「父亲需要你在上面签名，然後拿回布鲁克林。」

「今天吗？」

「对。干嘛？你在忙吗？」

「你拿去给他。」

「我不行。我要回市区，去看一些要法拍的产业。现在正是占那些买在高点鲁蛇便宜的好时机。」

佛瑞迪绝不敢自己离开布鲁克林去搞开发。几年前，他和琳达有次周末出游，开车走跨布朗克斯快速道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到波可诺（Pocono），路边经过一排又一排的破房子，琳达提议他可以自行创业，到布朗克斯搞旧大楼翻新。

佛瑞迪说：「我不可能违逆父亲，布鲁克林是他的一切，绝不会同意。」

现在，唐纳看向窗外说：「父亲在布鲁克林会需要用人，你应该回去。」

「做什麼呢？说得确切些。」父亲讥嘲。

「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工作吧。」

「我以前做你的工作。」

在不自在的沉默中，唐纳看看他的表。「我的司机在楼下等。四点前把这个拿给父亲，可以吗？」

唐纳离开後，父亲在我旁边坐下，点了根菸。「所以，小家伙，」他说：「想搭车去布鲁克林吗？」

我们抵达办公室时，先去拜访艾美．卢尔森（Amy Luerssen），她是祖父的秘书和守门人（也是我的教母），桌位就在老板门外。艾美阿姨显然很喜欢我父亲，喊他「我的佛瑞迪」。

祖父的私人办公室是个采光不佳、方方正正的房间，墙上有垢斑和裱框证书，四周散置一大堆带有完整头饰的印地安酋长半身像。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後面，从似乎用不完的富莱尔牌（Flair）蓝色麦克笔，以及与大宅同样厚的廉价便条纸里，挑纸笔写字画画，直到该吃饭为止。如果我一个人待着，就会在他的椅子上疯狂旋转。

祖父永远都是带我们去葛乔洛餐馆（Gargiulo's）用餐，那是家正式的餐馆，用硬挺的布餐巾和桌布，他几乎每天都去。必恭必敬的侍者认得他，一直「川普先生」长「川普先生」短，替他拉椅子，整顿饭下来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需求。艾美阿姨或办公室有其他人和我们一起去用餐的时候，气氛比较好，因为那能减轻父亲的压力；他和祖父几乎无话可谈了。我们去办公室的时候，并不常遇到唐纳，但万一遇上，情况更糟。他会表现得像是他在主导全场，祖父似乎不仅鼓励，也很享受这种感觉。有唐纳在场，祖父就变了一个人。

一九七三年，司法部民权部门控告唐纳和我祖父违反《一九六八年公平住房法》（1968 Fair Housing Act），依祖父的说法就是拒租黑人

（die Schwarze）。那是联邦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住房歧视诉讼，恶名昭彰的律师罗伊．柯恩（Roy Cohn）提议协助。唐纳和柯恩曾在东五十五街、只限会员出入的时髦餐馆和迪斯可舞厅俱乐部碰过面，范德比尔（Vanderbilt）和甘乃迪（Kennedy）家族、一堆国际名流和世家子弟都经常出入那里。柯恩十多年前曾经很不光彩地参加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以失败收场的反共运动。他後来被迫辞去参议员首席法律顾问一职，但此前指控十几个人是同性恋或与共产党有牵连，已经先毁掉这些人的生活和事业。

如同许多性情乖戾但人脉很广的人一样，柯恩不受规矩所约束。他受部分纽约上流圈喜爱，又受雇於各式各样的顾客，包括媒体大亨鲁柏．梅铎（Rupert Murdoch）、黑帮老大约翰．高蒂（John Gotti）、美国律师和法律学者艾伦．德萧维茨（Alan Dershowitz），以及他成长的地方，纽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管区。他後来变得很有钱、很成功，非常有权有势。

虽然佛瑞德显得保守的地方，柯恩会显摆，佛瑞德不苟言笑的地方，柯恩会大声嚷嚷，但两人相异之处在於程度，而非类型。柯恩的伪善无情更公然无隐，佛瑞德则在於与家人相处时显露出自己精通此道；佛瑞德也把唐纳训练得会受到柯恩这类人的吸引，如同他後来受威权人物如俄罗斯总统普丁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等人的吸引，他们乐於接受逢迎拍马，也有嘉惠唐纳的权力。

柯恩建议川普管理公司对司法部提出反诉，求偿一亿美元，声称政府对他的客户做出错误和误导人的陈述。这项操作荒谬但高调有效，至少很有宣传效果，让时年二十七岁的唐纳首次登上报纸头版新闻。而且虽然反诉被法院驳回，但川普管理公司可以和解此案。他们没承认不法行为，仅须改变租赁作法以避免歧视行为。因为媒体广泛报导，柯恩和唐纳都认为打了一场胜仗。

当唐纳靠罗伊．柯恩之流发家致富时，支持他的是佛瑞德的慷慨赠与，以及相信自己天资聪颖且高人一等的妄念。讽刺的是，他小时候学得的防卫之道——在充满漠不关心、恐惧和忽视的童年，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以及被迫旁观佛瑞迪受虐，都得以训练他发展出哥哥明显欠缺的特质：他父亲要求的「杀手」特质和代理人能力。

没法明确知道佛瑞德何时开始留意唐纳，但我怀疑是从他将儿子送进军校之後。唐纳似乎很能接受来自他父亲的教诲，要强悍、成为「杀手」，他靠着吹嘘不时被学长痛揍，或假装不在乎自己被家里放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佛瑞德对唐纳越来越有信心，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纽带，且让唐纳有了坚定不移的自信。毕竟，家里最重要的人，唯一讲话有分量的人，终於表现出对他的偏袒。唐纳不像佛瑞迪，他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是正面关注。

大学毕业後，唐纳出社会，用他父亲的人脉去建立更多人脉，也用

他父亲的钱打造自己新兴权贵的形象，佛瑞德知道，儿子得到的好评有助於他的利益。毕竟，如果唐纳被视为一个有前途的谈判大师，佛瑞德将厥功甚伟——即使他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的访谈，佛瑞德声称，唐纳的成就远超过自己。他说：「我完全放手让唐纳去干。他有了不起的远见，几乎点石成金。唐纳是我所知最聪明的人。」这里面没一句真话，而且佛瑞德铁定在十年前就知道了。

赛马乐园一案之後，佛瑞德失去许多土地。若要扩展王国，他会需要新的赛场和一名代理人。他需要唐纳出面，打造品牌。佛瑞德没多久就发现，挥霍无度的次子并不适合经营不光鲜亮丽、预算有限、一板一眼的租赁业务。但有了他的支持，唐纳的傲慢自大、厚颜无耻，也许可以打进曼哈顿。佛瑞德绝非一无所知；他深度参与唐纳早期进军曼哈顿市场的所有布局，待在幕後搞定一切，由唐纳在台前吆喝聚众。唐纳扮演的角色能让佛瑞德满足获得认可的愿望，同时，他也能交由儿子去取得他朝思暮想的曼哈顿开发商头衔。佛瑞德永远无法获得公开的认可，但没了他，唐纳没有机会扬名立万、推销自己，对佛瑞德来说这就够了。功成名就全因佛瑞德和他的巨大财富。任何有关唐纳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佛瑞德的故事。佛瑞德也深知，秘密若被拆穿，计策就失效了。回顾过往，佛瑞德是操偶师，但不能被看见在儿子背後扯线。佛瑞德不是不清楚唐纳不是称职的生意人，但他知道唐纳在某些领域很有天分。佛瑞德肯砸数百万美元在儿子身上冒险，正是因为他相信唐纳的特点——自我推销的高手、厚颜无耻的骗子、打造品牌的能人——可以用来达成他一直做不到的事：符合他的自尊和野心、光是有钱买不到的那种名气。

一九八○年代末期，事况转差，但佛瑞德再不能和儿子的蠢行切割开来；做父亲的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投资。他已释放内心的恶魔。他唯一能做的是减轻伤害，维持现金流动，找别人背黑锅。

接下来的两年，父亲更加沉默寡言，也更阴郁，人瘦到不行。桑尼赛德大楼的公寓一片灰——因为座向朝西北、成天烟雾弥漫，也因为他的心情糟糕透顶。他早上甚至可能爬不起来，更别提照看我们一天。有时是宿醉，有时是忧郁症恶化。如果没有事先安排活动，父亲经常找藉口不陪我们，说他必须去工作或者为奶奶处理杂务。

有一次，父亲说，他有一份管理报童的工作。我曾短暂负责一条送报路线，据我所知，这意味着他是那个从後车厢搬出报纸分发给报童的人，他们收完钱再交给他。他曾告诉我，他一天能赚一百美元，我听起来像笔巨款。

一天晚上，我们在公寓与父亲的女友乔安娜（Johanna）共进晚餐。我希望她不在场，她的举止令人讨厌。

她不与我和佛瑞兹交流——甚至不去尝试。听她说「佛瑞迪，帮我点卷『飞哥』（fag）」实在很糟，她又不是英国人，干嘛那样称呼香菸，但後来连父亲也跟着那样讲话。

吃完饭，我开始讲述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在银行发生的事。她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时，我在一个柜台用不同的化名填提款单，写下我打算用以进行各式计画的夸张金额。我几乎掩饰不住自己觉得这整件事有多搞笑。但当我告诉他们我的秘密身分，想偷偷领现，以及挥霍计画时，父亲眼底出现担心的神色。

他问：「托斯堤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如果我留神，可能知道该住嘴了，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继续讲我的故事。

父亲越来越不安，身体前倾，伸手指着我。「你做了什麼？」虽然他的情绪常有起伏，但很少这麼生气，我也几乎没听他提高过嗓门。我很困惑，尝试回忆我的故事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错，但是没有意义，我的解释只是让他更激动。

「如果托斯堤先生发现这件事，你祖父会找我麻烦。」

乔安娜将她的手放在父亲手臂上，像是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她说：「佛瑞迪，这没什麼。」

「什麼叫没什麼？这该死的严重透顶。」

他的咒骂让我心生畏惧。

那一刻，乔安娜和我都知道，没法安抚他。他喝醉了，陷入昔日旧事。我尝试解释，让他冷静下来，但他听不进去。我当时才八岁而已。

一九七五年夏天，唐纳开记者会，公布建筑师对凯悦酒店（Grand Hyatt）的规画，像是已经赢得合约，能重建位於四十二街、中央车站旁边老旧的康莫德酒店（Commodore Hotel）。媒体将他说的话当事实报导。

同一个夏天，刚好在佛瑞兹和我去上夏令营之前，父亲跟母亲说，他有重要消息宣布。母亲邀他过来吃晚餐。父亲按门铃时，我去开门。他穿得一成不变——黑夹克和白衬衫——但衣服烫得很挺，头发服贴地向後梳。我没见过他这麼帅。

母亲拌沙拉时，父亲在我们的小阳台煎牛排。等备好食物，我们坐在靠阳台边的桌子，顶着门让夏日微风吹拂进来。我们喝的是水和冰红茶。

父亲宣布：「夏天结束时，我要搬去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我在近岸内水道（Intracoastal）找到一间很棒的公寓，後头还有个码头。」他已经选好一艘船，等我们过去，要带我们去钓鱼和滑水。他讲话时，似乎快乐又有自信——很放松。我们都知道这是正确的决定，感觉到睽违已久的希望。

第八章

脱离速度

我坐在饭厅，前方餐桌摆了一只鞋，我在想这是什麽意思。我遥望圣诞树下方剩余的礼物盒，猜想或许另一只鞋被分开包装，但没有，就只有这只鞋——一只四英寸高的金葱鞋，里面塞满硬糖。糖果和鞋子本身均以玻璃纸包装，这个玩意儿打哪来的？我不禁好奇。那是来店礼或某场午宴送的礼物吗？

唐纳从厨房经食品储藏室走来，经过我时，他问：「那是什麽？」

「那是你送的礼物。」

「真的啊？」他看了一秒钟。「伊凡娜！」他朝门厅呼喊。伊凡娜站在靠客厅圣诞树的另一侧。「伊凡娜！」

「怎麽了，唐纳？」

「这很棒。」他指着这只鞋，伊凡娜微笑以对。也许他以为这是真的黄金。

这一切始於一九七七年高档百货公司布鲁明（Bloomie）的三件装内裤，零售价十二美元，这是唐纳与其新婚妻子伊凡娜送我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同一年，他们送佛瑞兹一本皮革日记本。那似乎本来要送给更年长的人，但这本日记本真的不错，我觉得有点遭到轻视，直到我们发现它已经过期两年。至少内裤不会过期。

过节时，唐纳和伊凡娜停在大宅前的车不是昂贵的跑车，就是私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甚至比祖父的车还长。他们像名人般旋风式地走进门厅，伊凡娜身穿皮草和丝绸衣物，搭配张扬的发型与妆容；唐纳则穿三件式的高档套装，鞋子闪闪发光。相较之下，其他人的打扮则显得保守又落伍。

自幼我以为唐纳独自打拚，凭一己之力建立事业，将我的家族姓氏摇身变成品牌；我还觉得我那粗俗又吝啬的祖父只关心发大财和守住财富。这两件事都与真相天差地别。《纽约时报》在二○一八年十月二日刊登一篇文章，揭露我的家族在过去数十年间涉嫌多起诈欺、准法律和非法活动，内容如下文：

佛瑞德．川普与其公司也开始向唐纳．川普提供大笔贷款和信用额度，一比之下，川普家族其他人的贷款则相形见绌，而且有时金流源源不绝，公司变得像是唐纳．川普自己的印钞公司。根据纽泽西州赌场监管机构提交的纪录，以一九七九年为例，他在一月借一百五十万美元，二月借六万五千美元，三月借十二万两千美元，四月借十五万美元，五月借十九万两千美元，六月借二十二万六千美元，七月借两百四十万美元，八月借四万美元。

罗伊．柯恩在一九七六年建议唐纳和伊凡娜签署婚前协议，伊凡娜的赔偿条款依佛瑞德的资产而定，因为当时唐纳父亲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从我祖母那里听说，除了赡养费、子女抚养费和住房费，在伊凡娜的坚持下，这份婚前协议还包含十五万美元的「备用基金」。我爸妈的离婚协议并非根据祖父的资产而定，但伊凡娜额外获得十五万美元的赔偿，却几乎堪比我母亲过去二十一年、每个月六百美元的子女抚养费和赡养费之总额。

在伊凡娜加入前，过节总千篇一律，印象交叠模糊。我五岁的圣诞节跟十一岁的圣诞节几无区别，那些例行活动从未变过。我们会在下午一时从前门进大宅，带来数十份礼物，大家互相握手与亲脸颊致意，接着到客厅享用鲜虾鸡尾酒盅。就跟前门一样，我们一年用客厅两次，我爸来了又走，但我不记得有任何情况让他待在那里。

感恩节和圣诞节晚餐一模一样，虽然有一年圣诞节，奶奶贸然做了烤牛肉而不是烤火鸡，大家都喜欢这道菜，但唐纳和罗伯特感到不满；结果整顿晚餐吃下来，奶奶一直低着头，双手摆在腿上。正当你觉得可以永远把这件事抛诸脑後时，某个人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天哪，妈，我不敢相信你没准备火鸡。」

伊凡娜成为家族一分子後，她跟着唐纳进入餐桌的权力中心，唐纳坐在我祖父右侧，他是唯一与祖父平起平坐的人。最靠近他们的人（玛丽安、罗伯特和伊凡娜）负责追捧喝采，唯一任务就是支持唐纳，跟随他主导的对话，并且听从他的意见，宛若他的重要性无人可比。我想一开始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玛丽安和罗伯特早就知道，没必要跟他们父亲明显偏袒的人唱反调。「我从未挑战过我父亲，」玛丽安说道：「从来没有。」随波逐流简单多了。唐纳的幕僚长就是此现象的绝佳示范，约翰．凯利（John Kelly）至少有段时间如此，而米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则毫无保留地照本宣科，直到他们因为不够「忠诚」而遭革职，马屁精的下场总是如此。无论铸下多大错误，他们一开始会保持沉默，接着无所作为，成为共犯；最後他们才发现自己被推出去，沦为唐纳的代罪羔羊。

一段时间後，佛瑞德对待唐纳与其他子女的差别显而易见，令人痛苦。对罗伯特和玛丽安来说，更简单的作法就是听令行事，免得受到更恶劣的对待，这似乎跟现在国会共和党人每天打的算盘一样。他们也知道我爸达不到佛瑞德期待的下场。坐在餐桌另一端的其他人显得多余；我们的任务就是填满那些廉价的空位。

我收到金葱鞋的隔一年，唐纳和伊凡娜送我的礼物篮中了大奖：显然这是转赠的礼物，毫无用处又彰显出伊凡娜对玻璃纸的爱好。我拆开礼物篮後，注意到里面有沙丁鱼罐头、一盒小麦饼、一罐苦艾酒橄榄、一根萨拉米腊肠，铺满薄纸的篮子底部有一个圆形凹陷处，那里原有另一个瓶罐。我的表哥大卫经过时，指着那个凹陷处问：「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跟这些差不多的东西吧，我猜。」我说，一边拿起那盒饼乾。

「也许是鱼子酱。」他边说边大笑。我耸耸肩，不知道鱼子酱是什麼。

我提起篮子，走向我在楼梯旁堆放成堆礼物的地方。途中我经过伊凡娜和祖母，我提高篮子说了声「谢谢，伊凡娜」，然後把提篮放到地上。

「那是你的吗？」

一开始我以为伊凡娜说的是礼物篮，但她说的是那本我放在礼物堆上方并翻开的《奥秘》（Omni）杂志。《奥秘》是那年十月出版的科学与科幻小说杂志，也是我近期的心头好。我把刚拿到的十二月号带来大宅，希望在吃鲜虾盅和晚宴中间有机会把它读完。

「噢，对呀。」

「鲍勃，那名发行人，他是我朋友。」

「不会吧！我爱这本杂志。」

「我会介绍给你认识，你之後来市区见他。」

虽然比不上见到科幻大师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那般震撼，但也相差不远。「哇，谢谢。」

我把餐盘装满後，拿到楼上爸爸的房间，他整天待在房内，不愿跟大家待在一起。他坐着听收音机，我把餐盘交给他，但他不感兴趣，把餐盘放到旁边的小桌。我告诉他有关伊凡娜的慷慨提议。

「等一下，她要把你介绍给谁？」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名字。我和伊凡娜聊完後马上看杂志的资讯

栏，那边写着：发行人鲍伯．古乔内（Bob Guccione）。

「你要去见那名发行《阁楼》（Penthouse）杂志的人？」就算年仅十三岁，我也知道《阁楼》杂志是什麼。我们不可能在说同一个人，我爸笑道：「我不觉得那是个好点子。」突然间，我也这麼认为。

我实在没办法嘲笑我母亲收到的礼物。她与父亲离婚几年後，为何家族还是期待她参加家庭节日仍是个谜，但她还继续参加则是更大的谜团。显然，川普家族不希望她在场，更胜於她想出席的意愿。他们送妈妈的一些礼物很不错，但贩售这些礼物的店家总是比伊凡娜和罗伯特妻子布莱茵（Blaine）的礼物店家更低阶。更糟的情况是，很多礼物明显是转赠他人的礼物。某一年妈妈收到伊凡娜送的名牌包，但里面有一张用过的卫生纸。

我们用过晚餐和拆完礼物後就会散开，有些人会到厨房，有些人则到後院，其余的人到书房，我则在书房门边地上盘腿而坐。我隔着一段距离，看着唐纳和罗伯特刚好转到的哥吉拉电影或足球赛。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妈妈不在附近，我原本不担心，但她没出现，我就去找她了。我查看厨房，但只看到祖母和姑姑。我走到後院，看到哥哥和大卫在玩足球。我问佛瑞兹妈妈去哪里时，他回答：「我不知道。」显然并不在乎。几次下来，我根本不用问就知道母亲人在哪里，但头几次还是让我心慌。

妈妈在饭厅，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当时餐具已收拾乾净，唯一用餐过的证据就是地板零散的纸巾。我站在门边，希望她会注意到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她有所反应。我害怕说出任何话，不希望打扰到她。餐厅传来隐约的餐盘碰撞声，那边在聊剩菜跟冰淇淋蛋糕，我则在褪去的午後光线中慢慢走向那张红木桌。吊灯早已熄灭，但我希望光线更暗一点，这样我就不用看到妈妈的脸庞，她看起来心力交瘁。

我坐到她旁边的椅子，小心翼翼不要触碰到她，我说不出也得不到安慰，除了与她同在。

唐纳和伊凡娜送我内裤礼物的八个月前，他们在大理石学院教堂结婚，并在高档餐厅「二一俱乐部」（21 Club）举行婚宴。母亲、佛瑞兹和我被降级到表亲桌，爸爸并未到场。家族告诉我的谎言是爸爸受邀当唐纳的伴郎和婚宴司仪，後来由美国艺人乔伊．毕晓普（Joey Bishop）担任婚礼主持人；但其实家族早就决定要我爸待在佛州，由他照顾姨公维克（Vic），也就是奶奶的姐夫。实情是，纯粹是祖父不想看到他参加婚宴，要他别来。

唐纳在曼哈顿四处寻找法拍屋时，我几乎每周「输掉」数万美元。周五放学後，我会到朋友家玩我们自有版本的大富翁；房屋和饭店两倍，钱也两倍。我们玩的是横跨整个周末的马拉松长赛，一场游戏可能持续三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整个游戏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我的表现：每次玩，每次输。

为了让我有翻身机会（这是我朋友的某种挑战），我可以向银行大量举债，最後再向对手借钱。我巨债滚滚，在盒盖内侧，满满都是我的债务纪录。

虽然我的表现烂到无可救药，却从未改变我的策略；我走到大西洋城哪里，就买下一栋房地产，并盖起房子和饭店，就算我没机会回本也是如此。不管我输得多惨，我还是三番两次重复这样的策略。这是我跟朋友间的大笑话，我身为房地产大亨的孙女和侄女，房地产经营却烂得可以。原来唐纳和我还是有一些共同点。

打我父亲过世後，唐纳便认为「他们」（指他和我祖父）当初应该「让」佛瑞迪做他热爱且擅长的事（驾驶飞机），而不是强迫他做他厌恶又不擅长的事（房地产）。但没证据显示我父亲欠缺经营川普管理公司的能力，就像没证据显示唐纳有此能力一样。

一九七八年某天晚上，爸爸在西棕榈滩公寓因胃部剧痛而醒来。他撑着身体到车上，再开到急诊室，之後他告诉我妈，他到医院後并未立刻进入，当时他待在车上，考虑他该不该求救。他想，也许让事情到此为止会更简单一点，最後迫使他求救的唯一念头，是他想到我和佛瑞兹。

爸爸病得太严重，被转院到迈阿密一间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心脏病，需要进行手术。佛瑞德叫玛丽安飞到佛州，帮我爸办出院并带他回纽约。那是父亲最後一次北上，他在佛州待了三年後，终於要回家了。

纽约医生发现，爸爸患有二尖瓣缺损，他的心脏扩大，情况危急。他必须进行实验性手术，用健康的猪心瓣膜取代。

妈妈和我在爸爸动手术前到大宅探望他，伊莉莎白已经在我爸那间童年小卧室，并坐在他旁边，我们称那间房为「蜂房」（the Cell)。他躺在窄床上，我亲了他的脸颊，但没坐在他身旁，免得弄痛他。我之前看过爸爸因为肺炎、黄疸、喝醉酒和绝望而不适，但现在的状况令人震惊。他还没四十岁，却像个八十岁老人一样受尽风霜。他跟我们说手术和猪瓣膜，妈妈说：「佛瑞迪，幸好你不用遵守犹太饮食规定。」大家都哈哈大笑。

复元之路很漫长，爸爸待在大宅养身体。术後一年，他已经比先前好多了，但永远无法恢复到可以再次独自生活。一部分的阻碍或许在於财务，他又开始帮祖父工作，但这次是维修人员。不出所料，除了几次进出康复治疗中心戒酒之外，其余时候他都喝个不停。他有一次跟我说，医生警告他：「你再继续喝，酒会害死你。」就算是开心手术仍不足以阻止他。

那年感恩节，是爸爸返回纽约後第一次跟大家一起用餐，他跟我一起坐在餐桌另一端面对奶奶，爸爸苍白瘦弱如鬼魅。

用餐到一半，奶奶开始透不过气。「你还好吗，妈？」爸爸问道。似乎没人注意到此情况。奶奶不断挣扎着，餐桌另一端的人曾抬头看发生了什麽事，但随後又低望餐盘继续用餐。

「来吧，」爸爸一边说，一边扶着奶奶的手腕，轻轻帮助她站起来。爸爸带奶奶到厨房，我们听到奶奶拖着脚步发出一些痛苦的闷哼声，爸爸则一边进行哈姆立克急救法；一九六○年代末期到一九七○年代初期，他担任救护车志工驾驶时学会这招。

他们返回餐桌後，出现零星的掌声。「做得好，佛瑞迪。」罗伯特说道，好像我爸刚才杀了只蚊子似的。

就算唐纳不在大宅，他的存在却挥之不去。每次爸爸要去厨房或回房时，就必须经过一场挑战：早餐室的桌上摆放许多杂志封面和报纸文章。自从一九七三年的诉讼後，唐纳便成为纽约小报的常客，祖父会收集每一篇提到唐纳名字的文章。

爸爸搬回大宅时，唐纳正在处理凯悦酒店的协议，这不过是祖父於一九七二年在纽泽西州和唐纳达成合作协议的复杂版。一开始得以促成凯悦酒店协议，是因为祖父与纽约市市长亚伯．贝姆（Abe Beame）有往来。佛瑞德也大力赞助纽约市长与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的竞选活动。凯里的募款人路易丝．森夏恩（Louise Sunshine）为此协议居中牵线。为了达成协议，贝姆提供他维持四十年、每年一千万美元的减税优惠。康莫德酒店拆除工程开始後，纽约报纸引述唐纳的原话报导，继续称此协议由唐纳一手完成。

爸爸搬回纽约後，或许是为了敉平我们之间的鸿沟，他告诉我，一九八一年五月希望为我举办一场甜蜜十六岁（Sweet Sixteen）生日派对。凯悦酒店已在几个月前盛大开幕，爸爸说他会问唐纳能否使用一间小型舞厅。唐纳似乎等不及找机会向家族炫耀他的新建案，便一口答

应，甚至还给爸爸优惠价。

几天後爸爸告诉祖父这项派对计画，当时我们三人在早餐室，餐桌上满是剪报。「佛瑞迪，」祖父生气地说：「唐纳很忙，他不需要管这种鸟事。」

言外之意很清楚：唐纳很重要，他在做重要的大事；你则不然。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怎麽解决，但最後爸爸搞定了。我要有自己的派对了。

我的宾客多半已到达，我和一小群朋友站在一起，这时唐纳走进大门。他走向我们这边，没打招呼，而是张开双臂说道：「这是不是很棒？」

我们都同意，确实很棒。我再次感谢他让我们使用他的饭店，接着将他介绍给每个人。

「所以你觉得大厅怎麽样？美妙极了，对吧？」

「美极了。」我回答。我的朋友纷纷点头。

「没人可以成功办到，看看那些窗户。」

我担心接下来他可能会说厕所磁砖有多棒，但这时他看到祖父母，他与我握手并亲了我的脸颊道：「玩得开心，亲爱的。」接着他走向祖父母。爸爸坐在离他们几桌之外的地方，独自一人。

我转身找朋友时，他们盯着我。

「搞什麽鬼？」其中一人问道。

一九八一年夏季，玛丽安开车载我爸到纽泽西州贝尔米德（Belle Mead）精神医疗保健机构开利诊所（Carrier Clinic），大约半小时车程外的贝德明斯特（Bedminster）有一处地产，後来被唐纳改建为高尔夫球场。爸爸不甘不愿完成三十天疗程，疗程最後一天，玛丽安与其第二任丈夫约翰．巴瑞（John Barry）去接他回大宅，这里可以说是他最糟的去处。隔天玛丽安去看我爸时，爸爸早已再次开喝。

佛瑞迪失去他的家、家人、工作、大部分的意志力和多数朋友，最後留下来照顾他的只有他的父母，而他们讨厌如此。到头来，佛瑞迪的存在惹恼了他的父亲。

佛瑞德对待我爸的态度，成为其他孩子的经验教训——一种警告，不过最後，这种控制却变了调。佛瑞德常在儿子身上展现拷问者的完全

权威，但最後却困於儿子与日渐长的依赖中，而佛瑞迪酗酒、健康每下愈况，同样脱离不了他的父亲。基本上这是佛瑞德自作自受，他想不到也无法预见这种情况。这证明他的权力有其局限。

我八月从夏令营返家後，宣布我想要去读寄宿学校。我向爸爸解释原因，我在邱林学院就读十年，我的姑姑叔叔都在同一间小学校念书，我觉得被校友团团围绕，相当乏味。我想要更不一样的挑战，有校园、有更棒的运动设施和更多机会的地方。爸爸警告我有可能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但我想他明白，虽然我说的理由都是真的，但我更需要的是离开。

问题在於我只剩下三周时间，我得思考要去哪间学校、完成申请并获得入学通知。一九八一年八月的最後两周，妈妈和我几乎参观了康乃狄克州和麻萨诸塞州每一间寄宿学校。

我在等待结果时，我们必须获得祖父同意，或至少这是爸爸的说法。

我们两人站在祖父常坐的双人沙发前，爸爸解释我们的计画。「她这麽做是为了什麽？」祖父问道，好像我没站在他面前似的。「邱林学院很好。」他在那里读书长达十三年。

「只是该有点改变了。拜托，爸，这有利於她。」

祖父抱怨额外开销太多，虽然这笔学费出自爸爸的信托基金，完全不会影响到他，接着祖父又重申邱林学院非常优秀。不过爸爸并未却步，我不觉得祖父真的在乎我去哪间学校，但我很感激爸爸又一次与我站在同一阵线。

出发去寄宿学校前一天，我从海兰德公寓骑脚踏车去祖父母家，我沿着车道滑下去，把脚踏车靠在车库旁的高砖墙，再爬几个阶梯沿着小路到後门。

九月初午後的後院悄然无声，我跃上两个阶梯来到水泥露台上，按了门铃。门外没摆家具，只有空空的平板。小时候只有叔叔罗伯特会用到这片区域，之前那里有几张铁椅，他周末回家时会把椅子拉在一起，再拉一张椅子来靠脚；他涂上厚厚的婴儿油，然後在下巴处放可摺叠的铝制助晒板。

几分钟後，我准备再按第二声门铃时，祖母终於来应门了。她似乎很诧异会看到我，我拉开纱门准备进门，但奶奶却在门廊站着不动。

「嗨，奶奶，我来看爸爸。」

奶奶站在那里，双手磨着围裙，紧张兮兮，好像我逮到她在做什麼一样。我提醒她，明天我要去学校了。她个子高，将金发梳高整齐固定在脑後，看起来比以往更严肃。她并未移动让我进门。

「你爸不在家，」她说：「我不知道他什麼时候回来。」我感到困惑，我知道爸爸想跟我道别，我们前几天才谈过此事。我猜他忘了我要来找他。去年，他也常忘记我们安排好的计画，说实话，我不太惊讶，但仍觉得不太对劲。我和祖母所站之处的正上方，爸爸的卧室窗户敞开，传出收音机的声音。

我假装不在乎，对奶奶耸耸肩说：「那好吧，告诉他晚点打给我吧。」我走向前给她一个拥抱，她的双臂轻轻环住我。我转身离开时，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我走过小路、下阶梯到车道，跨上脚踏车然後骑回家。隔天我前往学校。爸爸一直没打给我。

我在埃尔沃克中学（Ethel Walker School）全新礼堂看电影，投影机转暗後电灯就亮了。学生到礼堂原本要看《山那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这是描述一名奥林匹克滑雪选手在一场滑雪意外中瘫痪的励志故事；不过电影却被安排成《午夜情挑》（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这显然是不同类型的电影，里头有早期强暴的画面。教职员有点混乱，并讨论下一步该怎麼做，我们学生则觉得很好笑。

我和一些室友坐在一起谈笑时，我看到体育老师黛安．邓恩（Diane Dunn）穿越人群。邓恩在我每年去的帆船营担任辅导员，所以我自幼就认识她。对沃克中学的其他人而言，她是邓恩女士，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在营队中，她叫邓恩，而我叫川普，我们也一直这样称呼彼此。她是我决定要来寄宿学校的一大原因，我到那里才两周，她依旧是我真正唯一认识的人。

我向她招手并微笑道：「嘿，邓恩。」

「川普，你得打电话回家。」她说。她握着一张纸条，但没将那张纸递给我，她看起很慌张。

「怎麼了？」

「你得打给你母亲。」

「现在吗？」

「对。如果她不在家，就打给你祖父母。」她像背诵台词一样对我

说话。

当时已接近晚上十点，我从没那麼晚打给祖父母过，但是爸爸和祖母经常跑医院；爸爸因为长年大量饮酒和抽菸，奶奶则是因为骨质疏松症而经常骨折。我不是真的很担心，或者我想这次应该不会比往常更严重。

我的宿舍与礼堂相邻，所以我走到外头，经过两栋建筑间的椭圆形草皮，爬上两层楼到我住的楼层。公用电话挂在门旁楼梯平台的墙上，我拨了一通受话人付费电话给妈妈，但无人接听，所以我拨给大宅。奶奶接起电话并接受电话费，所以紧急对象不是她。她迅速说声不太清楚的「哈罗」後，将电话递给祖父。

「喂。」他说，跟往常一样简洁、公事公办。有一瞬间容易让人觉得一定搞错了，什麼事都没发生。但一定有什麼紧急大事，逼得我从礼堂离开，我看到邓恩在礼堂找我时，眼神充满惊慌。我到很後来才知道邓恩已经知道的事。

「发生什麼事了？」我问。

「你母亲刚离开，」祖父说：「她应该等一下就到家了。」我可以想像祖父在灯光昏暗的书房靠着电话桌，身穿浆过的白衬衫、红领带和海军蓝三件式套装，满脸不耐地和我讲话。

「但发生了什麼事？」

「你爸被送到医院，但没什麼好担心的。」他像在播报天气一样说道。

我本可在那时就挂断电话，我本可回去试图在新学校融入新环境。

「是他的心脏吗？」以任何方式挑战祖父，对我来说简直前所未闻，对任何人都是，除了唐纳，不过有人叫我打电话显然出於某个原因。

「没错。」

「那就是很严重了。」

「没错，我会说很严重。」对话一度停下，或许，他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真相。「去睡觉，」他最後这麼说：「白天打电话给你母亲。」他挂断电话。

我站在楼梯间，手持着电话，不太知道该怎麼办。楼上的门突然甩上，接着传来越来越响的脚步声，几名学生经过我往一楼走去。我把话筒挂回话架，重新拿起，然後试着重打给妈妈。

这回她接起电话了。

「妈，我刚和祖父讲完话，他说爸在医院，但不跟我说发生什麼事，爸还好吗？」

「他心脏病发。」妈妈说道。

从她说话的那刻起，时间就变了质。或许是下一个瞬间，我不太记得，但震惊的冲击可回溯至此刻。不管怎麼样，妈妈继续说，但我听不进去她说的任何话。就我所知，对话中间毫无停顿，但部分内容却从未留下。

「他心脏病发？」我说，说着最後几个我听到的字，好像我没错过重点一样。

「噢，玛莉，他死了。」我母亲开始哭。「我真的曾经爱过他。」她说。

我母亲继续说着，我靠墙滑下，直到我坐在地板。我放下电话，让话筒吊挂着线，然後等待。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周六下午的某个时候，祖父母其中一人叫了救护车。我当时不晓得，但爸爸已经重病三周了，那是第一次有人打电话请求医疗协助。

祖母经常出入牙买加医院以及布斯纪念医院与医疗中心，我爸也在牙买加医院住过几次院。祖父母的所有孩子都在那里出世，所以我的家族与牙买加医院的院方和职员有长久关系。特别是牙买加医院，祖父母曾捐款数百万美元，一九七五年川普护理与复健大楼（Trump Pavilion for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则以祖母之名来命名。至於布斯纪念医院，祖母曾在那里热心担任救世军志工，我因为严重气喘而在此度过大半童年。一通电话就能确保他们的儿子在任一间医院获得最好的治疗，但没人打过半通电话。救护车送爸爸到牙买加的皇后医院中心（Queens Hospital Center）时，没人陪同。

救护车离开後，祖父母打给其他四个孩子，但只有唐纳和伊莉莎白能到场。他们抵达时已经接近傍晚，医院传来的消息明确指出，爸爸已经危在旦夕。还是没人去医院。

唐纳打给我妈让她知道情况，但电话一直忙线。他联系我们的教育总监，告诉对方联系我母亲。

我妈立刻打电话到大宅。

「医生认为佛瑞迪可能熬不过，琳达。」唐纳告诉她。妈妈甚至不晓得爸爸生病。

「我去大宅，如果有任何消息我就能在那，这样好吗？」她不希望独自一人。

妈妈没过一会儿便抵达，祖父母单独坐在书房；唐纳和伊莉莎白则去看电影。

妈妈与祖父母一起坐下，没人说太多话。几个小时过後，唐纳和伊莉莎白回来了。他们得知没有消息後，唐纳离开，年近四十岁的伊莉莎白泡了一杯茶，便上楼回房。妈妈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是医院打来的。爸爸在晚间九点二十分被宣告死亡，当时他四十二岁。

没人想过要去学校接我，但有人安排我搭隔天早上的公车。邓恩开车载我到哈特福（Hartford）的灰狗巴士车站，我在那搭乘开往曼哈顿航港局（Port Authority）公车总站的车。妈妈和哥哥到曼哈顿接我，之後返回大宅，其他家人已聚在早餐室讨论丧礼事宜。玛丽安和她的儿子、我的表哥大卫也在场；我的叔叔罗伯特与布莱茵；唐纳与伊凡娜，当时她已怀了伊凡卡近八个月，还有他们的三岁儿子唐尼。没人同我母亲、哥哥和我说太多话。有些人试图强迫自己表达关心，多半是罗伯特，但他们词不达意，很快就放弃了。祖父和玛丽安低声谈话，祖母烦恼追悼会要穿什麽；祖父为她挑了黑长裤套装，但她不满意。

当天下午，我们开车到斯图兹曼父子殡仪馆（R. Stutzmann & Son Funeral Home）进行私人瞻仰，那里是皇后村（Queens Village）一个小地方，距离大宅约十分钟。我们进到已安置好棺材的主厅前，我问罗伯特叔叔能否与他讨论一件事，我把他拉到大厅旁远离访厅的小凹室，「我想看爸爸的遗体。」我没道理要扭扭捏捏，没什麽时间了。

「不行，玛莉，这不可能。」

「罗伯特，这很重要。」这不是基於宗教因素，或因为我认为这是必要流程；我先前从未参加过丧礼，完全不懂流程。虽然我知道我必须见爸爸一面，但我无法解释原因。我怎麽能说：「我不敢相信他死了，我没理由要相信，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我只能说：「我必须见他。」

罗伯特停顿一下，好不容易开口：「不行，亲爱的，你爸爸准备要火化了，他的遗体没准备供人瞻仰。如果这是你对他的最後记忆，会很可怕。」

「没关系。」我感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绝望。罗伯特低头看着我，然後转身离开。我站在他面前说：「拜托，罗伯特。」

他再度停下来，然後开始走向大厅。「来吧。」他说：「我们应该

进去了。」

周一开放追悼会的两个时段间，全家返回大宅用餐。唐纳和伊凡娜在路上绕去超市，买大量的分装冷切肉，玛丽安和伊莉莎白则摆盘放在餐桌上，大家选择用餐或者忽略这相对的静默。

我没胃口也没加入谈话，所以我离开早餐室在大宅四处逛，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走到书房门廊对面的後楼梯，瞥到唐纳手持电话。我不知道他刚讲完电话，还是准备打电话，但他注意到我站在走廊後，他把话筒放回电话上。我们都没说话。母亲节後我就没见过唐纳了，当时我们到祖父在长岛的乡村俱乐部北山（North Hills）庆祝。除了奶奶，我不期待任何人会落泪，但唐纳，以及尤其是祖父，似乎对我爸的离世处之泰然。「嘿，唐纳。」

「怎麽了，亲爱的？」我有时会好奇我叔叔是否真的知道我的名字。

「爸爸准备火化了，对吧？」多年来我明白，这就是爸爸期盼之事。他强烈希望不要下葬，这甚至是他婚後最先告诉妈妈的几件事。他的坚持几近於一种着迷，因此我不到十岁就知道此事。

「没错。」

「然後呢？他该不会要下葬了吧，是吗？」

唐纳脸上闪过不耐的表情，显然他不想要进行这场对话。「我想没错。」

「你知道这没道理，对吧？」

「那是爸希望的。」他拿起电话。他注意到我没移动，便耸了耸肩继续拨号。

我转身走上後方阶梯。二楼长廊的一端是伊莉莎白的边间房间，玛丽安的房间位於两人共用浴室的旁边；另一端是唐纳与罗伯特共用的房间，床罩为蓝金色，与窗帘相配。更大的祖父母主卧室就在他们的房间旁，内有奶奶独立的试衣间与镜墙。走廊中间就是蜂房，爸爸的窄床已经拆掉床罩，露出薄薄的床垫。他的收音机仍放在小床头桌上。衣柜门半敞，我看到几件有领扣的白衬衫歪七扭八地挂在金属衣架上。就算在如此艳阳日，唯一一扇窗仅微透亮光，房间在阴暗中显得简朴。我觉得我该进去，但里头已无可眷恋。我往回走下楼。

追悼会恰好落在犹太新年第一夜，但爸爸的许多兄弟会同胞仍旧前来。他的朋友斯图（Stu）常偕妻子茱蒂（Judy）参加牙买加医院的晚宴派对和慈善活动，除了比利．德雷克，斯图或许是爸爸的朋友中最了解我家族的人。斯图看到祖父独自站在房间後方，便走过去致意。两人

握手，斯图表达哀悼後表示：「看来房地产不太顺利，我希望唐纳没事。我常在新闻上看到他，他似乎欠银行很多钱。」

佛瑞德用手环绕住斯图的头，笑着说：「别担心唐纳，他很好。」唐纳并不在场。

我哥发表唯一一场悼词（或至少我只记得他的悼词），这可能是他从奥兰多（Orlando）搭机途中在活页纸上写下的内容，当时他是罗伦斯大学（Rollins College）的大二生。他回忆他与爸爸共度的美好时光，多半时候我都太小记不得，但他不畏去谈论爸爸生命中的根本现况。他一度提到爸爸不愿墨守家族规定，现场清楚可闻不少宾客倒抽一口气。过了那麽久，我仍兴奋地感到认同，并有种为爸爸一吐为快的感觉——终於啊。哥哥永远比我更擅长与家族谈判，他勇於说出真相。我欣赏他的坦荡，也羡慕他似乎比我有更多关於爸爸的美好记忆。

追悼会迈入尾声时，我看大家开始排队走向棺材，停下後闭目，双手合十——有时跪在一张低矮的垫椅上，那张椅子似乎是蓄意摆放在那里——然後继续移动脚步。

轮到姑姑伊莉莎白时，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啜泣。在所有人都克制心情、表现冷淡之际，她展现的情绪显得突兀，其他人沉默警觉地望着她，但没人走向前。她双手放在棺木上，随後滑落到膝上。她的身体剧烈发抖，以至於失去平衡向旁跌坐在地。我看着她跌倒。她躺在那里好像不知身在何处，或不知她在做什麼，只是不断痛哭。唐纳和罗伯特终於从房间後方走过去，他们本来在後方与祖父谈话，而祖父则在原地不动。

两位叔叔将伊莉莎白从地上扶起，她一瘸一拐地被他们拉出房间。

最後我终於走向棺材，短暂停留一会儿。棺材看起来小得不可思议，我想一定是哪里搞错了。爸爸六尺二寸高（约一百八十八公分），不可能塞进这口棺木中。我无视那张椅子，坚持站着。我低下头，把注意力全放在棺材上的一处黄铜装饰，无话可说。

「嗨，爸。」最後我终於低喃说道。我低头站在那里绞尽脑汁，直到我突然发现我可能站错边，我本来要跟爸爸说的话竟是对着他的脚说出。我觉得窘迫，便退了一步转身去找朋友。

丧礼没有教堂仪式，棺材被送往火葬场，我们在旁边的教堂小聚——教堂洒满阳光，异常明亮——那里有一名教派不明的牧师，他既不认识爸爸，而且家族也没人关心，未向牧师谈论这名即将被交付至火焰中的男人。

待丧礼事宜完成後，全家打算开车到中村（Middle Village）全信仰公墓（All Faiths Cemetery），家族在那有块地；当时我的曾祖父母佛瑞德里克和伊莉莎白．川普是唯二居民。我後来得知，妈妈、哥哥和

我在过去两天，都分别拜托了不同的家族成员，以允许让爸爸的骨灰可以撒在大西洋海上。

我们离开教堂前，我追上祖父并做最後恳求。「爷爷，」我说：「我们不能埋葬爸爸的骨灰。」

「容不得你来决定。」

他开始迈步离开，但我抓住他的袖子，明白这是我最後的机会。「难道不是吗？」我问：「他想要火化是因为他不想下葬，拜托，让我们把他的骨灰带到蒙托克。」

我一吐出这几个字，就明白我犯了大错，祖父也明白。蒙托克使他联想到爸爸轻佻的嗜好，像是划船和钓鱼，那些活动使他未能专注於房地产的正经生意。

「蒙托克。」他重述并几乎笑起来：「想都别想，上车。」

阳光照耀着大理石和花岗岩的墓碑刻字，祖父粗眉下的淡蓝眼睛也在日光下眯起，他说本已刻印他父母名字的墓碑将暂时移除，这样才能加上我爸爸的名字与逝世日期。他一边说，一边像个二手车商张开双手，近乎愉快地蹬地跳着，他知道法律见证人是个乡巴佬。

祖父遵照法律的字面意义，然後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爸爸火化後，他们将他的骨灰放入金属盒，然後埋入地底。

爸爸的死亡证明书写下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并说明为自然死因。我不知道四十二岁怎麽出现自然死因。爸爸没留下遗嘱，如果他有任何东西可留下——书、相片、他老旧的七十八转唱片、他的美国空军预备军官训练团（ROTC）和国民兵（National Guard）奖牌——我不晓得。我哥拿到爸爸的天美时（Timex）手表，我没拿到任何东西。

我年岁渐长，大宅似乎越发冷淡。父亲逝世後的第一个感恩节，大宅依旧冷漠。

晚餐後，罗伯特走过来将手放在我肩上，他指向我刚出生的堂妹伊凡卡，她在婴儿床睡觉。「看，就是这样运作的。」我明白他想说的意思，但我觉得他的话已经到嘴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至少他试过了。佛瑞德和唐纳并没有表现得有任何不同，他们的儿子与哥哥过世，但他们讨论纽约政治、协议和丑女人，一如往常。

佛瑞兹和我回家过圣诞节假期时，我们见了祖父的其中一名律师尔

文．德班，想仔细了解爸爸的房产细节，此前妈妈的主要联系人麦修．托斯堤已过世。我很讶异爸爸竟有一间房产，我以为他过世时身无分文。但显然有祖父和曾祖母设置的信托基金，像是支付我寄宿学费的那种信托基金，所以我之前并不知情。房产将由我和哥哥对分，我们三十岁前将由信托托管。这些信托基金的指定管理人兼我们兄妹的长期财务利益保护人，分别是尔文．德班、玛丽安姑姑，以及唐纳和罗伯特叔叔。虽然尔文是关键人物——如果我们有问题、麻烦或任何意外的财务需求，必须致电或与他会晤——但唐纳才是最终裁决、批准与签署所有支票的人。

尔文的桌上堆满文件，他坐在那叠文件後方，开始解释我们到底要签署什麽文件。在我们进一步谈话前，佛瑞兹打断他并说：「玛莉和我先前谈过，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妈妈会得到照顾。」

「当然。」尔文说。然後接下来两个小时，他有条不紊地逐页讲解，我还是不清楚爸爸遗产的确切金额。信托是复杂的财务管理（至少对十六岁的人来说），似乎还有沉重的税务负担。尔文解释完每一份文件的重要性後，他把文件从桌上推过来让我们签名。

他说完後，问我们有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佛瑞兹说。

我摇摇头，不懂刚才尔文说的内容。

第三部

烟雾与镜花

第九章

纾困的艺术

「玛丽．川普遭抢劫」，纽约小报在一九九一年万圣节过後隔天，用跟往常一样的一百级字体大肆宣扬。虽然我早已知道事情经过，但我去地铁站，行经书报摊时，看到标题还是觉得刺眼。

然而，祖母不只遭抢劫。奶奶在食品杂货店停车场，将购物袋卸放到她的劳斯莱斯时，那名孩子趁机抢走奶奶钱包，还把她的头推去撞车，力道之大使她脑出血，失去部分视力和听力。她跌倒在地时，骨盆多处碎裂、肋骨骨折，如果她没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受伤情势绝不会那麽危急。她被送到布斯纪念医院时，病况危殆，我们不确定她能否撑过去。

直到她从加护病房被送进私人病房，她的病情才明显好转，又过了几周，疼痛才减缓至得以忍受。她的胃口开始恢复後，她想吃什麽，我就带什麽来给她。有一天她喝着我途中买来的牛奶糖口味奶昔时，唐纳前来探病。

他向我们打招呼，并迅速亲了奶奶。「妈，你看起来不错。」

「她现在状况好多了。」我说。他在床边椅子坐下，把一脚放在床缘上。

「玛莉每天来看我。」奶奶笑着对我说。

他看向我。「有那麽多空闲时间肯定很棒。」

我望向奶奶，她翻了个白眼，我差点没笑出来。

「你好吗，甜心？」奶奶问唐纳。

「别问了。」他似乎很恼怒。

奶奶问了他的孩子，他跟伊凡娜有没有新消息。他没太多话可说；他显然觉得很无聊，大约十分钟後就离开了。奶奶望向门，确定他离去後，说道：「有人怪里怪气的。」

这回我笑出来。「平心而论，他现在很难熬。」我说。过去十二个月，他最爱的大西洋赌场泰姬玛哈（Taj Mahal）开幕刚满一年便宣布

破产；他的婚姻愁云惨雾，一部分归因於他与玛拉．梅普尔斯（Marla Mples）的婚外情；多家银行定量供款给他；而且他第二本书的平装版《在顶端生存》（Surviving at the Top）出版时，书名被印成《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 Survival）。虽然全是他咎由自取，但他表现得像被占便宜，从未低声下气或感到羞愧。

「可怜的唐纳。」奶奶嘲笑道。她看起来似乎头晕目眩，我想医护人员可能需要减少止痛药的剂量。「他老是这副德性。我不该这麼说，但他去念军事学院时，我如释重负。他不听任何人的话，尤其是我，他还折磨罗伯特。还有，噢，玛莉！他就像只懒虫。在校他拿到整洁奖牌，然後回到家，他仍然是一只懒虫！」

「你怎麼做？」

「我能怎麼做？他从不听我的话，你祖父也不在意。」她摇了摇头。「唐纳被纵容得无法无天。」

这话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祖父监督甚严。「这听起来不像他。」

同时间，祖父在曼哈顿特别外科医院（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进行髋关节置换术。我印象中他只进过医院一次，他在一九八九年将脖子近右耳处的肿瘤移除。我不知道他动髋关节手术的时机是否为巧合，还是在奶奶住院後才安排，这样奶奶康复後就不用照料他。祖父的心理状态每下愈况，他住院时肯定更加恶化。护士好几次在深夜发现，他只穿平口裤就想离开，他告诉护士，他想要找川普太太。奶奶似乎很开心没被找到。

唐纳认为，一九八○年凯悦酒店大获成功是在为川普大楼铺路，後者於一九八三年大张旗鼓地开幕。据报他对建盖大楼的非法劳工待遇恶劣，以及涉嫌参与黑手党，该建案因此充满争议。邦威特泰勒百货公司（Bonwit Teller）大楼正面美丽的石灰岩浮雕装饰艺术遭到拆毁，以建盖川普大楼，此事犯众怒的程度直达巅峰。唐纳原本承诺，那些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将转交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但他一知道移除浮雕装饰会增加成本，甚至拖慢工程，便下令将其拆毁。当他遭批背信没品时，他耸肩宣布，这些浮雕「没有艺术价值」，好像他的判断比得上专家的全面评估。过了一段时间，这种「他最懂」的态度变得更坚定：随着他的知识库不断缩减（尤其是治理方面），他更用力宣称他无所不知，与他自身的不安全感成正比，最後造就了当今局面。

唐纳能相对顺利取得和发展前两项案子，真正的主因在於，佛瑞德身为开发商与谈判大师的长才。若无佛瑞德的斡旋、影响力、授权、财力、知识，和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对唐纳的支持，这两项案子恐难成

功。

在此之前，唐纳完全仰赖佛瑞德的财力与影响力，不过他从未坦承，并且公开将成功归於自身的财富与脑袋。媒体乐得附和，不会过问，银行也如法炮制，这时唐纳开始迈向纽泽西州追寻赌场大亨梦，该州於一九七七年允许大西洋城的博彩业合法化，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海滨度假小城。如果祖父的意见对唐纳有任何影响力，他绝不会在大西洋城投资。在佛瑞德看来，曼哈顿值得这等风险，但在大西洋城他无法发挥其政治影响力或产业经验，只能提供资金与忠告。当时佛瑞德对唐纳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唐纳在一九八二年申请到博彩执照。

玛丽安在纽泽西州担任地方助理检察官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唐纳在寻觅投资机会时，她问唐纳要不要找罗伊．柯恩帮忙。柯恩在前雷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他可以取得一种实验性抗爱滋病药物齐多夫定（AZT），并左右司法人事任命。纽泽西州联邦地区法院轻松开出一个职缺，玛丽安认为这是个好缺，唐纳则觉得有名近亲在他打算大量投资的州境当法官，可能用处多多。柯恩给检察总长埃德．梅斯（Ed Meese）打了通电话，之後玛丽安九月获提名，十月便确定职位。

另一个迹象显示佛瑞德的影响力衰退，是唐纳在一九八五年用三亿美元盲目买下一栋饭店赌场，成为後来的川普城堡（Trump’s Castle），此前一年他买下哈拉饭店（Harrah’s），後来成为川普广场（Trump Plaza）。对唐纳而言，好东西多多益善；他认为，大西洋城有无限潜力，因此两间赌场胜过一间。当时，唐纳的投资已经负债数十亿美元（到了一九九○年，他的个人偿付债务款项已膨胀至九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即便如此，他在同一年以八百万美元买下海湖庄园（Mar-a-Lago）；一九八八年，耗资两千九百万美元买游艇；一九八九年，再花三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收购东方航空快线（Eastern Air Lines Shuttle）。一九九○年，他必须发放近七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含百分之十四的利息，才能凑得兴建第三间泰姬玛哈赌场的资金。这些买卖数字、收购案标价和大胆交易，似乎让每个人和银行忽视他迅速累积的债务，与令人存疑的商业眼光。

回顾当时，唐纳最爱的配色是红、黑、金，因此大西洋城的低俗浮华对他充满吸引力，魅力几近於那些呼之即来的金钱。毕竟庄家总是赢，明智作法是付得起买卖成本，才能好好做生意。大西洋城完全在佛瑞德的能力范围之外，唐纳也深受这点吸引。他得以撇开佛瑞德等人的大量金融投资，经营赌场是可以持续进行的业务，不像凯悦酒店和川普大楼，这类开发案最後将由其他实体单位管理。确切来说，这本是唐纳独立於父亲、获得成功的首次机会。

拥有自己的赌场让唐纳拥有一张过大的帆布，他可以依个人规格剪裁这个世界。如果一间赌场很好，两间会更好，三间则是好上加好。当

然，他这几间赌场会彼此竞争，最後获利遭同类相食。荒谬的是，他的欲求不满有其逻辑，毕竟这种逻辑在他父亲身上也奏效。不过唐纳不懂也拒绝学习，从商业模式与市场，到消费者群与计算方法，持有和经营赌场跟持有与经营布鲁克林的出租物业有天壤之别。因为他看不到闪亮亮的区别，所以轻信大西洋城赌场越多越好，就像祖父经营纽约外区的事业一样。如果一间赌场是金牛，三间赌场便是一群金牛。他将佛瑞德对公寓大厦的操作拿来套用在赌场上。

这种情况唯一无法解释的地方，就是前两间赌场的银行和投资人为何不够积极阻止第三间赌场的成立，让最後的状况大幅超出他们的底线。他能找到有兴趣的投资人，那就更没道理了；随便看一眼数字——哪怕只看贷款——就算是最草率的贷款人也该吓得逃之夭夭。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没人对唐纳说不，使得另一项错误计画获得批准，附带福利就是这个无法成功的人，其自大得以获得吹捧。

《在顶端生存》於当年八月出版，几周後逐渐发现，这本书的主题与时机糟到可当成讽刺恶搞文。

一九九○年六月，唐纳逾期未付川普城堡的款项达四千三百万美元。六个月後，祖父派他的长座车驾驶，载运逾三百万美元现金购买川普城堡的筹码。换句话说，他买了筹码，但没打算赌博；他的驾驶只把筹码放进公事包就离开赌场。就算这样还不够。隔天，祖父又额外电汇十五万美元到川普城堡，大概是要买更多筹码。虽然这些策略暂时奏效，却也害祖父违反博彩委员会禁止未授权资金来源借贷给赌场的规定，并面临三万美元的罚款。如果他想要继续借钱给唐纳维持赌场（他确实如此），他也必须取得纽泽西州的博彩证照，但一切为时已晚。唐纳可能控制大西洋城百分之三十的市占率，但泰姬使另外两间赌场无法获利（泰姬开幕那年，广场和城堡一共损失五千八百万美元），三间赌场年负债九千四百万美元，光是泰姬一天就要入帐逾一百万美元才能打平。

银行撒出去的钱如流水。泰姬开幕时，唐纳与其贷款人开会，想办法严加控管他的支出。更多违约与破产的阴影笼罩，他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来维护唐纳的形象，这样才能保住银行的钱。

他若无（往日）成功自信的表象，银行家担心，那些已深陷麻烦的赌场恐将进一步贬值。他的姓氏就是魅力：少了那个姓氏，就不会有新赌客、租户或愿意买债券的人，因此也不会有新营收。

除了借钱掩护唐纳企业的经营支出，银行在一九九○年五月与他达成协议，每个月给他四十五万美元的津贴；也就是说，他生意惨败，一年最多还可收到五百五十万美元。这笔钱只是个人开销：川普大楼三层公寓、私人喷射机、海湖庄园抵押贷款。为了兜售他的个人形象，唐纳必须继续维持令人信服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银行可以掌握唐纳的动向，他每周五必须与贷方见面，回报个人开销与他出售游艇等资产的进度。无从否认，一九九○年五月的情况相当严峻。唐纳经常向罗伯特抱怨，银行在「追杀」他，实情则是他受制於银行，而他从未如此受制於其父亲：他之前从未被控制过，更不用说要如此频繁地会面，这令他恼怒。他有法律义务要偿还银行，若未偿还将面对後果——至少应该会有後果。

虽然有这些限制，唐纳仍继续支出不属於他的现金，包括给玛拉的二十五万美元订婚戒，和支付伊凡娜一千万美元作为部分离婚协议的条款。我认为他从没想到，他不能不顾後果恣意花钱。银行告诫他违反协议，但他们从未采取任何行动，这只会让他更加相信，他可以一如既往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真的怪罪唐纳。在大西洋城，他如脱缰野马，无须经过他爸爸的授权或允许，他不用再说服父亲；同时银行供应数亿美元给他，媒体高度关注并无根据地赞赏他，更加助长并证实他对自己的夸大评价。银行与媒体使他无视眼前十万火急的情况。祖父对唐纳有种迷思，整体而言，现在世界也加强这种迷思。无论是谁宣扬该迷思，到头来它仍旧是迷思。唐纳基本上仍由佛瑞德一手培养，现在唐纳属於银行和媒体，他受其影响并仰赖他们，就像他昔日之於佛瑞德。他有一种表面魅力甚至是领导力，可以吸引到某些人。一旦他的魅力失效，他便施展另一种「商业策略」：大发雷霆并威胁宣告破产，或者毁掉任何让他不好过的人。不管哪种方式，他都是赢家。

唐纳能成功，因为他本身就是成功。但这个前提忽略一项重要的现况：他之前没达到也达不到他备受称赞的那些事蹟。就算这样，他的自负已然出柙，并受到家人和周围的人不断喂养。

纽约菁英永远不会真正接受他，只认为他是皇后区的小丑，但他们认可他狂妄与夸大的形象，邀请他参加派对，并同意他到菁英常聚集的地方，例如「俱乐部」。纽约人越想看大排场，媒体便越乐意报导，即便要牺牲更重要的实质内容。何苦要报导复杂又难懂的银行交易，让读者感到无趣呢？这些插曲与巧妙手法不仅帮上唐纳大忙，也给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些谄媚的媒体关注的是，他的离婚消息与高超床技传闻等腥羶色内容。如果媒体能否认真相，他也可以。

靠着部分奇蹟，我从寄宿学校毕业後，进入塔夫茨大学，虽然大一下学期休学，但最终在一九八九年毕业。一年後，在祖父小额买下三百一十五万美元的赌场筹码後，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英语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学程（graduate program）。

开学两个月後，我的公寓遭闯空门。我所有的电子用品都被偷走了，包括上课必要的打字机。我打电话给尔文，问他能否预先提领生活

津贴，但遭他拒绝；他告诉我，祖父认为我该找个工作。

下一次我回大宅探望祖母时，我向她解释情况，她打算写张支票给我。「没关系的，奶奶，我只要等几周就好。」

「玛莉，」她说：「永远别拒绝金钱的礼物。」她写了张支票给我，让我得以在当周买了一台打字机。

尔文很快便气急败坏打给我，「你跟你祖母要钱？」

「不算是，」我说：「我告诉她我被抢了，然後她帮了我。」

每个月底，祖父都会查看他个人、奶奶与企业帐户的所有兑现支票，当他发现奶奶写一张支票给我後大为光火。

「你得小心点，」尔文警告我：「你祖父常说要和你断绝关系。」

几周後我又接到尔文的电话，祖父又对我发脾气，这回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在支票上的签名。

「尔文，你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他讨厌字迹难辨的样子。」

「那是签名。」

他停顿一下，放软他的语气：「改掉，玛莉，你得照游戏规则来。你祖父认为你很自私，说不定你三十岁时什麼遗产都没有。」但我从来不懂尔文说的「游戏」是什麼意思，那是我的家族，不是官僚体制。

「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我在常春藤盟校念博士学位。」

「他不在乎。」

「唐纳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他是我的托管者，他怎麼说？」

「唐纳？」尔文不屑地大笑。「什麼也没说。」

祖父尚未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但当时他已出现失智症症状，因此我没把他的威胁看得太重。不过，我确实重改了签名。

我家族的每个人都体验过优越与遭无视的奇怪感受。虽然我有一切必要物资，还能享有私校和夏令营等奢侈生活，但心中总有一种不确定

这些事物能否留下的感觉。同理，有时会有一种压倒性的丧气想法，那就是没人真的重要；或者更糟，我们都无关紧要，除了唐纳。

唐纳常称川普管理公司是「差劲的业务」，但其实经营得不错。佛瑞德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年间，支付自己逾一亿九百万美元的薪水，银行里还有数千万美元。反而是唐纳挂名合夥的「川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每下愈况。

银行减少唐纳的每月津贴——一家四口足以舒适生活十年还有余裕——并将他拒於门外，最後拒绝借他更多钱，他全心相信无论他发生什麽事，都是经济不景气、银行待他不善与走霉运所致。

没一件事对他公平。佛瑞德也有所共鸣，他埋怨在心，除了成功，从不担起任何责任。唐纳推诿责任、怪罪他人，这项才赋完全传自其父。就算加上不知去向的数百万美元，佛瑞德还是无法避免唐纳失败，不过他绝对可以找到替死鬼，就像他因失误和失策陷入麻烦时，总会找人顶罪，又像是他将越野障碍赛马乐园案的失败怪罪於佛瑞迪一样。唐纳知道揽下失败责任显然就是承认失败，而这并非佛瑞德乐见的；唐纳见过佛瑞迪的前例。

回推到一九六○年代末期和一九七○年代初期，佛瑞德很可能不晓得唐纳可以多无能。要承认这名儿子的任何缺点近乎不可能，他不仅孤注一掷将他的事业帝国未来交付於唐纳，还为此牺牲佛瑞迪。这麽说服自己更简单：唐纳的才能已在布鲁克林这片死水浪费掉，他只是需要更大的池塘一跃而下。

康莫德酒店逐渐转型为凯悦酒店，唐纳操弄每一个环节并便宜行事以达到目的，但佛瑞德被成功蒙蔽，以致他似乎忘记自己的人脉、知识和能力有多关键；若无这些，凯悦和川普大楼都不会有这一天。唐纳为这两项建案创造关注度，佛瑞德肯定因此冲昏头；如果换成任何其他人来开发，佛瑞德会觉得这是曼哈顿非常普通的建案。

佛瑞德一直都知道唐纳在玩什麽把戏，因为他教唐纳这样玩。媒体操作、说谎、欺瞒，在佛瑞德看来，这些全是合法的商业手段。这对父子最拿手的就是骗人的打赌游戏。佛瑞德不断大量提出建案，巩固「战後建商大师」的地位，同时一边捞纳税人的肥水来中饱私囊，一边涉嫌从事大量税务诈欺，让他的四个孩子可以继续受惠数十年。一般俗人关注唐纳不断喂给小报的腥羶色细节，唐纳也持续靠呆帐、烂投资和更糟的判断，来建立事业有成的名声。不过两人的差别在於，佛瑞德虽然为人不诚实又不正直，但实际上他经营的却是有营利的稳固事业；唐纳只能原地打转，还要靠他爸爸的钱来撑起幻想。

唐纳进军大西洋城後，再也无从否认的是，他不仅不适合日复一日地管理外区数十栋中产阶级的出租物业，也不适合经营任何事业——就

算那栋物业表面上得以让他发挥自吹自擂的长才，并展现他金碧辉煌的爱好。

佛瑞德吹捧唐纳耀眼的长处，并宣称长江後浪推前浪时，他一定知道无一字是真话；他太聪明又太会算计，才会忽略数字根本没增加。明知如此，佛瑞德仍继续支持唐纳，这表示发生了其他事情；因为佛瑞德否认大西洋城失败的事实。他早就拒绝接受与他发言不符的事实，因此他狠狠怪罪银行、经济、赌场业，就跟他儿子一样。佛瑞德幻想唐纳会成功，并投资甚多，两人早已密不可分。面对真相必须承认他的责任，他永远不会这麼做。他下了所有筹码，任何有理智的人要弃牌时，佛瑞德却注定会加码。

还有很多宣传让佛瑞德冲昏头，而且多亏这对父子骂个不停的银行，异常财务动荡并未影响唐纳的生活开销。最後，佛瑞德尚未确诊的阿兹海默症开始蚕食他，影响其大脑的执行功能。佛瑞德本就容易相信他那最棒又最糟的儿子，一段时间後，他更常将唐纳天花乱坠的话跟现实搞混。

一如往常，唐纳学到的教训符合其先前预设：无论发生什麼事、无论他留下多大的烂摊子，他都会安然无恙。事先知道就算失败还是会有人来保你，将使那一刻来临前的对话毫无意义。接受失败是一大胜利，大言不惭也能达到成功。就算唐纳有能力改变，这道理也确保他将永远不变，因为他不需要。这也确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失败後果，最终将让所有人都必须承受附带损失。

破产压力和难堪情绪渐长，唐纳第一次面临极限，他无法靠空谈和威胁来逃避问题。唐纳总擅长找出口逃脱，此时他似乎心生一计，他打算背叛父亲，并从其他手足身上骗取大量金钱。唐纳悄悄去找祖父最资深的两名员工，一名是祖父的律师尔文．德班，另一名是会计杰克．米特尼克（Jack Mitnick），唐纳请他们根据祖父的旧遗嘱草拟遗嘱文件，这样祖父死後，唐纳便可以完全控制佛瑞德的财产，包括整个事业帝国与手上资产。这等於玛丽安、伊莉莎白和罗伯特必须靠唐纳的怜悯才能拿到钱，就连最小的交易也得获其允许。奶奶後来告诉玛丽安，尔文和杰克到大宅请佛瑞德签署遗嘱文件时，还假装这完全是佛瑞德的主意。祖父当天还算清醒，他察觉事情不对劲，却也无法确切地说出问题。他愤而拒签，在尔文和杰克离开後，佛瑞德向妻子表达其顾虑。奶奶立刻致电长女，并尽力解释情况，简言之，她说：「这一听就不对劲。」

玛丽安拥有检察官背景，但对信托与房地产知识有限；她请丈夫约翰．巴瑞找人帮忙，巴瑞是纽泽西州备受尊崇的知名律师，他拜托一名同事来了解情况，没多久便揭开唐纳的诡计。因此祖父重写整份遗嘱，以取代一九八四年的旧遗嘱，另外玛丽安、唐纳和罗伯特均被列为遗嘱执行人。除此之外，还加入一条新规定：佛瑞德给唐纳多少遗产，就必须给另外三名孩子相同的金额。

玛丽安几年後表示：「我们本来会身无分文，伊莉莎白本来会在街上角落乞讨。我们要喝杯咖啡还得恳求唐纳。」他们「纯粹走运」才得以阻止诡计；不过那些手足每逢佳节仍会相聚，好像没事一样。

唐纳企图从佛瑞德手中谋得财产很合理，因为佛瑞德让他的儿子相信，他才是唯一重要的人。唐纳胜於一切；佛瑞德投资唐纳，并将他拉拔到足以损害玛丽安、伊莉莎白和罗伯特（甚至是他的母亲），并且牺牲掉佛瑞迪。在唐纳心中，整个家族的成功与名声落在他的肩膀上；有监於此，难怪最後他会觉得，他该拿到的不是等份遗产，而是全部。

我站在工作室窗边，看着第五十九大街尖峰时刻的车水马龙，这时唐纳从他的飞机上打给我，这并不寻常。

「塔夫茨教务长寄来一封你写的信。」

「真的？为什麽？」

我花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在说什麽。我的一名教授先前争取终身教职，我毕业前曾写信表达支持，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我早就忘光了。

「这封信说明你觉得塔夫茨有多优秀，这封信在谈募款的事情。」

「我很抱歉，他真失礼。」

「不，这封信很出色。」

我开始抓不到对话的重点，接着唐纳天外飞来一笔。「你想帮我写下一本书吗？出版商希望我开工，我想这对你会是不错的机会。这会很有意思。」

「听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我说。确实如此。我听到飞机引擎快速旋转的背景声，才想起他人在何处。「对了，你要去哪？」

「从拉斯维加斯回家，明天打给罗娜。」罗娜．格拉夫（Rhona Graff）是他在川普集团的行政助理。

「我会的，谢谢，唐纳。」

後来我重读那封信，才了解为什麽唐纳觉得聘用我是个好主意——不是因为内容很「出色」，而是因为我很擅长让别人看起来优秀异常。

几天後，我在川普集团後办公室有了自己的书桌。吊顶天花板宽敞而平凡无奇，几根萤光灯，几个靠着墙的大型钢制文件柜，这里与Z大道川普管理公司的俐落办公室很像，有别於入口处金色与玻璃的墙面，宾客一进门便可见到一排以唐纳为封面的杂志。

我用第一周时间熟悉那边的员工和归档系统。让我讶异的是，那边有一份我名字的资料夹，内有一张纸——我国中时写给唐纳的亲笔信；我问他能否帮我买两张滚石乐团（Rolling Stones）演唱会的门票，而他不肯。多数时候我保持沉默，但只要我有问题，唐纳的副总裁厄尼．伊斯特（Ernie East）就会来帮我，他人挺好的。他建议一些可能有帮助的文件，偶尔还会把他觉得有用的资料夹放到我桌上。问题是我真的不晓得这本书应该要写什麼，只知道它的笼统主题，而且还明显来自暂定书名《东山再起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meback）。

我没读过唐纳的另外两本书，但我略知一二。就我所知，《交易的艺术》旨在展现唐纳是认真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本书的捉刀手东尼．史瓦兹（Tony Schwartz）笔底生花——这也是他懊悔许久的事——他将主角写得好像名副其实，彷佛唐纳真心信奉某种充分落实的企业观，而且通透理解并终生恪守。

《在顶端生存》的出版时间尴尬，我想唐纳打算回归前一本书相对严肃的感觉。我打算解释，他面临恶劣的情况时如何走出深渊，大获全胜并比先前更加成功。没什麼证据能支持这样的论述，他准备申请第四次破产，这次是广场饭店，但我必须尝试。

每天早上走到我的办公桌，我都去找唐纳，希望他有时间坐下来接受我的访谈。我认为这麼做最能了解他的成就与如何克服困境，他的观点才是一切重点，我必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故事。通常他在讲电话，我一坐下来，他就会开扩音。就我所知，这些电话几乎都无关生意。电话另一端的人不晓得被开了扩音，对方会问八卦，或者询问唐纳对某名女性或新开幕俱乐部有何看法。有时还会请他帮忙，不过对话多半是在谈高尔夫球。只要有人说了格外奉承、情色或愚蠢的话，唐纳就会假笑并指着话筒，好像在说「真是个白痴」。

他没在讲电话时，我发现他会翻阅每天为他收集的剪报。每一篇文章都在谈他，或至少提到他；他把剪报拿给我看，也对多数访客这麼做。依文章内容而定，他有时会用富莱尔牌蓝色毡头麦克笔在上头写字，就像祖父一样，然後再寄回给记者。他写完之後会拿起剪报，询问我对他自认为诙谐的批注有何看法。这无助於我的研究。

唐纳聘用我几周之後，我还是没收到支薪。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一开始他假装不懂我在说什麼，我指出我需要预付金，至少这样才能买电脑和打字机——我还在用读研究所时，奶奶赞助我买的那一台电动打字机。他说他认为这是出版商的问题。「你可以跟兰登书屋（Random House）说吗？」

我当时还不晓得，但唐纳的编辑不知道他雇用我。

有一晚我坐在家中思考，如何从我研究的无趣文件中，拼凑出一些隐约有趣的内容，这时唐纳打电话来。「你明天来办公室，罗娜会给你

一些文件，我在准备书的材料，这很不错。」他听起来很兴奋。

我终於有材料可以研究，还有一些想法可以组织这本书了。我还是不知道他如何看待「东山再起」、他如何经营事业，或甚至他在协商中的协议扮演什麼角色。

隔天如唐纳所言，罗娜给我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有十张用打字机缮打的页面。我拿到办公桌後开始阅读，我读完後，不知道该做何感想。这显然是唐纳录音档的文字纪录，内容在解释意识流品质。那是一篇抱怨摘要，他本来打算跟一名女性约会，对方拒绝他後，瞬间就变成他见过最糟、最丑又最胖的懒虫。最大收获就是唐纳认为玛丹娜（Madonna）嚼口香糖的方式不够诱人；德国奥运花式溜冰选手卡特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曾两度夺得金牌和四次世界冠军，而唐纳发现她有很大的小腿肚。

我不再要求他接受访问。

偶尔，唐纳会问起我的母亲。他四年没看过我妈了，自从伊凡娜和布莱茵在感恩节前给奶奶下了最後通牒之後：是要琳达来大宅过节，还是选择她们。她们觉得，已经算不上是妯娌的琳达太过沉默与低落，她在的话，她们就没办法玩得开心。我妈在川普家族待到一九六一年，虽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麼我爸妈离婚後，祖父仍要求她过节时要到场，而且她总会出席。逾二十五年後，祖母选择了伊凡娜和布莱茵，而未思考这个决定会如何影响我和我哥。

现在唐纳说：「我认为继续资助你妈是个大错，如果几年後我们切断她的金援会更好，她必须自力更生。」

任何不自食其力而且有权收受金钱和协助的人，令唐纳和祖父难以理解。妈妈身为富裕家族的长媳，几乎独自养育佛瑞德和玛丽．川普的孙儿孙女，她没收过祖父分文，更肯定没收过唐纳资助，但他们却装得好像有这麽一回事。

唐纳可能觉得他很慷慨，他之前会心血来潮，给我一百美元，让我领回被扣押的车。爸爸过世後，唐纳是家族中除了奶奶，唯一会将我考虑进任何事的人。不过一段时间後，他的体贴变得扭曲，由於不常表露善意，加上佛瑞德劝阻，他认为其他人基本上无法分辨好意。

我当时不晓得，不过对话进行的当下，唐纳仍每个月向银行领取四十五万美元的津贴。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唐纳对面，确认我们要去海湖庄园的细节（唐

纳认为，如果我亲眼见到棕榈滩庄园，有助於我写书），此时电话响起。对方是菲力普．强森（Philip Johnson）。

唐纳聊天时，似乎得到一个灵感。他把电话改成扩音。「菲力普！」他说：「你得和我的侄女谈谈，她要写我的下一本书，你可以跟她说泰姬的所有事情。」

我自我介绍，菲力普建议我下周到他在康乃狄克州的宅邸讨论这本书。

唐纳讲完电话後向我说：「太好了，菲力普是很棒的人。我聘他帮泰姬玛哈设计『共享门』（porta-co-share）。它很壮观——我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我和他讨论完佛州路线规画後，便离开办公室到图书馆。我不知道谁是菲力普．强森，也从没听过「共享门」。

隔天搭豪华轿车去机场时，我告诉唐纳，我打算去强森家拜访他；我从图书馆得知他是着名的建筑师，而他家是由他亲自设计的知名玻璃屋（Glass House）。我也发现，强森为泰姬设计的作品——唐纳称为「共享门」——其实是车辆通道（porte cochere），基本上就是一种大型车棚。我懂唐纳为何想找强森加入此计画；他不仅享有名声，还出入唐纳向往的社交圈。不过我不懂，强森为什麽想要为泰姬设计车棚，这是非常小规模的案件，似乎不值得他大费周章。

开车後不到十分钟，唐纳便拿出一份《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我知道他不打算跟我谈那本书。我开始猜测，他未洽询出版商便雇用我，是因为他不想被那边的人掌握大小事。敷衍他的侄女简单多了，没签合约，而且几乎未支薪。不过相较之下，专业作家很可能位居要角，让他的书叫好叫座。但我们接下来会困在飞机上两小时，所以我希望他到时会主动向我开口。

喷射机在停机坪等我们，待我们进入机舱，唐纳便张开双手问：「你觉得怎麽样？」

「好极了，唐纳。」我知道这一招。

我们一达到巡航高度便解开安全带，一名保镳在他旁边放了一瓶健怡可乐，并递给他一大叠信件。我看着他打开一个又一个信封，端看内文几秒钟，便将信纸连同信封扔到地上。地上堆了一叠後，同一个人再次出现，捡起废纸并丢进垃圾桶。然後同样情况一再上演。我移到另一张椅子，这样就看不到了。

我们停好车时，职员已在海湖庄园入口恭候。唐纳跟着管家离开，

我则向所有人介绍自己。这栋庄园有五十八间房间、三十三间镀金装饰的卫浴，一千八百平方英尺的会客厅与四十二英尺的天花板，如我预期华丽惹眼，令人感到不自在。

傍晚用餐时只有我、唐纳和玛拉。她和我之前见过几次面，但我们未有机会单独认识彼此。我发现她很亲切，有她在，唐纳似乎很放松。她只比我大两岁，跟伊凡娜大大不同。玛拉很务实、说话轻柔，伊凡娜爱炫耀、傲慢又刁钻。

隔天一早我参观庄园，这里没有其他宾客，空荡荡又安静得诡异。我和管家聊天，想知道有无趣事，并认识这边的一些员工，之後在下午一点用午餐前快速游泳。虽然海湖庄园的气氛某些时候很正式，但仍比我们家族固定聚餐的地点悠闲多了，因此穿泳装和短裤在庭院用餐让我很自在。

唐纳身穿高尔夫球装，我接近时，他好像没见过我一样盯着我看。「我的天，玛莉，你超有料的。」

「唐纳！」玛拉假装震惊地说，一边轻拍他的手臂。

我当时二十九岁，照理说不容易感到尴尬，但我的脸胀红并突然觉得不自在，并拿毛巾披盖肩膀。这才想起，家族内除了我爸妈和哥哥，没人看过我穿泳装。可惜了那本书，这是我整趟棕榈滩之行中唯一有趣的事。

回到纽约後，唐纳终於厌倦我一直要求访谈他，他给了我一串名字。「跟这些人谈。」其中包括他的赌场总裁和玛丽安的丈夫约翰。虽然这可能有帮助，但他似乎不懂如果没有他的任何分享，写书近乎天方夜谭。

我拜访所有赌场总裁，不出所料，他们的答案多半千篇一律，我明白他们不会说出老板生意最紊乱与失序时的肮脏事。这些访问也不全是浪费时间；我从没去过那些地方，至少我对那些地方有些概念了。

我拜访约翰．巴瑞时，甚至比出访大西洋城的收获更少。

「你能跟我分享什麼？」我问他。

他翻了白眼。

最後唐纳告诉我，他的编辑想见我。午餐已约好，我抵达餐厅时心想，他跟我准备要讨论下一步了。身处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区，我们坐在靠近厨房的拥挤小桌。

初步交谈後，编辑告诉我，兰登书屋希望唐纳聘用更有经验的写手。

「我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我说：「我觉得已有些进展。问题在於，我没办法请唐纳坐下来受访。」

「你不能期望第一次坐在钢琴前，就演奏莫札特协奏曲。」编辑说，好像我昨天才刚学会字母。

「唐纳告诉我，他满意我目前的成果。」

编辑看着我，好像我刚证实了他的论点。「唐纳没读过那些内容。」他说。

隔天我去办公室清空桌子，并把也许能帮上忙的所有资料交给最终人选。我不生气，甚至不介意唐纳找人开除我。这项计画卡关了，而且我在办公室的这段时间，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

第十章

日暮并非转瞬而至

我们坐在海湖庄园的一张桌子前，我几年前与唐纳及玛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午餐。家族向来会在复活节齐聚海湖庄园。我的祖父转头问他的妻子，指着我，微笑问道：「这位有教养的淑女是谁？」

他转向我说：「你是淑女吧？」

「谢谢爷爷。」我说。

奶奶看起来很沮丧；我告诉她，别担心。我已目睹祖父忘记熟稔数十年的人，包括他最小的孙子和他的司机。他给我起的绰号就此定型，直到他临终前，都唤我「淑女」，温柔和蔼地呼唤着。而他忘了我是谁之後，对我非常亲切。

「来吧，爸爸。」罗伯特迈出步伐，但我祖父没跟上。他观望四周欢庆的人们，这些人出於对我祖父母的尊敬而齐聚一堂；他的眼神闪烁着恐慌，似乎突然不认识在场的任何人，或是他在这里做什麽。在那之前，我只看过祖父轻蔑、焦躁、愤怒、愉快和自满的表情；恐惧算是新的表情，令人担忧。我记得祖父之前唯一会显露焦躁，是唐纳带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高尔夫是唐纳花许多时间享受的兴趣，佛瑞德虽然厌恶娱乐，却也没发过牢骚。他们从球场回来时，我就在大宅里，差点认不得他。他们都穿着高尔夫球服装——祖父穿着一条浅蓝色裤子、白羊毛衫，脚踩一双相称的白鞋。这是我头一遭看到祖父穿着西装以外的服饰，我从没看过他如此别扭和不自在。

很快地，他从习惯性地放错物品、偶尔忘记词汇或句子，到淡忘家人的脸庞。你可以经由祖父记得你的时间长短，衡量你（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我不知道，祖父是否还记得我父亲，因为我爸死後，我从未再听过祖父提起他。

玛丽安希望我当时担任心理学家的表哥大卫，陪伴祖父做每一项例行检查和神经科检验，盼能巩固大卫在祖父脑海中的记忆；然而，过不了多久，祖父便直接称呼大卫为「医师」。

我和玛丽安及祖父站在海湖庄园的池塘畔，他指着我，告诉他女

儿：「那位淑女不是挺有教养的吗？」从他最初给我取这个绰号算来，已经过了一年多。

玛丽安不耐烦地微笑说道：「是的，爸。」

他仔细端详她，彷佛经过深思熟虑後，狐疑地问道：「你是谁？」

她泪眼汪汪，好像被人甩了巴掌，温柔地说：「爸，我是玛丽安。」

「噢，玛丽安。」他微笑着说，但这个名字对他而言，已不具任何意义。

他从未忘记唐纳。

罗伯特卸下川普城堡（声名狼藉的三百一十五万美元紧急援助筹码）的赌场主席职务後便失宠了，但他在我祖父一九九一年住院时，接替坐镇川普管理公司要务，往後不曾离开。这对罗伯特而言很棒，光凭他是佛瑞德在世的儿子之一，他每年可获得五十万美元，做一些只需要一点技巧或努力的工作。那是为佛瑞迪与唐纳打理好的职位，但两人分别用各自的方式拒绝了。

佛瑞德仍然每天进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方，直到下班回家时间，但罗伯特实际上负责这个自主运行状况良好的组织运作，而他经常指其为「摇钱树」。

我的祖父那天过得很糟，当他下楼时，我们大多数人聚在图书室，他的胡髭和眉毛刚染过，假发歪斜但完美地搭配他的三件式西装。

祖父的发色和假发是最近的创新，他向来注重外表，且对日益後退的发线兴叹。如今，他的整头假发赋予他稍微蓬乱的外貌。没有人评论这顶假发，但染过的发色让家人错愕，尤其在大家要公开露面之际。我的祖父往往让廉价的药局染发剂停留在发丝上过久，让他的眉毛和胡髭变成刺眼的紫红色。当他走进图书室加入我们时，显然对自己所为感到骄傲。奶奶惊呼：「噢，天杀的，佛瑞德。」

「老天，爸！」唐纳对他大喊。

「靠！」罗伯特低声咒骂。

玛丽安拍拍他的手臂，说：「爸，你不能再这麽做了。」

当我走进图书室时，他站在他最爱的椅子旁边。

「哈罗。」他说。

「嗨，爷爷。你好吗？」

他看着我，伸手去掏皮夹，这个皮夹里放着一叠厚到我总是讶异如何塞进他口袋里的钞票。他的皮夹里，有一张皮夹大小的半裸女人照片，我一度担心他又打算秀给我看，就像他在我十二岁时做过的那样。

「看，」他当时一边说一边把照片拉出夹层。照片中浓妆艳抹的女人，不可能超过十八岁，或许还更年轻；她无辜地对着镜头微笑，两手捧着袒露的酥胸。唐纳一直从祖父的肩膀後方观望，而我不知道该说什麽，只好看着他，希望他能给我提示，告诉我应该如何回应，但他只是斜眼看着那张照片。

我的祖父窃笑道：「你觉得这张照片如何？」我从没听过他笑，我不认为他会笑，他总是以「哈！」来表达愉悦，接着讥嘲。

如今，我的祖父没有拿出照片，而是拿出一张百元美钞，问道：「我可以买你的头发吗？」

我长大之後，每次我见到他时，他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抱歉，爷爷，我需要留着它。」

伊莉莎白一手拿着一个小盒子走了过来，她将另一只手环绕我祖父的手肘并靠向他；他茫然地看向前方，解开她的手臂，离开房间。

不久後，唐纳和他的孩子，以及罗伯特的继子走了进来。除了艾瑞克（Eric）之外，他们全都是青少年，这些又高又胖的男孩们都穿着西装。唐纳迳自坐上电视旁的椅子，伊凡卡爬上他的大腿。男孩们开始摔角，唐纳在椅子上看着男孩的举动，时而亲吻伊凡卡，或捏她的脸颊。每隔一段时间，唐纳会伸出一只脚，踢向被压在地板上的男孩。男孩们更小的时候，唐纳会和他们一起摔角，那种打斗基本上包含了——他抱起他们、把他们摔在地上、以膝盖压制直到他们认输等激烈动作。当男孩成长到足以认真回击时，唐纳就不再跟他们玩了。

伊莉莎白和我尽量远离危险擂台，她将盒子递给我，并说：「这是你的。」

我们不会在耶诞节以外的日子交换礼物，但我从她手中接过盒子，打开後发现是一只复古的不锈钢天美时表。这只手表有着小巧简朴的表面，以及橄榄绿表带。

「有人送你当耶诞礼物，」她说：「你当时才十岁，我认为你还太小，不配拥有如此精美的礼物，所以我先用了。」语毕，她离开房间，寻找她的父亲。

稍晚，唐纳与罗伯特在早餐室依偎在一块儿，他们肩并着肩、低着头。我祖父站在附近，身体前弯到几乎碰到脚趾尖，试图听他们在说什麼。

佛瑞德说：「唐纳，唐纳。」他没有回应时，我的祖父便会扯唐纳的袖子。

「干嘛，爸？」他头也不回地说。

「看这个，」佛瑞德说；他拿起一张撕下来的杂志内页，那是一张礼车广告，而广告中的礼车和他已经拥有的礼车很类似。

「怎麼了吗？」

「我可以得到它吗？」

唐纳把这张纸交给罗伯特，罗伯特折成一半，并悄悄地迅速放置到桌上。

「没问题，爸爸。」罗伯特说。唐纳离开房间。无论他们的关系曾如何密切，佛瑞德在世的儿子们，已全盘放弃假装关心父亲的想法或他想要的事物。达到父亲的目的之後，唐纳如今轻蔑地看待他，宛如他的心智衰退是他自己的错。佛瑞德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大儿子和他的酗酒问题，所以唐纳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目睹祖父被公然藐视纵然令人不悦，但就我当时所知，唐纳不仅是祖父的爱子，甚至是他唯一喜欢的孩子。我知道，我祖父可能很残酷，但我以为，那般恶毒仅止於对我爸；说来惭愧，我认为祖父或许活该。我不知道多年以前，在奶奶病重之际，只身住在大宅里有多麼孤单和可怕。我不晓得，我的祖父在奶奶缺席的这几年，没有照顾他的任何一个孩子，或是唐纳对於那种忽略特别受伤。佛瑞德并未全力支持和抚养我的父亲，因为他真挚地盼望自己可以成功地闯荡世界。而对於唐纳，佛瑞德只是纵容他，直到他长大到能被拿来利用的年纪。

一九九四年，我从上东城（Upper East Side）的公寓迁居花园市（Garden City），那是长岛的一个小镇，距离大宅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我会开着祖父几年前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一辆红色的劳斯莱斯，带奶奶去看她的曾孙和我哥的儿女。握着硕大、松弛的核桃木方向盘，我感觉高高在上，简直可以看见地球的曲率。有时候，奶奶和我会在四十五分钟的车程中轻松聊天，但她更多时候是郁郁寡欢或沉默寡言。在这种日子，车程似乎永无止境。即便她许久不再烘焙，她身上有时仍散发着强烈的香草味。其他时候，我的眼角余光会看到，她偷偷地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东西放进嘴里。

我们常坐在图书室谈天，玛丽安每天打电话报平安时，我通常会在

那儿。奶奶接起电话後，盖住话筒，告诉我：「是玛丽安。」她接着告诉她女儿说：「猜猜谁在这儿？是玛莉。」她稍作停顿，我想是要给玛丽安机会，说些「替我跟她打声招呼」之类的话，但她从来没有这麽做。

有时候，我们会在当地餐厅用餐，奶奶的午餐爱店之一是「狡猾狐狸小旅馆」（Sly Fox Inn），那是一间低调的酒吧，坐落在她曾遭遇抢劫的杂货店停车场对街。我们从不多谈关於父亲的事，但有一天她似乎特别感性。她忆起他和比利．德雷克经常卷入的麻烦事，以及父亲总是能轻易逗她开心。她在服务生来收拾我们的餐盘後，变得安静。男服务生问我们是否要结帐时，奶奶没有回答，我於是点点头。

「玛莉，他病得很重。」

「奶奶，我知道。」我说，假设她是指他酗酒的恶习。

「我不知道该怎麽办。」

我以为她要哭了，尽管多说无益，但依旧说出：「奶奶，没关系。」

「最後那几周，」她深呼吸後说：「他无法下床。」

我开始问：「那天我过去……」

服务生把帐单拿了过来。

「他没去看医生吗？」我问道：「我是说，如果真的病入膏肓。」

「当他听说你们去看过他後，他感觉相当糟。」

我等着她继续说什麽，但奶奶打开钱包。她总是为午餐买单，我默默载她回家。

一九八七年，我在无依无靠的德国度过大三那年。我以为这样可以取悦我的祖父，毕竟那是他双亲出生的国度（结果并没有）。我规划回家过耶诞节，所以我打电话给祖父母，问他们能否借住几宿。

我拿着一把五马克硬币，站在宿舍走廊的付费电话前，打电话回大宅。「嗨，爷爷，是玛莉啦。」我在他接听後说。

「嗯哼。」他答道。

我解释为何打电话过去。

「为什麽不去住你妈那边？」他问。

「我对猫过敏，我怕可能犯气喘。」

「那麽告诉她，把猫给丢了。」

现在能被当作「淑女」，轻松多了。

我亲眼见证了，和祖父住在一起，对奶奶而言有多难受。我祖父的奇怪行径从小事开始，例如把她的支票簿藏起来。当她质问他的时候，他指控她企图害他破产。当她试着与他讲理，他会生气，让她感到惴惴不安。他经常为钱苦恼，害怕他的财富消失。我祖父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穷过一天，但贫穷成为他唯一忧虑的事，且饱受此事折磨。

祖父的情绪最终平复，但对奶奶而言，问题反覆出现。他傍晚从办公室回家後，会先上楼换衣服，他经常穿着乾净的衬衫，打好领带，却没穿裤子，只穿着四角裤、袜子和礼服鞋下楼。他会说：「大家过得好吗？还行？好，晚安，宝贝们。」接着又上楼，几分钟後再下楼。

有天傍晚，我和奶奶坐在图书室，祖父进来并问道：「嘿，宝贝们，晚餐吃什麽？」

她回答後，他转身离去。几分钟後，他又回来问：「晚餐吃啥？」她再次回答，他离开又回来问了十次、十二次、十五次。随着耐心磨耗，她每次都只告诉他：「烤牛肉和马铃薯。」

终於，她对他破口大骂：「天杀的，佛瑞德，别闹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好，好，宝贝们。」他尴尬地笑着，举起双手对着她，踮起脚尖跳开。他说：「好，那就这样。」他将拇指伸进衣服吊带，好像他刚结束一段对话。这个姿势向来不变，但他炯炯的眼神已经变得和蔼却迟钝。

没想到他离开房间几分钟後，又绕回来问：「晚餐吃什麽？」

奶奶把我拉到阳台——那是个不受欢迎的水泥方形区域，就在大宅的一侧，距离图书室不远；数十年前，一家人会在那里烤肉。但这块区域长期被忽视，我经常忘了它的存在。

「我发誓，玛莉，」她告诉我：「他会把我逼疯。」那些椅子被遗弃在外，覆满残枝和枯叶，我们只能站着。

「你需要寻求协助，」我说：「你必须找人聊聊。」

她说：「我不能离开他。」差点哭出来。

「我本来想再回家一次。」她曾忧愁地告诉我。我不明白，她为何不能回苏格兰，但她坚决不做任何可能看起来自私的事情。

每到周末，如果他们不在海湖庄园，我的祖父母会开车到其他孩子的乡村度假屋：罗伯特的在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伊莉莎白的在纽约州南安普敦（Southampton）、玛丽安的在纽泽西州斯巴达（Sparta）。他们会计画过夜，而奶奶会期待与其他人共度安静且放松的周末。只要他们抵达目的地，我祖父就会询问那一家人他能否回家了。他会不厌其烦地尝试，直到奶奶放弃，两人才会回到车上。休息一个周末（或一天）的点子，其实算是奶奶的福利，让她能离开大宅且有伴。孰料，这些探访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折磨。就像家族里发生过许多不合理的事，但他们依旧这麽做。

奶奶再次住院。我不记得她弄断了什麽，但她出院後必须在前往复健机构或请物理治疗师到府服务之间作选择。她选择入住复健机构，并告诉我：「可以不用回大宅都好。」

这样也好，她遭遇抢劫後，必须在图书室的医疗床上休养数周。我的祖父髋关节手术後恢复得非常好，并不需要什麽同情与安慰。

他会说：「一切多麽美好，对吧？宝贝们。」

一九九八年，我们第一次在唐纳的川普大楼庆祝父亲节。那时候，我的祖父已很难公开露面，前往布鲁克林彼德鲁格牛排馆的传统遂无以为继；每年去两趟牛排馆曾是家族传统，分别是庆祝父亲节和我祖父的生日。

彼德鲁格是态度傲慢且非常昂贵的餐厅，服务差劲还要多收费，且只收现金、支票或（我祖父拥有的）彼德鲁格储值卡。菜单上的餐点有限，且无论是否点购，都会送上多盘切片番茄和白洋葱，搭配用小陶碟装的炸薯饼，以及通常不会有人去碰的奶油菠菜。牛肉放在托盘的一侧被端了出来，并放上以不同色调标示的塑胶牛，从（还在哞哞叫的）红色，到（几乎能爬过桌子的）粉红色，以及（是否还有其他颜色）——其实我也不清楚，我们的小牛全都是红色和粉红色。我们大部分人点六盎司的瓶装可乐，因为餐厅出奇差劲的服务，晚餐结束後，桌上总会布满几根牛骨、数十瓶可乐罐，以及装满食物却没被碰过的餐盘。

这一餐总要等我祖父吸光大骨中的骨髓才算结束，但他留有胡髭，那画面实在令人难以直视。

我大学後不再吃肉，在彼德鲁格用餐俨然成为挑战。我曾经犯了一次错误点了鲑鱼，这道菜肴占据了半张桌子，味道就和你能预期牛排馆的鲑鱼一样。後来，可乐、小马铃薯和结球萵苣沙拉成为我在那里固定不变的餐点内容。

我不会想念粗鲁的服务生，但我希望在唐纳家至少有一些我能吃的东西。

我犯下只身提早到达豪华公寓的错误。尽管唐纳和玛拉仍保有婚姻关系，但她已成追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新女友梅兰妮亚，我和这位二十八岁的斯洛维尼亚模特儿素未谋面。他们坐在大厅里一张看起来不太舒服的沙发上，周遭都是大理石雕刻、金叶、白墙与镶着镜子的墙，还有壁画。我不确定他怎麼受得了，但唐纳的公寓感觉比大宅更冷，更不像一个家。

梅兰妮亚小我五岁，她稍微斜坐在唐纳旁边，双脚脚踝交叠，我被她出奇平静的表情震慑。罗伯特与妻子布莱茵和梅兰妮亚第一次见面後，罗伯特告诉我，梅兰妮亚在整场餐会中几乎很少讲话。

「或许她的英文不是很好。」我说。

「不，」他嘲笑地说：「她知道她在那里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绝妙谈吐。

我一坐下，唐纳就开始告诉梅兰妮亚，关於他雇用我撰写《东山再起的艺术》，接着说他的版本、关於我「历劫归来」的救赎故事。他以为，那是我们的共通点：我们都曾跌入谷底，（他）设法重回顶峰，或（像我）刚回到高点。

「你大学辍学，对吧？」

「是的，唐纳，我是。」我就这样被介绍给初次见面的某人。而且我很讶异，他竟然知道这件事。

「那阵子真的很糟……然後她开始嗑药。」

「哇噢！」我说着，边举起双手。

「真的吗？」梅兰妮亚突然来劲儿。

「不、不、不，我这一生从来没碰过毒品。」

他转头看着我微笑，他明白，我知道他为了塑造印象而夸饰故事。他笑得更开怀地说：「她糟透了。」

唐纳锺爱东山再起的故事，且他深谙从越深的洞窟爬出，成功回归的价码越好的道理，这就是他的亲身经历。藉由挖苦我大学辍学，和他雇我写他的书（再加点虚构的药瘾），他捏造了一段很棒的故事，阐述他曾扮演我的救世主。然而事实是，在我辍学到帮他写书期间，我复学、毕业且取得硕士学历——完全没有和药物或毒品沾上边。但陈述真相没有意义，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那个故事是为了他和其他人的利

益。此时，门铃响起，他可能已经相信他事件版本的结果了。当我们三人起身欢迎宾客时，我才发觉，梅兰妮亚在我们交谈的时间里，只说了一个词。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佛瑞兹打电话通知我，我们的祖父被送往长岛的犹太医疗中心（Jewish Medical Center），这是祖父母近年赞助的另一家皇后区医院。他说得好像祖父病危一般。

我从我家开车十分钟抵达，发现病房内已经挤满了人。奶奶坐在床边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伊莉莎白站在她身旁，抓着祖父的手。

打过招呼後，我站在窗边、罗伯特妻子布莱茵的身旁。她说：「我们本来应该已在伦敦会见查尔斯王子。」我惊觉她是在对我说话——这是她很少做的事。

「喔。」我说。

「他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其中一场马球赛，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然必须取消。」她无意压低音量，生气地说。

我被耽误的事情大可以赢过她的故事，我当时原定一周内要在夏威夷茂宜岛（Maui）的沙滩上成婚。我的家族无人知晓，他们向来对我的私生活特别不感兴趣（若有必要，我会请男性友人陪同，出席必须携伴的任何家族聚会），也没人问过我关於男友或情侣关系的事。

几年前，奶奶和我谈到黛安娜王妃的葬礼。她悻悻然说道：「真是丢脸，他们让搞同性恋的小兔崽子艾尔顿．强（Elton John）在宗教仪式上开唱。」我从那时起便明白，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与另一名女子同居且订了婚。

眼见我的祖父病况严重，我有股糟糕的感觉；当我回家後，势必得告诉未婚妻，经过数个月计画且克服许多筹备的梦魇，我们那场几乎是秘密的婚礼必须延期。

我注意到房里一阵沉寂，彷佛每个人同时无话可说。我们静静听着祖父断断续续的鼻息：刺耳、含糊地吸入，接着不自然地中止许久，直到他终於呼气，才看似安全。

第十一章

唯一货币

佛瑞德．川普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逝世。翌日，《纽约时报》以「佛瑞德．C．川普，为中产阶级盖房的战後建筑大师，享耆寿九十三岁」为标题，刊登了讣告。讣告作者将佛瑞德塑造为「白手起家的男人」，其形象与「他爱炫耀的儿子唐纳」迥异。我祖父习惯在他的建筑工地，捡起没用到的钉子还给木工一事，隔天也在回顾他生平轶事中的报导被提及。《纽约时报》重新报导了我们家族的故事，唐纳靠着祖父的极微帮助——即「一小笔钱」——打造自己的事业。不过，《纽约时报》会在二十年後推翻此说。

我们坐在图书室，各自拿着一份《纽约时报》。罗伯特遭到他的哥哥姐姐轮番训斥，指他不应该告诉《纽约时报》，我祖父的资产价值介於两亿五千万美元到三亿美元之间。玛丽安像教训愚蠢小孩般地告诫他：「绝对、绝对不要给他们数字。」他羞愧地站在原地，拗着指关节，并以脚掌为支点前後摆动，就像我祖父突然想到陆续要缴的税款时会出现的动作。其实该估价荒诞地低——我们最终将知晓，整个事业帝国可能价值该数额的四倍——但玛丽安和唐纳绝对不会承认有这麽多。

我们之後站在坎贝尔殡仪馆（Frank E. Campbell Funeral Chapel）的麦迪逊室（Madison Room），微笑地与看似无止境的来宾行列握手；坎贝尔殡仪馆坐落在曼哈顿上东城，为曼哈顿最高级且价格不菲的丧葬礼仪公司。

从头到尾，超过八百人穿梭在多个房间，有人来表达敬意，包括山姆．莱夫拉克（Sam LeFrak）等房地产对手开发商、纽约州长乔治．柏德基（George Pataki）、参议员艾尔．达马托（Al D’Amato），以及後来参加实境节目《谁是接班人》比赛的喜剧演员琼．莱佛斯（Joan Rivers），其他大多数人可能是来一睹唐纳的丰采。

葬礼当天，大理石学院教堂座无虚席。整场仪式，从头到尾，每个人都有自己扮演的角色，极度刻意地精心安排；伊莉莎白朗诵我祖父「最喜爱的诗」，其他手足致悼词；我哥代表我们的父亲致哀，而我表哥大卫代表祖父的孙子们致意。他们大都讲述祖父的故事，而我哥是唯一让祖父显得仁慈的讲者。悼词中有一大部分，以拐弯抹角和直接陈述并行的方式，强调祖父的物质成就、他「如杀手般」的直觉，以及储蓄的本领。唐纳是唯一脱稿演出的人，在阿谀奉承的转折之後，他的悼词

变成赞颂他自己的伟大。这种情况尴尬到让玛丽安事後交代她的儿子，将来不准她的任何一位手足在她的丧礼上致词。

当时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也有登台致词。

仪式告终，六名年纪较长的孙子（蒂芬妮．川普〔Tiffany Trump〕当时还太小）作为荣誉抬棺者，陪同灵柩前往灵车；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们家，其他人干活，而我们获得功劳。

从第五大道到第四十五街，远至超过十六个街区以外的「中城隧道」（Midtown Tunnel）全面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好让由警察护卫的送葬车队得以顺利出城，迅速抵达位於皇后区中村的「全信仰公墓」，安葬我的祖父。

我们同样快速地开回城市，这次比较低调，并在唐纳的大楼共进午餐。之後，我陪祖母返回大宅。我俩坐在图书室，交谈了一会儿。她看似疲累却如释重负。那是度日如年的日子，事实上是很长的几年。除了住在楼上的女佣之外，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我本来应该在度蜜月，但我选择留下，直到她准备就寝。

当她说她准备就寝时，我问她是否需要留下来陪她，或有什麼事是我离开前能帮她处理的。

「没有，亲爱的，我很好。」

我俯身亲吻她的脸颊，她闻起来还是有香草味。我告诉她：「你是我最喜欢的人。」这不是真的，但我因为曾爱过她而如此说。我这麼说，也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在她结缡六十三年的夫婿入土为安後，留下来陪她。

「很好，」她答道：「我当之无愧。」

在那之後，我将她留在寂静、空荡的大宅里。

祖父的葬礼结束两周後，我在家收到DHL货车送来的一个黄色信封袋，里头装着一份我祖父的遗嘱影本。我仔细读了两次，确认没有误解任何事情。我曾向我哥承诺，我得到消息後，便会立刻通知他，但我不情愿这麼做。佛瑞兹和丽莎的第三个孩子威廉，在祖父葬礼後几个小时出世。他出生二十四小时後，小儿痉挛癫痫发作；在那之後，他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他们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小孩，佛瑞兹仍必须工作。我对於他们如何应付所有事情毫无头绪。

我讨厌作为捎来更多坏消息的人，但他需要知道。

我打电话给他。

「遗嘱内容是什麽？」他问。

「什麽也没有，」我告诉他：「我们什麽都没分到。」

几天後，我接到罗伯特的电话；我记得，他之前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我，就是让我知道奶奶住院了。他假装一切都很好，却暗示着，如果我在遗嘱上签名，一切会更棒。他的确需要我签字，才能执行遗嘱认证程序。我的祖父没有分财产给我和我哥是事实，他不仅没有将属於我爸的百分之二十资产分给我和我哥，甚至将遗产平均分给他的另外四个孩子；我们被算在分给祖父所有孙子的遗赠里头，那些零头小数连我姑姑或叔叔所继承资产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就总资产而言，那是非常少的钱，但遗嘱赋予我和佛瑞兹阻止资产分配的权力，肯定让罗伯特很不爽。

几天过去，我没办法说服自己签名。就残酷程度而言，这份遗嘱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亚於我父母的离婚协议。

有一阵子，罗伯特天天打电话给我。玛丽安和唐纳派他来当协调员，唐纳不想打扰玛丽安罹患食道癌的丈夫约翰，且其预後状况并不佳。

「兑现你的筹码，亲爱的。」罗伯特反覆地说，好似这样会让我忘记遗嘱的内容。然而，无论他说多少次，我哥和我已经达成协议，不会在想出对策前，签署任何文件。

罗伯特最终失去耐性，佛瑞兹和我挡下所有事情，使得遗嘱无法在所有受益人都同意的情况下被认证。当我告诉罗伯特，佛瑞兹和我还不愿意采取行动时，他建议我们一起讨论。

在我们的第一场会议中，我们请罗伯特解释我祖父为何这麽做，罗伯特说道：「听好了，你们的祖父根本不管你们；不只是你们，他根本不在乎他的任何一个孙子。」

「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更糟，因为我们的父亲死了。」我说。

「不，一点也不。」

当我们指出，我们的堂兄弟姐妹还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受惠於祖父的遗产时，罗伯特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断绝关系。唐尼要从军或做类似的烂工作，唐纳和伊凡娜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会立刻和他断绝亲子关系。」

「我们的父亲没有这种奢求。」我说。

罗伯特向後坐。我看得出他试图思考。「这很简单，」他说：「就算你们的祖父在乎，死了就是死了，他只在乎他在世的孩子。」

我想辩称，我的祖父也不在乎罗伯特，但佛瑞兹插话说：「罗伯特，这不公平。」

我记不得，我们三人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到十月期间共会面了几次。只有当年九月短暂中断，那时我去夏威夷补办延迟的婚礼和度蜜月。

在磋商最开始之初，佛瑞兹、罗伯特和我说好，不让奶奶受到牵连。我猜，她并不知道我们如何遭祖父的遗嘱对待，也没有理由让她不开心。企盼我们能够解决每一件事，她永远不用知道曾有过那些问题。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还是每天和她讲电话；当我回到纽约时，我就会再去探望她。那些磋商也会恢复——如果那还称得上是「磋商」的话。我们的对话无聊且千篇一律，无论佛瑞兹和我说什麽，罗伯特都会回归陈腔滥调和罐头式回应；我们依旧僵持不下。

在过程中，我提到了祖父数十年前创办、用以嘉惠孩子并规避赠与税和遗产税的米德兰公司。米德兰公司拥有七栋大楼（包括多栋桑尼赛德大楼和海兰德），这几栋大楼在我家族里被称之为「迷你帝国」。我对此所知甚少——没有一位我的信托专员曾向我解释过，这些资产扮演的角色或如何赚钱——但我每隔几个月就会收到支票。我们想知道，我祖父过世後，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夥伴关系。

我们并不是要索求特定金额的钱财或资产比例，只是想确保这些我们拥有的资产，未来依旧稳定无虞；考量家族的庞大财富，他们能否以他们的方式，认清如何处置我祖父的资产。作为遗嘱执行人，除了伊莉莎白是单一受益人之外，玛丽安、唐纳和罗伯特对那方面有很宽广的转圜余地，但罗伯特仍不置可否。

我们最後一次会面约在第五十六街和公园大道的「德瑞克酒店」（Drake Hotel），罗伯特显然已经意识到，我们不会退让。在那之前，除了他有几次血口喷人、污蔑我们之外，他仍然一副和蔼可亲，装作「嘿，孩子们，我只是传话员」的态度。那天，他再次提醒我们，我的祖父憎恨我们的母亲，且害怕他的钱落入她手中。

这很可笑，过去至少二十五年来，我妈都根据川普家族订的规则生活，遵守他们信中的指示。她依旧住在皇后区牙买加同一间缺乏修缮的公寓，她的赡养费和育儿基金几乎没有增加，且她从未提出更多要求。

最後，佛瑞德和我们断绝关系，因为他可以这麽做。被委派来，至少要在财务上保护我们的人，是我们的信托管理人——玛丽安、唐纳、罗伯特和尔文．德班——但他们显然没兴趣保护我们，尤其是要自掏腰包。

罗伯特倾身向前，突然严肃地说：「听好了，如果你们不签这份遗嘱，如果你们想控告我们，我们会让米德兰公司破产，而你们将会为余生得不到的钱财缴税。」

在那之後，没什麼好说的。要麽，佛瑞兹和我妥协，不然就挺身奋斗，两种方式都不好。

我们询问尔文，他像是我们仅剩的盟友。他对於我们的祖父在遗嘱中差劲地对待我们，感到极为愤怒。当我们告诉尔文，罗伯特被我们问到米德兰公司，以及我们在其他川普企业持股的回应时，他说：「你们光是从海岸港和海滩港土地份额，就已经是无价之宝。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要为你们做些什麼，你们必须控告他们。」

我不知道地租是什麼，更不用说我在两份契约里都有份，但我知道无价的意思，且我信任尔文。根据他的建议，佛瑞兹和我做了决定。

历经数月，我侄子威廉仍在住院，而佛瑞兹和丽莎忙得焦头烂额。我告诉他，我会处理好这件事；当天下午，我便打电话给罗伯特。

「你们能做些什麼吗，罗伯特？」我问。

「签了遗嘱，走着瞧。」

「真的吗？」

「你爸死了。」他说。

「我知道他死了，罗伯特，但我们没有。」我痛恨自己要讲这句话。

他愣了一下，说：「玛丽安、唐纳和我只是单纯地遵照父亲的遗愿，你们的祖父不想让你或佛瑞兹，尤其是你妈，分得任何遗产。」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这样毫无结果，佛瑞兹和我会聘请律师。」

好似开关被打开一般，罗伯特呐喊：「你们尽量放马过来！」接着把话筒重重摔下。

翌日，我一回家就收到奶奶的答录机讯息。她简要地说：「玛莉，是你的祖母。」她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向来都是「奶奶」。

我马上回电给她。

「你叔叔罗伯特告诉我，你和你哥要提告，争取你祖父的两成资产。」

我感觉被攻其不备，并未立即回应。罗伯特显然打破我们的协议，

并将他的内容版本告诉了我祖母。但我耿耿於怀的是，祖母说得好像我们争取原本应该属於我爸的资产份额是错误且不得体的。我很困惑——对於忠诚、对於爱，以及两者的界线。我原本以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全搞错了。

「奶奶，我们还没提出任何要求，我不清楚罗伯特是怎麽告诉你的，但我们没有要控告任何人。」

「你们最好不要。」

「我们只是试图厘清而已，就这样。」

「你知道你爸死的时候，值多少吗？」她说：「分文不值。」

静止片刻後，传来喀嚓声，她挂了我的电话。

第十二章

决裂

我拿着话筒呆坐在那儿，不知道接下来该怎麽办。那是改变所有事情的关键时刻之一，无论是在那之前发生过的事，或是之後将会发生的事；事情太多，难以消化。

我打电话给我哥，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眼泪夺眶而出。

他给奶奶打了电话，看看能否解释我们真正追求的事物，但基本上只是重复（奶奶与我的）对话。但她挂电话前，骂他的方式稍微不一样：「你爸死的时候，超级穷。」在我的家族世界，那（财富）是唯一重要的事。如果你唯一的人生货币就是钱，那也成了决定事情价值的唯一视角，有些人根据那样的情境断定我爸一文不值——即使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再者，如果我爸逝世时一贫如洗，他的孩子也不配享有任何遗产。

我的祖父拥有各项权力，包含在他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改变遗嘱。我的姑姑和叔叔也有充分权利遵守这份遗嘱的指示，尽管没有任何一人应该得到比我爸还多的遗产。要不是有幸出生在这个家庭，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是千万富翁。检察官与联邦法官通常不会坐拥两千万美元的棕榈滩别墅，行政助理不会在南安普敦拥有周末度假屋。（不过，说句公道话，玛丽安和伊莉莎白是除了我爸之外，唯二不在家族企业闯荡出一番成就的亲戚。）

但她们的行为仍像是自己有权从我祖父的财产那边赚到每一分钱一样，而这些钱与她们的自身价值感更是密不可分，不可能放弃其中一项。

我们听从尔文的建议，接洽纳苏郡（Nassau County）最大律师事务所「法瑞尔菲力兹」（Farrell Fritz）的合夥人杰克．巴诺斯基（Jack Barnosky）。杰克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男士，他同意接受我们的委托。他的策略是，证明我祖父在一九九○年立下的遗嘱必须撤销：佛瑞德．川普签署遗嘱时的心智已不健全，且受到他孩子不当的影响。

我们担任遗嘱执行人不到一周，杰克就收到陆．劳里诺（Lou Laurino）的信；劳里诺是矮小精干的凶悍律师，他是我祖父资产的代理人。我们打从出生以来就由川普管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被撤销；川普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受到该公司保障，而我哥更靠这笔保险支付我侄子的

庞大医疗开销。当威廉第一次病倒时，罗伯特允诺佛瑞兹，他们会照料一切，只要把帐单寄到办公室就好。

撤销保险是玛丽安的主意，这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徒增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更焦虑。威廉那时候已经出院，但他的癫痫依然可能复发，这种疾病让他不止一次心跳停止，严重到如果没有及时施行心肺复苏术就可能回天乏术；他仍需要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照护。

我家族的人全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反对，就连我的祖母都默许；她和家族里的其他人一样，深谙这个重病的曾孙余生的医疗照护开销所费不赀。

佛瑞兹和我别无选择，只好再兴讼，争取恢复威廉的医疗保险。这起诉讼需要负责照顾威廉的医生和护士的书面证词和宣誓书，这既耗时又很有压力，最终还得面对法官。

劳里诺第一次抗辩时主张，撤销保险是因为我们无权预期保险会永远存在，那反倒像是一份祖父出於好心馈赠的礼物。他淡化威廉的病况，坚称陪伴威廉且不止一次拯救威廉性命的全天候看护，只不过是价格过高的保母。他说，如果佛瑞兹和丽莎担心他们的小男婴可能癫痫复发，或许应该学会心肺复苏术。

那些书面证词对我们没有帮助，我无法相信杰克是多麼糟糕的谈判员。他跟不上谈话节奏，还会突然转移话题。尽管佛瑞兹和我帮他准备好了列有多项问题的清单，他几乎从未提及。罗伯特比上一次和我说话时还要冷漠，重申我祖父对我母亲的憎恨，且以此作为他（我的祖父）拒绝分配遗产（给我爸）的主要考量；玛丽安则恼火地形容我和我哥是「不在籍孙子」（absentee grandchildren）。我回想她在我拜访祖母时，每一次打电话到大宅的情景；如今，我终於明白，她从来没请祖母转达问候的原因。她说，我的祖父不爽我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陪伴我们的祖母，完全忽视过去十年的事实。我的祖父显然也痛恨佛瑞兹从来不打领带，以及我在青少年时期穿着宽松毛衣和牛仔裤。当唐纳宣誓作证时，他不知道或记不得任何一件事，他多次运用「忘记」策略来规避责骂或监察。他们三人都在宣誓的书面证词中表示，我的祖父直到过世之前，都依然「思维敏捷」。

那时候，伊莉莎白姑姑巧遇一位家族友人，此人事後向我哥转述姑姑和他说的话：「你知道佛瑞兹和玛莉在搞什麼吗？他们只在乎钱。」当然，遗嘱攸关金钱，但在只有一种货币的家族里，遗嘱也事关爱。我以为，伊莉莎白或许可以理解，毕竟她没有权势，她在该情况下的意见对任何人而言都不重要，除了我和我哥之外；但她依循家规的方式，仍让我们很难过。即便是个沉默无权的盟友，也好过孤军奋战。

约莫两年後，诉讼费渐增却无任何形式的和解进展，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和家人对簿公堂。威廉依然病重，审讯需要聚精会神，但我哥

无暇因应；我们不甘愿地决定和解。

玛丽安、唐纳和罗伯特表示，除非我们同意让他们购买，属於我们从我爸那边继承所占比例的资产，否则拒绝和解；这些资产即为「迷你帝国」中属於他的百分之二十，以及「无价的」地租。

我的姑姑和叔叔将一份物业估价交给杰克．巴诺斯基，他和陆．劳里诺根据他们的数据，拟定一个可能立基於虚报数字的和解金额。杰克告诉我们，不对簿公堂，这是我们能预期的最佳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说：「但这就是各说各话，而你们祖父的遗产价值仅约三千万美元。」这是罗伯特一九九九年透露给《纽约时报》的十分之一价码，结果其实只是遗产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佛瑞德无疑相信，我爸被给予和唐纳相同的工具、一样的优势和同等的机会。如果佛瑞迪将之全部抛弃，那就不是他父亲的错。不过如果不管家族的干预，我爸持续当个差劲的供应者，我哥和我应该自认幸运，因为我们拥有我爸在世时无福挥霍的信托基金。在那之後发生的任何事，都与佛瑞德无关。他已经尽力了，我们无权奢求。

官司还在进展之际，我收到消息，奶奶在短暂的病痛後，於二○○○年八月七日逝世於长岛的犹太医疗中心，跟我的祖父一样。她病殁时，享寿八十八岁。

如果我早知道她病了，我想我会试着去探望她，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要求见我，显见我俩如何潇洒地放下彼此。我们打从最後那一通电话之後，就没再说话；正如我也没再跟罗伯特、唐纳、玛丽安或伊莉莎白说话，我也从来不愿尝试。

佛瑞兹和我决定参加奶奶的葬礼，然而，我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遂站在大理石学院教堂後方、人满为患的其中一个厅堂里。在唐纳的几名护卫陪同之下，我们透过闭路监视器观看仪式。

悼词中值得注意的，是未被提及的部分。字里行间有许多关於我祖父母会在天堂团圆的祝福，但我爸完全没被提到，甚至没有出现在我祖母的讣闻中。

奶奶逝世几个星期後，我收到奶奶遗嘱的影本。那简直是我祖父遗嘱的复本，只有一处不同：我哥和我已经被排除在她的孙子遗赠之外。我爸和他的整个嫡系血脉已然遭到铲除。

第四部

最糟的投资

第十三章

政治攸关个人

近十年过去，我在二○○九年十月，堂妹伊凡卡与妹夫杰瑞德．库许纳的婚礼上，再次见到我的亲戚。我不知道为何我会收到邀请卡——它印在川普集团酷爱的大型信封上。

随着礼车驶离我坐落於长岛的家，前往唐纳位於纽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之际，我仍不确定该期待什麽。唐纳那间高尔夫球俱乐部，诡异地状似大宅。引座员走上前来，分发黑色披肩，让我披在肩膀上，以免显得太裸露。

户外仪式在大型的白色帐棚下举行，镀金的椅子分两边，整齐地排在镀金镶边的走道地毯两侧。传统的犹太教婚礼仪式以白玫瑰点缀装饰，会场几乎和我家一样大。唐纳头顶上戴着「亚莫克帽」（yarmulke，译注：犹太男子佩戴的圆顶小帽），尴尬地站着。在交换誓词之前，杰瑞德三年前才刚出狱的父亲查理（Charles）起身告诉大家，杰瑞德第一次将伊凡卡介绍给他认识时，他认为她永远不够格嫁入他的家族。在她皈依犹太教且经过一番努力後，他才开始认为，她有可能值得成为库许纳家族的一员。查理曾犯下雇用一名妓女色诱他的妹夫，录下两人的不法勾当，且在他侄儿的订婚派对上，将影片传给自己妹妹的罪行；我认为，他自视甚高的态度有些过火。仪式过後，我哥、我大嫂和我一起走进俱乐部。

我沿着走廊行走时，便看到罗伯特叔叔。我和他的上一次交集，发生在一九九九年的那通电话中，那时我告诉他，佛瑞兹和我决定聘请律师，针对祖父的遗嘱兴讼之後，他挂了我电话。当我走近他时，他竟然对我微笑，这让我感到讶异。他伸出手，接着倾斜垂下——就算我穿着高跟鞋，他还是比我高——他握了我的手，接着亲吻我的脸颊，这是典型的川普式问候。

「亲爱的！你好吗？」他爽快地说。在我回答之前，他已经开口，说道：「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家族失和的追诉时效已过。」接着，他踮起脚掌，单手握拳，啪地一声，打向另一只张开的手掌，不是很精确地模仿我的祖父。

「对我而言，听起来不错。」我说。我们轻松对谈了几分钟，结束後，我上楼走到鸡尾酒接待区；在那儿，我发现唐纳正在跟我认得的一位市长或州长交谈，但我记不得那是谁了。

「嗨，唐纳。」我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

「玛莉！你气色不错。」他和罗伯特一样，握了我的手，亲吻我的脸颊，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庆幸我们之间的交谈还算愉快且有礼，确认这点之後，我让位给长长人龙的下一位，有些人等着恭贺新娘的父亲。《谁是接班人》刚播毕第八季，所以许多人很可能只是来拍照。「玩得开心！」他在我离去渐远时，高声呼喊道。

接待酒会在大型舞厅举行，距离开胃菜有点远。远远地，我看到伊莉莎白姑姑追着她的老公跑；我们对到眼，我遂对她挥挥手。她也对我挥挥手，说道：「嗨，亲爱的。」不过，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我走过旗海飘扬和地板擦得闪闪发亮的舞池，终於在舞厅边缘找到我的座位，那是第二张准备给堂兄弟姐妹的桌子。远远的，我可以听见直升机起降，螺旋桨唰唰作响的声音。

第一道菜上桌後，我决定去找玛丽安。当我穿梭在桌子之间时，唐纳上台敬酒。要不是我知道他在讲谁，我会以为他在为秘书的女儿敬酒。

我找到了玛丽安，接着停顿了一会儿。佛瑞兹和我获邀出席伊凡卡的婚礼，绝对得经过玛丽安第同意。她一直到我站在她面前时，才看到我。

「嗨，玛丽安姑姑。」

她花了几秒钟才认出我是谁。「玛莉。」她脸上没有笑容，表情僵硬地说：「你好吗？」

「一切安好。我的女儿刚满八岁，而且……」

「我不知道你有个女儿。」

她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女儿，也不知道我在祖父的葬礼後，曾和一名女性结婚，女性共同抚养我的女儿，但我已和她离异；她更不知道，我最近刚取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但她表现得好像知道这些事对她而言是一种侮辱。我们接下来的短暂对话也同样紧张，她提到伊凡娜错过伊凡卡的婚前派对，接着她低声说道，她不能透露原因。

我返回我的座位，惊觉我点的素食餐点没有送来，於是我点了一杯马丁尼取而代之，这些橄榄就能让我心满意足。

过没多久，我看到玛丽安彷佛执行任务般，毅然朝我们走了过来。她直接走到我哥面前说：「我们需要把话说开。」她接着比了个包括我的手势说：「我们三个。」

伊凡卡和杰瑞德的婚礼过後几个星期，佛瑞兹和我前往玛丽安坐落上东城的公寓，会见她和罗伯特。我不晓得罗伯特会在，但我想他可能打算履行他所谓的家族失和「追诉时效」已过的允诺。我把它当作好兆头，但随着下午时光流逝，我变得不太肯定。我们并未讨论任何相关事务，当我们坐在能欣赏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壮观景致的客厅里，玛丽安提到那场过去会以「决裂」指称的官司，但没有人想要详谈。

罗伯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我当时想着，终於要开始讨论大夥儿避而不谈的议题了；孰料，他讲了一段故事。

十年前，罗伯特还在唐纳财务困顿的大西洋城赌场工作之际，他的投资人责怪他，银行向他讨债，他的私生活一团糟。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唐纳曾打电话给罗伯特，提出一个请求。

「听着，罗伯特，我不知道这会如何结束。」他说：「但很难说，我可能心脏病发猝死。如果我发生什麼事，我希望你帮我确保玛拉不受牵连。」

「没问题，唐纳。告诉我，你要我做什麼。」

「给她一千万美元。」

我心想：天哪，那是一大笔钱！与此同时，罗伯特说：「真是个虚伪的混蛋。」

罗伯特笑着诉说这段回忆之际，我呆坐在那儿，想着这群人到底多有钱。就我上次听到的说法，一千万美元相当於我祖父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

「那时候，唐纳打电话告诉我，我是他最喜欢的三个人之一，」玛丽安说：「他显然忘记自己有三个孩子。」（当时蒂芬妮和巴伦〔Barron〕还没出生。）

我们再也没见过罗伯特，但佛瑞兹和我偶尔会分别或一起和玛丽安共进午餐。我这一生头一遭有机会好好认识我姑姑。那是自从我帮唐纳写书，而和他共处多时之後，我再次稍稍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二○一七年四月，我姑姑的生日派对过後几个月，我在客厅绑紧运动鞋的鞋带时，前门的门铃响了。我不知道我为何会应门，我几乎从未理会。百分之七十五的机率会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或耶稣基督後期圣徒教会（俗称摩门教，Mormon）传教士；其他时候，则是有人希望我签名连署。

开门後，我印象中的画面是，一位女子站在门前，她顶着爆鬈金发，戴着黑框眼镜，我不认识这个人。她的卡其色正式衬衫和邮差包，让她在洛克维尔中心（Rockville Centre）显得格格不入。

「嗨，我是苏珊娜．克雷格，《纽约时报》记者。」

记者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不再联系我。除了《琼斯夫人》（Mother Jones）的大卫．寇恩（David Corn）、《前线》（Frontline）的某人，要不就是会在选举前夕留下讯息的《内幕报导》（Inside Edition）记者。无论我就我的叔叔发表什麼意见，都不会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之前影响大选；现在怎麼会有人想听我的话？

这般徒劳让我烦躁，所以我说：「你不可以迳自找上门来。」

「我知道，很抱歉，我们正在调查关於你们家族财务状况的重大新闻，我想你真的可以帮上忙。」

「我不能告诉你。」

「至少收下我的名片吧，如果你改变心意，随时联系我。」

「我不和记者说话。」我说着，但还是收下她的名片。

几周後，我撞断左脚的第五节跖骨。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形同软禁在家的囚犯；我坐在沙发上，随时都得把脚抬高。

我收到苏珊娜．克雷格的一封信，内文重申她相信我拥有可以帮助她「改写美国总统历史」的文件，至少她是这麼说。我忽略了那封信，但她很坚持。

窝在沙发上一个月後，我滑着推特，背景不断出现新闻；我同步观看唐纳打破规范、危害盟友且践踏弱者。唯一令我讶异的是，越来越多人允许他这麼做。

在我目睹人们因为我叔叔的政策，导致我们的民主分崩离析且民不聊生之际，我一直想起苏珊娜．克雷格的信。我找到她的名片，打电话给她。我告诉她，我想帮忙，但我没有任何关於几年前诉讼的文件。

「杰克．巴诺斯基可能还有。」她说。

十天後，我前往他的办公室。

法瑞尔菲力兹律师事务所的总部，位於两侧半椭圆、中间长方体的两栋蓝色玻璃建筑物中间，冷冽寒风吹袭广阔的大型停车场。入口附近不可能有车位，所以（脚伤还没好的）我找了一个必须拄着T型拐杖走

十分钟才到得了大厅的车位。我小心翼翼地上下电扶梯，行走於大理石地板上。

待我到达目的地时，已累得半死，且怒火中烧。三十个文件纸箱沿着两面墙排列整齐，还有一座放满书的书柜。这个房间里的其他物品，就是一组桌椅。杰克的秘书友善地放好一叠纸、一枝笔和一些回纹针。最後，我放下背包，将T型拐杖倚着墙壁放好，几乎跌坐在椅子上。没有一个盒子上有标签，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我花了一个小时，才熟悉盒子里的内容物并列好一份清单，这需要我坐在椅子上，在那个房间里滑来滑去，并以单脚搬箱放到桌上。杰克经过时，我气喘吁吁，脸胀得通红，汗水也浸湿了衣服。他提醒我，我不能带任何文件离开这个房间。「它们也属於你哥，我需要徵得他的同意。」这并非全然精确。

当他转身离开时，我叫住他：「杰克，等一下。你还记得，我们当初为何决定和解吗？」

「这个嘛，你们担心花费，还有你知道的，我们不接突发事件的案子。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说谎，但那就是『各执一词』。此外，你祖父的资产只值三千万美元。」历经近二十年，他几乎是逐字地转述他当时说的话。

「喔，好吧，谢谢。」我当时手上拿着得以证明祖父逝世时，资产逼近十亿美元的文件，只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在我确认他离开之後，我抓起祖父的遗嘱、存取讼案所有书面证词的磁碟片，以及我祖父部分的银行帐户纪录，全塞进我的包包里；这些全都是因为这宗讼案，我依法拥有的物品。

苏珊娜隔天来我家里拿文件，并给了我一支预付费用的抛弃式手机，以便我们日後可安全无虞地联系。我们不愿冒任何风险。

我第三趟去法瑞尔菲力兹律师事务所时，井然有序地翻找每一个纸箱，发现每份文件都有两份副本。我将这件事告诉杰克的秘书，并建议不需要经过我哥的同意，这会让彼此如释重负，毕竟我不想让他受到牵连。如果他想要的话，我会留一套文件给他，但这种情况未必会发生。

我才刚开始根据《纽约时报》所需要的素材清单寻找时，就收到杰克的讯息：我可以取用任何文件，只要留下一份副本就好。我还没准备好，事实上，我打算在下午一点在我家见过苏珊娜以及另外两位与她合作撰写这篇报导的同事罗斯．布特纳和大卫．巴尔斯托之後，再决定我要悄悄拿走什麼文件。我传简讯告诉苏珊娜，我会晚点回家。

约莫下午三点，我把车开到大楼地下室的卸货平台，将十九个纸箱装进我借来的卡车後车厢里；会开卡车是因为（脚伤让）我无法操作我自己车里的离合器。

当我把车停进自家车道时，天色才刚要暗下来。那三名记者在大卫的白色休旅车里等我，那台车酷炫地装了一对驯鹿鹿角，还在水箱罩上绑了红色大鼻子。当我把众多纸箱秀给他们看时，他们全抱在一块儿；那是我数月以来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当苏珊娜、罗斯和大卫离开後，我累坏了，但也松了一口气。那是晕头转向的几周，我还没完全意识到，我冒的风险有多大。如果我家族的任何人发现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肯定会报复；我知道他们的心肠有多坏，但无法设想後果可能有多严重。和他们干过的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终於感觉到，我终究可能带来重大改变。

以前，我能做的事情都不足以造成影响，所以我压根儿没有努力尝试。无论是好是坏，都微不足道。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非比寻常，你不能只是一名检察官，你必须是国内最好的检察官，且必须是联邦法官；你不能只开飞机，你必须在喷射机时代初来乍到之际，担任主要航空公司的专业机长。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怪罪祖父让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都没有人察觉，在我祖父眼中「最好的」企盼，只适用於（一败涂地的）我爸，和（远超越佛瑞德预期的）唐纳。

当我终於意识到，祖父并不在乎我的成就或贡献，而我却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气馁时，我仍然觉得，只有崇高的作为才能补救。我在协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里当志工，对我来说还不够，我必须拉下唐纳。

大选过後，唐纳打电话给他的大姐，表面上想了解自己做得如何。当然，他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否则不会主动打电话。他只想要得到她非常强烈的认可，确认他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当她说：「不是那麽好。」唐纳暴怒。

「下流！」他喝斥。她可以看见他鄙视的面容。接着，他冷不防地问她：「玛丽安，要是没有我，你会在哪里？」这是一种自鸣得意的事实，指玛丽安应该感激唐纳，因为（唐纳的私人律师）罗伊．柯恩这些年来帮忙他（和她），让她得到第一个联邦法官的身分。

我姑姑总是坚称，她靠自己的能力赢得法官头衔，她驳斥他说：「你要是再说一次，我会毁了你。」

不过，那只是在撂狠话。即便玛丽安向来自诩是唐纳在地球上唯一听从的人，那些日子已不复存在，且就在不久之後的二○一八年六月，唐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一次峰会前夕，玛丽安致电白宫，留言

给他的秘书说：「告诉他，大姐打电话来要给他亲密的小建议：做好万全准备，向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人们学习，远离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并把他的推特留在国内。」（译注：美国职篮NBA退役球星「小虫」罗德曼，自称是金正恩的好朋友。）

他全都没听进去。政治新闻网站《政客》翌日的标题写道：「川普说，川金会攸关『态度』，而非准备工作」。玛丽安就算曾对她的弟弟具有影响力，如今显然已荡然无存。除了为不可或缺的生日祝贺致电，他们在那之後没再讲过话。

当他们撰写报导时，《纽约时报》记者邀请我加入他们清点我祖父房地产的行列。二○一八年一月十日上午，他们开着大卫的休旅车，鹿角和红鼻子装饰还在，到牙买加火车站来接我。在那一天当中，我们从我成长的海兰德开始，穿越冰霜风雪，尽可能努力走访川普帝国的版图。

九个小时过去，我们还是没走完全部。我已经把T型拐杖换成手杖，但我回家时还是累坏了，身心俱疲。我思考着我所见的一切，试着理清头绪。我早就知道祖父拥有多栋建筑，但不清楚确切数目。更恼人的是，我爸显然曾经拥有这些我从没听说的建筑物的百分之二十所有权。

二○一八年十月二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将近一万四千字、史上最长篇幅的报导，揭露我的祖父、姑姑和叔叔们长期涉入的一连串潜在诈欺与犯罪活动。

透过《纽约时报》团队精彩的报导，我了解到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家族财务状况。

唐纳的律师查理斯．J．哈德（Charles J. Harder），不出所料地否认所有指控，但调查记者列出毁灭性事证。在佛瑞德一生当中，他和我的祖母汇出数亿美元给他们的小孩。我的祖父还在世时，光是唐纳就有价值四亿一千三百万美元的身家，许多汇款来自可疑的方法：从未偿还的贷款、从未到期的房地产投资，尤其是未税赠与，这还不包括他卖掉我祖父的事业帝国所获取的一亿七千万美元。报导中提及的金额令人费解，而这四名手足数十年来都有受惠。我爸早年显然共享这些财富，但等到他而立之年已所剩无几，我不知道他的金钱流向。

一九九二年，就在唐纳试图将遗嘱文件附加上我祖父的遗嘱，以期有效地排除他的手足两年後，这四人突然需要彼此；历经了他们父亲长久以来的挑拨离间，他们终於有了共同目标，即保护继承财产不被政府夺走。佛瑞德拒绝听从律师的建议，在他生前分割他的帝国控制权给他的孩子，好让遗产税减到最低。这表示，玛丽安、伊莉莎白、唐纳和罗伯特可能要负担潜在的数亿美元遗产税。除了数十栋建筑之外，我的祖

父累积了大笔财富。他完全没有负债，且每年赚进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川普手足间的解决方案是成立「全郡建筑补给维修公司」（All County Building Supply & Maintenance）。那时，我的祖父因为每下愈况的失智症，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不是因为他反对他们的图谋。我父亲逝者已矣，而玛丽安、唐纳和罗伯特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我们的托管人，但没有人强迫他们履行对佛瑞兹和我的义务，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将我们排除在决策圈之外。

根据报导，我姑姑、叔叔和他们的爸爸一样痛恨缴税，而「全郡建筑补给维修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透过伪装为「合法商业交易」的许多大礼，从「川普管理公司」汲取钱财。这套诡计很有效，在佛瑞德於一九九九年逝世时，他只有一百九十万美元现金，且没有任何资产大於来自唐纳的一千零三十万美元借条（IOU，承认债务的非正式文件）。奶奶逝世隔年，我祖父母的合并资产据说有五千一百八十万美元，这是可笑的主张，特别是川普手足四年後以超过七亿美元卖掉（我祖父的）帝国。

我祖父对唐纳的投资在短期内非常成功，他有策略地在唐纳「事业」的几个关键时刻，部署数百万美元，甚至经常是数以千万计美元。有时候，这些资金用以支持其形象或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有时则为唐纳打通管道或取得好处。随着频率增加，他们必须金援他。透过这种方式，佛瑞德买到沐浴在唐纳荣耀光辉之中的能力，深谙「要不是他的专业知识和慷慨，这一切不可能实现」，且对此感到满足。我的祖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的帝国永续存在；但就长程看来，他失去一切。

无论何时，罗伯特与我们见面讨论我祖父的资产时，他都会一再强调，要尊重祖父的遗愿，即我们什麽都得不到。然而，当触及川普在世手足的利益时，他们一点也不内疚，无法达到维护我祖父最低的要求；唐纳宣布有意卖掉（我祖父的帝国）时，无人反对。

二○○四年，我祖父花费七十多年兴建的绝大部分帝国版图，已经以七亿零五百六十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单一买家鲁比．施朗（Ruby Schron）。替施朗筹资的银行评定，这些房地产约有将近十亿美元的价值，但我那自诩为「谈判大师」的唐纳叔叔一举贱卖，损失几近三亿美元。

把房地产整批卖掉是策略性的灾难，最聪明的作法应该是维护川普管理公司的完整性。他们基本上不用做什麽事，四位手足每人每年就能赚进五百万美元到一千万美元。不过，唐纳需要更大笔的现金进帐，这笔小钱，即便年年进帐，对他而言并不够。

他们大可以分别贩售大楼和复合建筑，肯定会有附加价值，但过程难免漫长。唐纳的大西洋城债权人对他穷追不舍，他不想等。此外，几

乎不可能保密数十笔交易，他们需要尽可能快速且低调地完成单笔销售。

他们成功地办到了，这可能是唐纳唯一一笔没有吸引媒体目光的房地产交易。无论玛丽安、伊莉莎白和罗伯特可能曾有什麽反对声音，但最後他们闷不吭声。就算是现在，玛丽安仍礼让唐纳——即便玛丽安比唐纳年长十岁，更聪明且才华洋溢。「唐纳总是称心如意。」她说。他们也没有人甘冒等待的风险，他们都知道「屍体埋在哪里」（译注：意指必须谨守的秘密），因为全都埋在「全郡建筑补给维修公司」。

销售所得分成四份，他们每人分得约一亿七千万美元。对唐纳而言，仍然不够，或许对他们任何一人来说都不够，向来如此。

二○一八年九月，我在文章曝光前一个月左右拜访玛丽安，她提及（《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巴尔斯托曾联系她。我表哥大卫找到我祖父的老会计师杰克．米特尼克，如今高龄九十一岁的他，住在佛罗里达州一间养老院里；我表哥大卫认为，米特尼克肯定就是爆料者。玛丽安对整件事视而不见，认为该文章仅是关於一九九○年的遗嘱文件争议。但是，如果她真的有和巴尔斯托谈过，她肯定知道他们想要查找的范畴，即可能涉及税务诈欺的「全郡公司」，但她看似泰然自若。我那时疑惑，为何她和罗伯特没有动用权势，劝退唐纳竞选总统，但我现在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当时不可能以为，他（乃至於他们）可以持续规避审查。

报导出炉後，我很快地再次见了玛丽安。她全盘否认，到头来，她只是个「女孩」。当一份需要她签名的文件递到她面前，她就签了，什麽问题也不过问。「那篇报导回溯六十年前的事，你知道那是在我当法官之前的事。」她说得好似调查也在六十年前结束了一般。她似乎没想到会有任何後果，尽管法院针对她被指控的情事启动调查，但她只要退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她果真退休了，且保有每年二十万美元的退休金。

在过渡期间，她将爆料嫌疑者从老态龙锺的米特尼克，转向她的大表哥约翰．华特（John Walter），华特是我祖父的姐姐伊莉莎白的儿子；华特於二○一八年一月逝世。我对玛丽安如此轻易下结论感到诧异，华特为我的祖父工作数十年，广泛地受惠於他舅舅的财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入「全郡公司」；就我所知，他向来非常忠诚。我认为，她影射他很奇怪，虽然她这样的怀疑对我有好处。我当时不知道，华特的讣闻忘了提及唐纳。华特向来对川普家族的历史很感兴趣，且夸耀他与川普管理公司的关系，这项遗漏因此启人疑窦。

更令人讶异的是，玛丽安竟然没有想过，我可以找到关於文章内容的素材，正如同她相信遭抹杀的事实与被改写的历史事件版本。她没料

到，揭露这些事实会怎麽在任何方面影响到我。

事实上，这窝亲族可能窃取的大笔财富，让他们就我祖父的遗嘱对抗我们；他们大幅压低我们的合夥股份（我现在才首度得知），只不过是病态的小心眼，後来他们剥夺我们的医疗保险、无视我侄子的就医权益，才真正显露了他们残酷的本性。

第十四章

公宅里的公仆

康庄大道始於大宅，通往川普大楼的三层楼中楼阁楼，再到西翼；正如始於川普管理公司到川普集团，入主椭圆办公室的锦绣前程。前者，基本上是精准控制的环境，在那里，唐纳的物质需求总是被呵护得无微不至；後者则是一系列闲差，所有事情都由别人帮唐纳打理好，唐纳不需要取得或维持能力（这解释了他不屑他人专业的原因）。这一切让唐纳不会失败，也让他相信自己缔造了成功。

唐纳对我祖父的意义，宛如（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城墙对唐纳的意义：砸重金追求的虚荣计画。佛瑞德心智正常时，并不准备让唐纳继承衣钵，他无法将川普管理公司托付给任何人。他利用唐纳塑造公众形象，弥补自己受阻碍的野心，尽管唐纳挫败连连且判断力奇差。佛瑞德一直支持着唐纳虚妄的成就感，直到唐纳唯一的价值沦为容易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利用。

想要利用他的人，比比皆是。一九八○年代，纽约的记者和八卦专栏作家发现，唐纳无法分辨嘲讽与恭维的话语，且利用其厚颜无耻来增加报纸销量。这种形象及其代表的脆弱男性，特别吸引电视制作人马克．布奈特。二○○四年，《谁是接班人》首播时（即使唐纳与手足变卖我祖父的资产，并分得一亿七千万美元之後），他的财务状况仍旧一团糟，他自己的「帝国」由越来越多孤注一掷的品牌尝试建构而成，如「川普牛排」、「川普伏特加」，以及「川普大学」等；这让他沦为布奈特的箭靶。《谁是接班人》罔顾所有证据，将唐纳刻画为成功的企业钜子，让唐纳和观众都沦为笑柄。

在他头四十年的房地产生涯里，我的祖父从未负债。但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随着唐纳的野心变大且失策的频率增加，一切产生剧变。他不仅没有扩大他父亲的帝国版图，他入主川普大楼之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帝国的价值减损（连同他第一个开发案「凯悦酒店」，若无佛瑞德的资金和影响力，绝不可能完成）。时至一九八○年代晚期，川普集团似乎不断亏损，实则为唐纳不断从川普管理公司秘密转出数百万美元，藉此支持他空泛的房地产和交易大师的幻想。

讽刺的是，随着唐纳在房地产的损失扩大，我祖父更需要营造唐纳成功的假象。佛瑞德让唐纳的身边围绕着知道他们在做什麼的人们，并把功劳让给唐纳；这些人扶持他，为他说谎，且深谙家族企业的营运状

况。

我的祖父投资越多钱在唐纳身上，唐纳越有自信，这让他越来越大胆追求风险更高的项目，失败的代价也越大，迫使佛瑞德介入并提供更多协助。我的祖父一再纵容唐纳，唐纳每下愈况；让他更渴求镁光灯焦点和自由资金，益发自我膨胀且幻想自己的「伟大」。

虽然「拯救唐纳」最初是佛瑞德的专属职责，但银行不久後就成为此项目的夥伴。最初，取信於唐纳坚决完成工作的能力与效率，银行与佛瑞德真诚良善地运作业务。但随着唐纳多次宣告破产，鲁莽投资的帐单到期，贷款持续增加，这种刻意维持成功假象的方式渐渐露出马脚，而银行与佛瑞德打从一开始就被这种幻象所蒙蔽。可以理解，唐纳逐渐觉得他占上风，即使他其实没有。他完全没注意到，人们是为了私利而利用他，而他竟深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佛瑞德、银行和媒体给了他更多转圜余地，藉此让他替他们投标。

在唐纳试图拿下康莫德酒店的初期阶段，他召开记者会，公布他涉足此案已成定局。他谎称这笔尚未发生的交易没有他不行，他和佛瑞德藉着他在纽约媒体圈刚闯出的名号，还有我祖父的大笔钱财，出了险招，为他下个项目川普大楼省下大笔税赋。

在唐纳心里，他凭藉自己的优点达成每项成就，尽管里头充斥欺骗。他接受过多次访问，皆公然谎称他的父亲只借了他一百万美元，事後他还得清偿这笔钱，而所有成就都属於他一个人的。不难理解他为何对此深信不疑，身为一个日益缩小的自由世界领袖，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总是始终如一地犯下惊人的失败，然後「幸运地」绝处逢生。

今日的唐纳就像他三岁时一样：没有成长、学习或进步，无法调节情绪、控制回应，也未能接纳或汇整资讯。

唐纳亟需受人肯定，他似乎没发现，他绝大部分的支持者，都是他在集会活动之外，不愿屈尊看上一眼的人。他根深柢固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他持续需要赞美之光的黑洞，但这些赞美被他吸入後就会消逝。他贪得无厌，这远超过了普通的自恋；唐纳不仅软弱，他的自我也很脆弱，需要随时支持，因为他心底明白自己表里不一。他知道，他从没被爱过，所以他必须拉你进来认同他，即使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事：「这架飞机很棒，不是吗？」「是的，唐纳，这架飞机超棒。」如果要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反对他，就太无礼了。接着，他会把他的弱点和不安全感变成你的责任，你必须缓和他的这些情绪并照顾他。如果做不到，就会形成他难以承受许久的真空。如果你是在乎他认可的人，你就会说些什麽来挽留。他伤得很重，而你若不尽己所能缓和这些痛苦，你也必须承受。

从他在大宅的儿童时期，到他早期闯荡纽约房地产世界，以及今日的上流社会，唐纳的脱序行为持续被别人正常化。当他在纽约房地产界闯荡时，他自诩为自信满满、白手起家的谈判大师。「蛮横」（brash）一词，对他而言是一种赞美（用以表示自信，而不是无礼和傲慢）。事实上，他既非白手起家，也不是谈判大师，然而一切就这样揭开了序幕，始於他对语词的滥用，而媒体未能提出尖锐质疑。

他真正的技能（自夸、说谎和灵巧手腕）被解读为他个人品牌成功的独特优势。为了让他得以继续讲述攸关自身财富与後续「成就」版本的故事，先是我们家族替他粉饰，其他人接续启动让唐纳正常化的过程。另外，他雇用（和对待）无证劳工，拒绝於完工後支付包商款项，竟被合理化为做生意的代价。待人尖酸刻薄且不给予尊重，也让他表面上看起来强悍。

这些不实陈述在那时肯定看似无伤大雅——不过是让《纽约邮报》销量更好，或让《内幕报导》扩大触及读者的一种方法——但每一次的违法都难以阻止更严重的下一次灾难。他认为这种策略是合法算计，而非道德沦丧的诈欺，这也是他和我祖父数十年来建构的模式。

尽管唐纳的本质天性未变，但他自从就职典礼以来所承受的压力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是工作压力，因为他没有在工作，除了看电视或在推特上发文羞辱人，这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注意到他（对政治、内政或简单的人性）一无所知，需要花费很大一番工夫；数十年来，他名气响亮，有好有坏，但他很少像如今这样成为被密切监督的对象，且从未面临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这让他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认知遭到质疑。

唐纳的问题积沙成塔，因为解决问题或假装问题不存在的技巧变得更复杂，也需要更多人替他圆谎。唐纳完全没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无法隐瞒自己的证据。毕竟，这整个机制创设之初，就是用来保护他的弱点，而不是协助他对抗更宽广的世界。

他昂贵且悉心受到呵护的「软垫病房」（padded cell）开始瓦解，接近唐纳的人比他还要脆弱、胆小，但一样焦虑（译注：软垫病房是为了避免患者自残，而在墙面铺设软垫的特殊病房）。他们的未来直接仰仗他的成功与分得好处，他们未能看见或拒绝相信事实，他们的命运将和那些过去效忠唐纳的人一样。看起来好像有无数的人愿意投身加油团，保护唐纳避免受阻於自己的不足，同时也让他益发自我感觉良好。尽管打从一开始，更有权势的人就将唐纳放到受保护的位置，後来却是由比他还要软弱的人，让他维持在那里。

当唐纳变成共和党正式的提名人，接着成为候选人之後，全国媒体以娱乐手法探讨他的病态（以及他的虚伪与浮夸妄想），还有他的种族

歧视和厌女症，掩盖了成熟与严肃的目的性。久而久之，大量共和党人——从极右派到所谓的温和派——都选择视而不见，要不是奉承他，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弱点和可塑性来达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大选过後，（俄罗斯总统）普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这些人全都具备近似佛瑞德的心理；他们看透了其他人应该要了解，却没有这麽做的方法，即唐纳多变的人生经历及其独特的人格弱点，让他极其容易被更聪明且有权势的男人操纵。他的病态使他变得头脑简单，每天不断告诉自己数十次他想告诉自己的话——他是最聪明、最伟大、最棒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是将儿童关进集中营、背叛盟友、推行摧毁经济的减税措施，或贬低对美国崛起有贡献的企业，并虚浮轻佻地夸耀自由民主。

亚当．瑟维尔曾在《大西洋》（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唐纳而言，重点是要残暴。对佛瑞德来说，这完全正确。我的祖父除了赚钱以外，少数的乐趣之一就是羞辱他人。他坚信自己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他的信念获得出色的成功且深信自己高人一等，他必须迅速果断地解决所有质疑他权威的声音，并告诉挑战者，他们其实无足轻重，这在佛瑞德拔擢唐纳而非佛瑞迪出任川普管理公司总裁时很有效。

不同於我的祖父，唐纳总是在争取正统性——过去是足以取代佛瑞迪，作为曼哈顿房地产开发商或赌场大亨；而今即使当了椭圆办公室的主人，却永远无法逃避他完全没资格的事实，或他的「胜利」并不合理的污点。唐纳在我祖父反覆地介入之下，一再累积失败经验，而他的一生始终为争取他恐怕永远无法赢得的合法性而挣扎，所以他转换机制，确保没人发现他根本缺乏正当性。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比现在还要来得更真实，这也是美国身处的难题：政府当前的架构，涵盖行政部门、半个国会和最高法院大多数（的大法官），全在替扞卫唐纳的自尊而付出，这俨然成为此政府的整体目的。

他的残暴，有一部分是为了转移大众和他自己的目光，避免留意他失败的真实程度；他的失败越严重，他掩盖的作为就益发变本加厉。比如说，谁会在他威胁驱逐吹哨者、强迫参议员漠视海豹部队（Navy SEAL）上士艾迪．盖拉格（Eddie Gallagher）的罪状并要求特赦之际，注意到他竟然在同时间允许在美墨边境将儿童关进集中营？分化策略一向是他所擅长的，如果他能让四万七千个盘子同时在半空中转动，谁又能真正地锁定其中一个呢？

他的残暴也运用在职务之中，他总是以此对抗比他软弱的人，或受限职权而无法抵抗者。当他在推特上抨击雇员和政务官时，雇员和政务官无法反抗，因为这可能赔上饭碗或名声。佛瑞迪出於对子女的责任和得体的举止，无法反驳弟弟嘲笑他对飞行的热情；正如同（民主党掌握的）「蓝州」在新冠肺炎危机之际，亟欲为州民争取联邦援助，克制批

评唐纳的无能，生怕他会收回呼吸器等必要救命设备。唐纳打从很久以前就学会如何挑选他的目标。

唐纳持续徘徊在害怕冷漠、恐惧失败的黑色空间中，这项「恐惧工程」花了四十二年才竣工，但其实地基很早就埋下了，其中，後者的经验更造成他哥哥人生的毁灭，唐纳历历在目，彷佛是他亲身领受的创伤。他所目睹和经历过的冷漠与失败，始终让他感到孤立无援犹如惊弓之鸟。恐惧在他儿时扮演的角色，及现在对他的影响，不容小觑。六十年前来自大宅的惊恐感，一直到现在仍压倒性地主导着他的情绪。

每次你听到唐纳谈论（他促成的）事情最伟大、最棒且最惊人，你都必须记得，这个男人在本质上仍是那个同样让人操心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极其害怕像他大哥一样，无法胜任要务，但他也终将因为自己的不足而毁灭。究其最深层的心理，他并不是在对他面前的观众自夸和虚张声势，而是只对一个人表现：他溘然长逝的父亲。

唐纳总是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并全身而退，他总是会说：「我比任何人都还了解○○○，相信我」或是「没有人比我还懂○○○」。他获准匆匆浏览核武、对中国贸易，以及许多他不懂的事情；他肆无忌惮地宣称未经检验的新冠肺炎疗法和药物疗效时，或罔顾事实、声称自己从未犯错之际，都没有受到实质挑战。

当唐纳掌握发语权，且不需要详述前提，或展现自己真正了解其基本原则架构的情况下，很容易让唐纳的发言听起来连贯且状似知识渊博。这种（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媒体公诉在大选时也没有改变，只要戳破唐纳的谎言和无法无天的主张，或许就能拯救我们免於他的魔掌。有几次，他被问到他的职位和政策（实际上都并非真实存在）能为国家做的事情时，他不但没想过，甚至不曾展现过自己想去深入理解的打算。大选过後，他想到一招解决这类问答的方法，就是以「直升机讲话」（chopper talk）取代白宫记者会和正式会议（译注：唐纳喜欢在搭乘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之前，於白宫南草坪回答记者的提问），如此一来就可以利用直升机螺旋桨的噪音，假装听不清楚他不喜欢的提问。二○二○年，他的（新冠肺炎）疫情「记者会」很快就变成沾沾自喜、蛊惑民心和表达效忠的迷你造势集会。他在记者会上否认已经造成数千人丧生的荒谬错误，谎报各方面的（防疫）进度，并让因为他的政府拒绝发放足够的防护装备，冒险拯救国民的人们背黑锅。即便数以十万计美国人倒卧病榻，他仍杜撰胜利，甚至当作他精湛领导能力的证明。在许多人们认为他应该严肃或不苟言笑的场合，他仍拿预测模组和性丑闻女模特儿的双关语开玩笑，或加码谎报他的脸书粉丝人数。新闻媒体拒绝离开，少数敢於挑战他的记者，即便只是简单请教唐纳攸关惊恐国度的「定心丸」，也因此遭唐纳取笑，痛斥

「下流」（nasty）。从佛瑞德主动鼓励媒体不要挑战唐纳早期的破坏行径开始，到共和党乐意对於他自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职）以来所做的一切贪腐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川普的顺遂人生，导致这个曾经伟大的国家经济、民主与健康即将崩解。

在理解媒体与政治交织横断之际，我们必须摒弃唐纳的「策略性光辉」理念，他现在没有策略，也从来没有过。尽管他利用选举人优势侥幸成功，但这场「胜利」没有公信力，甚至不合法；他从未了解时代思潮的进展，他的大言不惭只是刚好与部分族群产生共鸣。如果说他在二○一六年大选中有未竟之事，他仍会执意继续照做，因为说谎、迎合大众口味、欺骗和散布分化是他所知晓的全部。他无法调整或改变环境，就像他被人民选为「总统」一样。他确实利用他向来擅长的偏执和愤怒取得好结果，比如他在一九八九年付费刊载於《纽约时报》的全版广告，呼吁判处「中央公园五犯」（Central Park Five）死刑，但这并非出自他对法治的深切考量，而是个契机，让他可以在具影响力且颇负盛名的「灰色淑女」（Gray Lady）版面上，貌似权威人士一般讨论对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严肃议题（译注：《纽约时报》因为报导庄重且严肃，而被昵称为「灰色淑女」）。这种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手段，目的是在激起该城市已沸腾的种族仇恨。被贴上「中央公园五犯」的五名青少年，分别是凯文．理查森（Kevin Richardson）、安隆．麦克雷（Antron McCray）、雷蒙德．桑塔纳（Raymond Santana）、柯瑞伊．怀斯（Korey Wise），以及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这五人经过真凶认罪和无庸置疑的DNA证据检测後，终於被平反无罪。时至今日，唐纳仍坚称他们有罪，这又是他无法抛弃他所喜好论述的另一例证，即便这项论述已与事实不符（译注：一九八九年四月，一名白人女性在纽约中央公园慢跑时，遭攻击性侵。人们发现她时，她身受重伤，被压在树底下，头骨碎裂，失血过多，奄奄一息。检警当时锁定一名西班牙裔和四名非裔青少年，这五人当时的年纪介於十四岁到十六岁不等。一九九○年，被媒体称为「中央公园五犯」的五名被告，被法院裁定有罪，先後入狱服刑。二○○二年，遭法院判处终身监禁的性侵犯马提亚斯．雷耶斯〔Matias Reyes〕坦承他是当年性侵攻击受害女子的真凶，经调查和DNA检验，中央公园五犯才得以洗刷冤屈）。

唐纳将所有非难视为挑战，且对招致挞伐的原委更变本加厉地渲染，宛若批评允许他做得更糟。佛瑞德欣赏唐纳的倔强，因为这凸显了他渴望在儿子身上看见的坚韧。五十年後，人们基本上会因为他灾难性的决定和不作为而遭殃。数以百万条性命危如累卵，他却谴责联邦政府未能提供个人呼吸器，扬言扣留对他不够忠心的州长其所属州的预算和救命设备；这些行为并不令我意外，然而一个人泯灭人性且有反社会人格的行径所造成的後果，却只换来噤若寒蝉的沉默，这让我感到绝望，也提醒了我，唐纳终究并非问题根源。

这是唐纳向来都能安然度过失败的最终结果，就连他罪过连连——对抗传统、忤逆正派、违反法律和反抗人类，都会获得奖励。伪善的参议院就弹劾审判宣告他无罪，又是另一个不检行为获得奖励的例证。

他心中的谎言，可能在他说出口时就变成真的，但终究是谎言。这只是他逃避责罚的另一种方式，而到目前为止，他每一次都逃过了。

第十层地狱

二○一六年十一月九日，我的绝望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於我肯定唐纳的残忍与无能将害死人。当时我猜测，他会陷入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如他挑衅或因莽撞而导致原本可避免的战争。我不敢想像，有多少人愿意认可他差劲的天性，造就政府批准绑架孩童、在边境拘捕难民、背叛盟友等暴行。我无法预见全球性的疫情会无端出现，让他有机会展现他异於常人的怪诞冷漠。

唐纳最初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凸显他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缩减消极态度。恐惧——在我的家族里等同懦弱——无论是现在的他，或三岁的他，都无法接受。当唐纳陷入天大的麻烦时，（英语文法中的）最高级已无法形容（麻烦之大），当前情况和他对此事的反应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即便荒谬或愚蠢。在他治下，没有一个飓风带来比「飓风玛丽亚」（Hurricane Maria）还要严重的水患（译注：飓风玛丽亚於二○一七年九月肆虐波多黎各，造成至少三千人死亡，岛民数月无电可用，美国总统川普却因此一度考虑卖掉这个美国自治领地）。他的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新冠肺炎疫情进袭华盛顿州的几个月前，模拟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他为何这麽做？恐惧。

二○一九年十二月，以及二○二○年一月、二月和三月，唐纳因为自恋爱面子而未拖延脚步；他这麽做，是因为他害怕显露软弱，或未能传达事事都「优秀」、「美妙」且「完美」的讯息。讽刺的是，他始终未能面对现实，难以避免地导致更大规模的失败。在此情况下，数十万人命丧生，世上最富裕国度的经济很可能被摧毁。唐纳不会承认错误，而是会改变规则以隐匿证据，并在过程中说服自己，他已经做得比其他人都还要好，只死了几十万人，而非两百万人。

唐纳曾言「以牙还牙」，但他报复的对象往往都是他先去招惹的——例如他拒绝付钱的承包商，或他不愿保护的侄女和侄子。就算他击中目标，也会殃及无辜。

现任纽约州长安德鲁．古莫（Andrew Cuomo）堪称是美国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质领导人，他犯下的罪不只是对唐纳不够逢迎；他展现出更好、更有能力的真正领袖风范，受人尊敬、有战斗力且令人敬仰，这让川普难堪，更是罪大恶极。唐纳无法让古莫闭嘴或推翻他的决定，

在他放弃领导国家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权力之後，他已经不具备反对州层级决策的能力了。唐纳可以羞辱并抱怨古莫，但这位州长每一天的实质领导才能，都让唐纳更像不重要的悲怆小男孩——无知、无能、难以驾驭，且迷失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唐纳为了抵销这些无能为力和愤怒，所能做的事就是惩罚其他人。他会扣押呼吸器或偷走医疗用品，只因为这些州未对他卑躬屈节；如果纽约继续缺乏医疗设备，古莫将会因此而难堪，我们其他人的後果也不堪设想。还好唐纳在纽约市没有太多支持者，就算有，这些人的生命也会因为唐纳对怯懦而生的「报复」心态惨遭牺牲。唐纳想要的，是有正当理由的报复，就此情境而言，形同大屠杀。

唐纳扮英雄，或许容易得多。如果有人把前总统欧巴马政府卸任前移交给他的疫情准备手册，从书柜上拿下来给他，憎恨或批评他的人，或许能够原谅或忽视他无止境且骇人听闻的行径。如果他在取得第一手证据，得知病毒传染力强、染疫存活率极高但疫情未获控制之际，就提醒相关单位和州政府留意；如果他早点启用一九五○年的《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制造个人防护设备、呼吸器等因应国家最惨烈情况的必要设备；如果他允许医疗和科学专家出席每日记者会，清楚且诚实地说明实情；如果他确保所有必要机构都能具备系统性、由上而下贯彻的决策方，那麽大多数工作几乎都不用他操心，他只要打几通电话，发表一两场演说并委派各事项就行了。他可能会被骂太谨慎，但我们大多数人会是安全的，且会有更多人存活。各州被迫向私人包商购买关键防疫物资，应该要由联邦政府徵用这些物资，并透过「联邦急难管理局」（FEMA）发配给私人包商，私人包商再重新贩售这些物品。

当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孤独死去时，唐纳却忙着打探股市收益的消息。正如同我父亲奄奄一息之际，唐纳去看电影。如果他可以因为你的死而透过任何方式获利，他会照做，接着忽略你死亡的事实。

为何唐纳那麽久才有所作为？他为何无法严正地看待新冠肺炎？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跟我的祖父一样，缺乏想像力。疫情没有立即影响到他，时时刻刻都在处理这场危机，并无助於他推动他偏爱的叙事：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随着疫情演进三、四个月，死亡人数飙上数万人，媒体开始讨论唐纳对死者及其家属缺乏怜悯心。事实很简单，唐纳根本没有认同别人受苦的能力。叙述死者的故事会让他觉得很无聊，同理新冠肺炎罹难者，将让人们把唐纳与死者的脆弱联想在一起，这是他父亲教他要鄙视的特性。唐纳不会维护病患或性命垂危者，就像他不会让自己陷入他爸和佛瑞迪的仇恨之间。或许更重要的是，对唐纳而言，怜悯没有价值，照顾其他人也没有实质好处。大卫．寇恩曾写道：「这一切对这个可怜且残破不全的人而言，都是交易，一切都是。」

这是个原生家庭失败的悲伤故事，我的叔叔不明白，无论是他或任何人，都有其内在价值。

在唐纳的心里，就连承认一个难以避免的威胁都表示脆弱。承担责任会让他遭受责难，做英雄——当个好人——对他而言，是不可能的。

他处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遭暗杀以来最严重内乱的情况亦然，这原本是一场唐纳可以简单战胜的危机，但他的无知掩盖了他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这是他任内第三场全国性灾变。适当的回应是诉求团结，但唐纳渴望分裂。这是他唯一知晓的生存之道，我祖父於数十年前，在让他的孩子们彼此反目成仇後，确立了这一点。

明尼苏达州警察德瑞克．沙文（Derek Chauvin）以膝盖压颈的方式，残暴且冷漠地谋杀非裔男子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後沙文更双手插在裤袋里，漫不经心地凝视摄影镜头。我能想见，唐纳目睹这一幕时有多嫉妒，恨不得是他的膝盖压在佛洛伊德的脖子上。

唐纳缩回他的舒适圈——推特和福斯新闻（Fox News）——站在远处谴责，并受到象徵性或字面意义上的碉堡保护。他喝斥对方的脆弱之际，也展现了自己的弱点。他从来没有摆脱他一直都是个惊恐小男孩的事实。

唐纳的残暴是内心极其脆弱的证明，且他此生一直在逃避。对他而言，除了乐观和展现虚幻的力量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形同死路一条；我爸短暂的人生即为证明。这个国家正受到致命的乐观荼毒，这种态度正是我祖父特意部署的武器，用以压抑他病恹恹的妻子、折磨他垂死的儿子，并毁了他锺爱之子——唐纳．J．川普曾被疗癒的心灵。

「一切都很棒。对吧，宝贝？」

谢词

致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感谢强恩．卡普（Jon Karp）、埃蒙．多兰（Eamon Dolan）、洁西卡．金（Jessica Chin）、保罗．狄波里托（Paul Dippolito）、林恩．安德森（Lynn Anderson），以及杰奇．绍（Jackie Seow）。

致WME，谢谢杰．曼德尔（Jay Mandel）和席恩—艾叙利．爱德华兹（Sian-Ashleigh Edwards）。

还要谢谢卡洛琳．莱文（Carolyn Levin）的仔细校对；《琼斯夫人》大卫．寇恩（David Corn）的好意；达伦．安克罗姆（Darren Ankrom）杰出的事实查核；斯图亚特．奥尔特奇克（Stuart Oltchick）告诉我美好的时光；机长杰利．劳勒（Jerry Lawler）诉说环球航空的美好历史，以及玛丽安．川普．巴瑞（Maryanne Trump Barry）所有振奋人心的讯息。

我要感激戴尼斯．坎普（Denise Kemp）与我团结一致，感谢我母亲琳达．川普（Linda Trump）的所有好故事。感谢萝拉．屈尔斯（Laura Schweers）、戴比．R（Debbie R）、史黛芬妮．B（Stefanie B）和珍妮佛．T（Jennifer T）的友谊，和在我最需要她们之时的信任。感谢吉尔与马克．纳斯（Jill and Mark Nass）协助我们延续传统。

致我最爱的「川比」（Trumpy），我每天都想你。

我深切感激泰德．布特洛斯（Ted Boutrous）第一次会面且相信动机；安妮．钱皮恩（Annie Champion）的慷慨和友谊；帕特．罗斯（Pat Roth）深思熟虑的反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安娜玛丽亚．佛西尔（Annamaria Forcier）当我父亲如此要好的朋友，我很庆幸找到你；苏珊娜．克雷格（Susanne Craig）和罗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精湛的报导和正直的性格，谢谢你们让我同舟共济，尤其是苏珊娜，没有字汇可以形容你的坚毅、勇气和鼓励；致丽兹．史坦恩（Liz Stein）共伴旅程，让这本书变得更好——并让这段经验更有趣且不寂寞（当然，还有尤达宝贝〔Baby Yoda〕）；感谢艾瑞克．阿德勒（Eric Adler）不辞辛劳地给我建议，并在地方当铺力挺我；感谢艾莉丝．法兰克斯顿（Alice Frankston）在计画之初就参与，在我还不相信之际深信不疑，且多次细读每一字，次数多到我无法统计。我迫不及待想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最後，还有我的女儿艾佛瑞（Avary），你比其他孩子更有耐心且

体贴，我爱你。

People

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制造出唐纳．川普

着者：Mary L. Trump

译者：周辰阳、季晶晶、郭宣含、陈韵涵

副总编辑：陈逸华

总编辑：涂丰恩

总经理：陈芝宇

社长：罗国俊

发行人：林载爵

丛书主编：王盈婷

校对：吕佳真、李伟涵

封面设计：儿日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经网址：www.linkingbooks.com.tw

电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初版

电子书制作日期：2020 年 9 月

电子书制作：王圣渊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SBN：978-957-08-5610-1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Copyright © 2020 by Compson Enterprises LL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2020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各大媒體好評推薦

瑪莉．川普娓娓道出一個極不快樂家族的多年故事，不僅止於剖析她叔父混亂不安的內心世界。這也是一本上好的入門書，談政府內部運作混亂，竟未能在新冠疫情期間，採取保障美國人安全所需的基本步驟，震驚了全世界。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瑪莉．川普以局內人視角爆料一位家庭成員……巧妙寫下跨世代的創傷，需要臨床心理學家的觀察分析能力、讀過比較文學的研究生才有這樣的寫作才華。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瑪莉的一針見血、扎實訓練、學術造詣以及敏銳觀察力，有助於外界信任她說的故事。此外，她還是位文筆流暢、機智詼諧的作家……她是真正的內部人士，在這個總統內幕爆料多到一文不值的時代，她寫的東西恐無可磨滅。

——《**彭博資訊**》（*Bloomberg*）

瑪莉．川普描述一個贏得白宮大位之人表現出的無情無義，比任何人寫得都要好……很有見地且精心撰述的回憶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可想而知川普總統為什麼不想要任何人讀這本書。它證明川普所珍視的許多與自己有關的神話是一派謊言。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自川普競選總統以來，這本是最具殺傷力、最有價值，和整體來說最優秀的川普書籍。在大量的川普文獻之中，這本很有新意……本書的作用在於幫助我們了解他，對他的待人處事提供至今為止最深刻的解析。

——《**政客**》雜誌（*Politico*）


聯經社群


回函贈書

川普姪女娓娓道來家族往事，描繪混亂又殘酷的成長環境
從心理學角度，揭開川普擁有太多卻永不滿足的個性成因

永不滿足

一部引人入勝、但也令人顫慄的家族傳奇

身為唐納唯一的姪女，臨床心理學博士瑪莉．川普在本書中坦言不諱，完整揭露自己家族的黑暗歷史，解釋她的叔叔為何會成為今天的模樣，又如何間接對全球社會、經濟與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

川普家族位於紐約的雄偉大宅，是唐納．川普與兄弟共同的成長環境。從她祖父母獨特的教養方式開始，瑪莉．川普細數此地發生過的災難與創傷，以及長輩偏頗、平輩競爭、晚輩排擠的扭曲氣氛。她也剖析虐待般的父子關係，如何創造出這位狂人領袖的獨斷獨行，形成他無法對人憐憫、不願展現脆弱，更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的個性。

過去有許多冒牌專家與八卦記者爆料批判，試圖解釋唐納．川普的致命缺陷，但唯獨瑪莉．川普擁有足夠的學養與洞見，加上親身見聞與局內人的視野，讓她得以揭露養成川普性格的實際緣由，深入他的內心世界，寫出這本震撼人心、引發全球矚目的話題鉅作。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
唐納．川普


9 789570 856101 00370

建議分類：社會科學／政治／政治人物

Mary L. Trump